



看不懂的中国

鲁迅 林语堂 傅斯年 等著

孝庄告诉康熙：“在别人把你琢磨透之前，要先将他琢磨透了。”
本书将告诉你：“在把别人琢磨透之前，先要把自己琢磨透了。”

【内容简介】

中国人是怎样一种人？中华民族是怎样一个民族？是文明还是野蛮？是善良还是险恶？是聪明还是愚蠢？中国人性格上有哪些优点和弱点？本书收集了几乎所有描写中国人性格的佳作名篇，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性格和弱点。

品人录 01

看不懂的 中国人



鲁迅 林语堂 傅斯年 等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懂的中国人 / 鲁迅，林语堂，傅斯年等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80228-834-8

I. 看... II. 鲁... III. 中华民族—性格特征—通俗读物 IV. C95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1993号

看不懂的中国人

作者：鲁迅 林语堂 傅斯年等

责任编辑：余守斌 邓东文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86（10）68995424 68996304（传真）

发行部电话：+86（10）68995968 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邮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邮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刷：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20×1020 1/16

字数：200千字 印张：14.75

版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834-8

定价：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通常被认为是最复杂和最难以理解的人。

中国人的复杂性就在于：

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

总之，中国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它并不浅显及流于表面。正是这种性格才使他们变得如此神秘而让人琢磨不透。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可能是“意在言外”。换句话说，中国人一向不喜欢“直来直往”，如果哪一天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双方扯破脸，就是关键性的时刻到了。所以，要想了解中国人，不得不首先了解中国式的“阴阳思想”。

比如，当对方回答“不”的时候，未必真的是“不”，可能只是碍于面子，第一次需要用拒绝来摆摆架子，或是讲讲客套。而第二次再恳求时，对方也许就同意了。反之，当对方说“是”的时候，也未必就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不愿当面给你难堪而已！

这可真难住了那些习惯了直话直说的蓝眼睛的西方人，对这样的性格特点和黄种人那拐弯抹角的办事方法，他们尤为感到迷惑不解。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岂但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老祖宗留下了不少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

看来，中国人还真是一本费解的、让人很难读懂的书。

本书收录了几乎所有描写中国人性格的佳作名篇，不分时代，不论国籍，只要语言犀利、剖析深刻，我们都把它们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书中有些内容描写的时代较早，像英国的罗素，法国的杜赫德，美

国的古德诺等都是清末民初来到中国，说的都是旧社会的场景，这些内容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不太相符，但就像勒蓬所说：“人类共有的遗产在知识的发现，而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则是各国国民专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历经几个世纪的冲洗，也不过是磨去了它外侧的棱角而已。”

目 录 Contents

[序](#)

[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说“忍” 陈子展](#)
[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英\) 麦高温](#)
[我所知道的中国人 \(法\) 杜赫德](#)
[中国式的幽默 赵志伟](#)
[虔诚·隐忍·虚荣·书呆·迂腐·忠厚 周泽雄](#)
[面子·票子·命根子 佚名](#)
[选择权是谁的 冯骥才](#)
[中国式好人 李敖](#)
[秩序还好吗! 龙应台](#)

[东方人和西方人](#)

[融入慧心的悠闲 俞灏敏](#)
[融汇与同化 服部宇之吉](#)
[番鬼来中国 \(英\) 威廉·C·亨特](#)
[旧中国杂记 \(英\) 威廉·C·亨特](#)
[面子第一 \(英\) 麦高温](#)
[无往而不胜的中庸 蔡元培](#)
[礼仪之邦 \(美\) 古德诺](#)
[东方人和西方人 卢秋田](#)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中国人与西方人 佚名](#)

[顽强的生命力](#)

[戏说中国人 桑科](#)
[中国人与印度人 \(印度\) 帕兰杰毗](#)
[趣话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卢秋田](#)
[生活中的强者 \(美\) 罗斯](#)
[顽强的生命力 \(德\) 赫尔曼·凯泽林](#)
[稳重而可靠的中国人 \(美\) 罗斯](#)
[中国人的性格 \(英\) 罗素](#)
[谦让的中国人和自信美国人 荀遂山](#)

[中国人的“阴阳思想”](#)

[中国人之德性 林语堂](#)

[我看中美面子_王安妮](#)
[中国人的“阴阳思想”_李经康](#)
[权谋文化与复杂的中国人_陶东风](#)
[“模糊语”不模糊_杜树人](#)
[从犹太人看中国人_海龙](#)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_傅斯年](#)
[差不多先生传_胡适](#)
[我唾弃那种中国人_张藏藏](#)

[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中国人的病_沈从文](#)
[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_龙应台](#)
[从德国人看中国人_沙叶新](#)
[中国国民之品格_梁启超](#)
[谈谈民族的面子_李平心](#)
[镜子_连晨](#)
[难以合作的中国人_黎鸣](#)
[要面子不要脸_杜重远](#)
[斗来斗去的中国人_鲁迅](#)

[有红绿灯为啥还要交警](#)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_鲁迅](#)
[中国人的四大毛病_\(波兰\)露存](#)
[有红绿灯为啥还要交警_茅于軾](#)
[中国狗与中国人_傅斯年](#)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完整版\)_与魔鬼同行](#)
[中国人与麻将_胡适](#)
[中国人，日本人_陈香梅](#)
[无国民资格之国人_陶行知](#)
[以静为本位的中国人_李大钊](#)
[缺乏科学精神_\(美\)古德诺](#)

[索引](#)

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 在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

——林语堂

说“忍”

陈子展

孔子说过“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话，这话本来不错。因为他只教人忍小事，当然权衡轻重，以成就大计划，忍耐小事件为是。倘若对方要使你的大计划弄不成，那就不是小事，只要你还有做人的血性，一定忍无可忍了。

孔子的话虽然这样说，可是他老先生常常为了一点小事气得胡子发抖。比如他看见鲁国当权的阔人季氏在家里擅用只有天子可用的八佾的乐舞，他就气愤愤地说道：“这个可忍呀！还有什么不可忍呀！”

又有一次齐国打发人送女戏子给季氏，季桓子玩疯了，三天不办公。恰好有祭祀，胙肉又忘记分送给孔子，孔子只好气冲斗牛地出走，连官也不要做了。可见孔子还有修养不到的地方。

五代时候，冯道以孔子自比，他的忍性的修养工夫，似乎要比孔子进步，相传他做宰相的时候，有人在街上牵着一匹驴子，用一块布写着“冯道”二字，挂在驴子的脸上，这分明是在取笑他了，他看见了也不理。有个朋友告诉他，他不好再装聋，只好答道：“天下同姓名的不知道有许多，唯道那一冯道就是我？想是人家拾了一匹驴子，寻访失主呢。”

俗语道：“宰相肚里好撑船。”肚皮窄狭，不能容忍，那是不配做宰相的。相传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做娄师德。他放他的弟弟去做代州都督，要动身了，他叮嘱弟弟道：“我本不才，位居宰相，你如今又做了一州的都督，我家阔气过分，这是人家要妒忌的，你想怎么了局？”

弟弟道：“从今以后，有人吐我一脸的唾沫，我也不敢做声，只好自己抹去，这样或者不致累哥哥担忧罢？”

师德道：“这恰恰是我担忧的地方。人家要吐你一脸的唾沫，那是因为他对你生了气。你如今把脸上的唾沫自己抹去，那就会更招人家生气。唾面不抹，它会自干，为什么不装着笑脸受了呢！”

弟弟道：“谨受哥哥的指教。”

这就是娄师德唾面自干的故事。这一故事活活描出了为着做官，不惜忍受一切耻辱的心理。

吾本家白沙先生，是明朝大儒，他有一篇忍字箴道：“七情之发，惟怒为剧。众始之加，惟忍为是。对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励。过一百忍，为张公艺。不乱大谋，乃其有济。如不能忍，倾败

立至！”

他要学张公百忍，可惜他不曾做宰相，像娄师德、冯道之流，以忍治国，他只能学张公艺以忍治家。从家到国，都离不了一个忍字，一忍了事，中国民族算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特大的民族了。

这个忍字，真可算得咱们唯一无二的国粹。忍的哲学，道家发明最早，不过不曾呈请注册专利。老子的不争主义，就在于能忍。他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只算是他的诡辩。

道家每每把黄帝老子并称，称做“黄老之学”，其实不对。倘若关于黄帝的史事可靠，那么，黄帝开国，他是用抵抗主义半争主义战胜一切的。他把蚩尤赶走，外患消失，他才开始整理内部，建设了一个像样的国家。老子主张不争，主张柔弱，不但不曾继承了黄帝的道统，他简直不配做黄帝的子孙。

自从佛家的哲学传到中国，老子的哲学又得了一个帮手。相传释伽昔为螺髻仙人，常常行禅，在一棵树下兀坐不动。有鸟飞来，把他看做木头，就在他的发髻里生蛋。等他禅觉，才知脑袋顶上有了鸟蛋。他想，我若起身走动，鸟不会再来，鸟蛋一定都要坏了，他即再行入定，直到鸟蛋已生鸟儿飞去，他才起身。

这个故事虽然未必真有其事，可是佛家忍性的修养工夫，实在比咱们的道家不知高了许多。六朝道家佛家的思想最有势力，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最倒霉，北方经过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蹂躏，可怜南方小朝廷，还是偏处一隅，相忍为国，醉生梦死，苟安旦夕。

宋朝虽说好像是儒家思想最占势力，其实一般道学家戴的是儒家帽子，却穿了佛家道家的里衣。他们好发议论，没有实际工夫。“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贻为千古笑柄。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也最倒霉，北方始终在异民族手里，结果南方的小朝廷退让，退让，一直退到广州的海里崖山，小皇帝投海死了。

明朝道学号为中兴。所谓儒家还是贩的佛道两家的货色，即消极的哲学，懒惰的哲学，不求长进的哲学。虽说有个王阳明算为无用的书生吐了一口气，可是王学的末流，堕落做了狂佯。

明朝亡了，中国民族又倒霉三百年，我虽然不一定要把两千年来受异民族侵略倒霉的责任统统推在道家佛家乃至号为儒家的道学家身上，但这三派思想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液，已经久远了，三派所最注重忍性修养工夫做得愈精进，愈深湛，就愈成为牢不可破的民族性。因此这个在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的民族，也就愈成为最适于被侮辱被侵略的民族了。

被作为墨家的一个哲学家说，“见侮不辱，救世之斗。”忍受一切，提倡和平，好伟大的和平主义者！记得清儒张培仁的《妙香室丛话》里

有一段说：

忍之一字，天下之通宝也，如与人相辩是非，这其间著个忍字，省了多少口舌。如与美人同眠，这其间著个忍字，养了多少精神……凡世间种种有为，才起念头，便惶然着忍。如马欲逸，应手加鞭，则省事多矣。但忍中有真丹，又是和之一字。以和运忍，如刀割永无伤。和者，众人见以为狂风骤雨，我见以为春风和气，众人见以为怒涛，我见以为平地，乃谓之和平耳。

这也像是说的忍耐与和平二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难怪中国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会忍耐一切的伟大的民族。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伟大的民族。

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英）麦高温

1987年10月，代表中国接受美国学者采访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曾坦白说：“我努力去了解中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对于在中国社会中显示出来的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以及形成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中国精神实质，我还没能真正认识清楚。”

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他们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且通常被认为是最复杂和最难以理解的人。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就在于，那些与其有关的细微因素往往深藏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事实上，以往我们得出的一些结论是不全面的。虽然它们不全面，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华民族就像一件复杂的工艺品，用它那巧夺天工的技艺为我们展示出她的精神实质。

那些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在离开中国时，都会有“中国人实在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群体”这样一个相同的感受。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大多是些含混不清的印象。

这些外来者可以整天与中国人待在一起，进入他们的生活，像使用本国语言一样熟练地使用汉语。但在四十年之后，对有关中国人的很多事情，他们自己不得不承认并不十分了解。

从这点可以知道，中国人的性格是复杂的。它并不浅显及流于表面。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变得如此神秘。而习惯了直话直说的西方人，对这样的性格特点和黄种人那拐弯抹角的办事方法，显然感到迷惑不解。

黄皮肤的中国人，声音尖厉而不悦耳，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如果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脸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美丽。他们颧骨突出，鼻子扁平，嘴唇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珠转来转去，仿佛在与外面的世界捉迷藏。另外，大部分中国人看起来显得迟钝、无神，给人的印象就是缺乏想象力。

虽然中国人有这些缺点，但英国人仍较其他西方人更喜欢中国人。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有很强的幽默感。中国人的幽默感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渗透于全身，只要受到外界的一丁点儿刺激就会迸发。

任何荒唐的古怪事都会让他们捧腹大笑，至少是微笑。一张严肃而神秘的脸也常常被一个有趣的故事或一段幽默的笑谈而改变，使你与这

个刚才还素不相识的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对中国人来说，不管他的心情如何，笑话对他都有绝对的威力。幽默就像溶剂一样，能溶解掉一切不友善的气氛。我曾亲眼见过一个粗暴难对付的人变得友善起来，只是因为几句机智的玩笑而已。

另外，我还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群本来敌对正准备大打出手的人，却因为几个幽默的表示而一笑泯恩仇，成为朋友。

无论我们听得懂中国话与否，都要记住这一点：中国人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更习惯于开门见山，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用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不喜欢直接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中国待不了多久，外国人就会发现，中国人真正的本意，仅仅从他的话语中是不可能确定的。你很难从一个中国人那里得到所提问题的直接答案。当一个中国人讲话时，他的脸看起来像孩子般的平静诚实，说话的神态也轻松自然，但经验告诉你他所说的和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

举个例子，假如你请来一个泥瓦匠，给他一项工程，并让他用一周时间对这项工程做一个详细的预算。一周后，当他带着一张列有所需款项的纸来找你时，如果你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习惯直接问他：“喂，你想要的报酬是多少呢？”

这时，你会发现这泥瓦匠愣愣地看着你。因为你问的问题与他本民族的习惯背道而驰，让他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避开这难以回答的问题，转而去谈这项工程如何困难，有多少复杂的工序等等。

你变得不耐烦了，对他说：“工作中的细节我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你要的钱是多少。”可他就像没听懂你的话一样，继续掰着手指向你列举所需的各种各样材料。你发怒了，问他到底要多少钱，可他还是一样的无动于衷。

你终于明白了与这种人作对是徒劳无益的，不得不满肚子怒气地听他说下去。直到他认为把一切该说的都说全了，最后才说出酬金这个你最想知道的问题。

中国人好像从来就不知道语言就是要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对中国人而言，语言通常只是作为一种载体。他们要表达的真实想法则隐藏在话语当中，只有通过推断才能明白。

中国人固执己见且自以为是，从这方面讲，它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民族。就像在你对某件事情提出方案之后，你告诉中国人应该怎样做。如果有不同意见，中国人就会反对你的方案，并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方案，并宣布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便装出一副孩子般满意的表情，认同你的方案并说你的方案的确是最好的。

可是，让你吃惊的是，在事情完成之后，你发现他们执行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方案。而当你质问他们时，他们却这么回答你：“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方案才是最好的。”

再比如，一位女士给出衣服的式样和装饰，让裁缝按自己的规定做一件新衣服。裁缝听完后，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说他完全记住了女士的要求，然后麻利地收好面料并说道：“我后天把衣服给您送来。”

几天后，裁缝来了，带着做好的衣服，脸上洋溢着微笑。他利索地打开随身带来的小包，取出一套用他那灵巧的双手做成的华美的新装。当衣服完全展开之后，女士的脸上却笼罩了一层阴云。她问裁缝：“你为什么改了衣服的式样？”

“我替您选了一个更好的式样。您要相信我的眼光，我是个一流的裁缝，知道什么样的衣服更漂亮。”这位裁缝用他的洋泾浜英语向女士解释道。

虽然，人们对中国人的这些行为感到厌烦，但绝不至于对他们产生报复的心理。就算在气头上，中国人也有办法让人们减轻心中的怒火，那就是他们那丰富的幽默感。他们通常会讲一个完全虚构，好笑的故事，让人们感到滑稽可笑，使人们的怒火在阵阵笑声中熄灭。

在史密斯先生的《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就叙述了他与那些性格独特的中国人打交道时的各种感受。这位先生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究竟他应该宰了那些执拗的中国仆人还是给他们加薪呢？

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你会遇到一个令人十分苦恼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并不诚实。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诚实这个概念。如果你对一个中国人说他在撒谎，他会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反驳你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说过谎。你也不可能用“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这样的话来使他屈服。

在中国，这种不诚实的现象普遍存在。一天，我为了得到一笔给医院的捐款而去拜访一位中国商人。因为之前我与他并不认识，所以进门之后，我先向一位神情严肃、性格沉稳的先生询问主人是否在家。他很快回答我说：“主人刚出去。”还指了指主人离去的方向。

我忽然意识到，我要找的人正是这位先生。于是我笑着说：“我知道，您就是主人。您应该为刚才的行为付给我双倍的捐款。”听我这么说，他露出了笑容。他旁边的人好像也觉得这很有趣。对这样的事别说向你道歉，他们甚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自然。因为所有中国人都是用一样的方法来拒绝不速之客的。

几天后，因为同样的事情，我去拜访了另一位富有的银行家。仆人告诉我说主人病了，把我挡在了门口。我很怀疑他所说的话。进屋坐下后，我对仆人说：“我就在这里等，直到主人病好为止。”我还补充

道，“我没有别的事，所以病人有足够的时间让身体康复。”仆人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对我说的话感到很奇怪。没办法，他只好把我的话禀报给主人。

几分钟后，仆人回来还是说主人病重，希望能改天见我。我说我对主人的病深表同情，但我有的是时间，可以等。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这位银行家终于同意在卧室里会见我。进屋之后，我发现主人根本就没有病。可能他对刚才的事也觉得好笑，正咧着嘴笑着。

中国人总是把神经绷得很紧。他们会对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权衡，从中得出事情真相，就如同法官和陪审团那样。

举个例子，有个人满脸神秘的样子走进你的房间。他会先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然后仔细看看窗边、门口的过道里是否有人藏着，接着还要察看一下烟囱，最后指指天花板、指指地、再指指他自己对你说：“我说的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接着他小心地向门口瞥了一眼，凑到你耳边，告诉你一件你非常信任的人的事，让你非常震惊。不一会儿，等你回过神来，你会对这件事情进行分析。你会考虑这些话里有几分是真的、几分是夸张的、还有什么主要的他没有讲等等。渐渐地，你会怀疑起你的朋友，但等你心头的疑团消除掉后，你会格外轻松，并对自己曾经怀疑的那个朋友深信不疑。

以上这些绝对不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主见、懦弱的民族。中国人要算是最有骨气的了，从他们对所处的环境有着毋庸置疑和极强的适应能力中就能体现出来。假如把中国人放到冰雪覆盖的地方，他们也能够很快地茁壮成长，如同本来就生活在这块寒冷的地区。再把他们送到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的南方，他们仍然能够生活得轻松自在。

中国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四海为家。他们能够沿着积雪覆盖的高山旅行；他们能够坐在华丽的轿子里让人抬着走；也能全然不顾蚊虫的叮咬在泥塘边的茅屋里露宿；他们还可以在坚硬且凹凸不平的地上，头枕着砖头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起来仍然精力充沛。

中国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显得很自然。他们既可以在一流客船的头等舱上安闲地踱来踱去；也可以在阵阵恶臭的内河的小船上随便找个地方，像蜗牛一样蜷起，美美地睡上一夜，而这样的环境对任何一个西方人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

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不管他是商人、苦力、匠人还是工人，他都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他粗鲁和缺少教养的外表背后，有着强壮的身体以及极强的忍耐力。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全然不在乎天气的好坏，也不在乎病菌、毒虫以及可怕的瘟疫的侵扰。

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的神经过敏。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在

东方人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东方人总是那么严肃、持重，从不着急。

在大街上，只凭一个西方人的走路姿势，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认出来。他快速摆动着手臂，脚步飞快，脸上的神色也是那么焦急，与周围那些神色平静的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总觉得他们的时间非常充足，一点也没有必要着急。

中国人能够迅速地适应任何环境，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冷静。他们在对待疼痛时，往往也以一种圣人般的平静来忍受。正是在忍受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时，他们的英雄主义才那么地令人钦佩。

在医院里，我曾看到一个人，他的手因发炎肿胀得非常厉害。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眉头紧锁，脸也变得发青。但也只能找到这些痛苦的征兆，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能表明他正处在极度的痛苦当中。

在医生把手术刀切入他那发炎的手时，他也只是“哎呀”了一声，伴着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以此表示他疼。如果是一个西方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大喊大叫。有时候，甚至要两个人把他按着，医生才能进行手术。

中国人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正是由于这种斯巴达式的忍耐和坚强。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着很少的粮食生活，像奴隶一样干着繁重的、一成不变的工作，而没有一天的休息。即使在屋里休息的时候，他们依然满脸悲哀、无奈和不满。但就是这样，他们依然倔强地挑起生活的重担。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妇女的坚强并不输给男人。她们承受着痛苦和悲哀，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却没有一句的怨言。当她们的丈夫堕落为赌徒或烟鬼时，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而她们此时却那么坚忍和勇敢，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

中国人的忍耐还表现在这么一个方面：当遇到别人耽误他们时间时，他们表现出那么的平静与毫不在意，而同样的事则会让西方人怒气冲天。

比如，一个中国人为某件重要的、特别的事情来拜访你。一开始，他并不开门见山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而此时刚好你又有事要忙，于是你便请他先坐一会儿，稍等片刻。他便静静地坐在那儿，脸上是一副很清闲的神态，表明他只是顺便造访，并没有什么事。

谁知你却被一些事情缠住了，忘了还有客人。等你一个多小时回来后，他见到你，也只是笑一笑，且很有礼貌地欠欠身，一点也看不出有丝毫的不满。

如果是一个西方人遇到这种情况，他早就等得火冒三丈，又气又恼了。等你回来，你将看到他那阴沉的脸和喷火的眼睛，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彻底决裂了。

一个中国人，就有那样的宽容和忍耐，当你把他遗忘时，他却依然坐在那里等你回来。正是这样，他最后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英国人则带着满腔怒火离去，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他会冲你发泄心中的不满，而这样，你们也就不能够再交下去了。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只有通过你才能轻易且行之有效地完成，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让愤怒和坏脾气来破坏自己的大事。他可以平静地等上更久的时间，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事实上，如果时间太紧，你让他明天再来的话，他也会面带真诚的笑容，表示他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

第二天，那个中国人按时来了，你却因为一个重要的约会而分身乏术。这时，在你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后，他会说再拖一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关系，很快地让你没有了顾虑。面对这样好的耐性和脾气，你将会不遗余力地满足他的要求的。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表现出他们的机智，就像中国名将左宗棠在其戎马生涯中的一次经历。

公元1873年，一场叛乱横扫了东土耳其斯坦和中国西部边境。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安全，必须要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

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平叛大军的统帅，肩负起领导平叛的艰巨任务。叛军所在的地方多是山地和丘陵，只有很少的土地可以用来耕种。那里不但没有足够宽的道路可供行军，那儿的人们还凶猛好战，而平叛大军的日常补给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还在内地时，左宗棠就尽最大努力把补给供应给平叛大军。当他的大军开进战区，士兵们在打开粮袋时，却发现粮袋基本上是空的。因为运粮的人和驮马在路上已经把粮食消耗完了。这时，左宗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靠运输得到补给了，而这大军的补给实在是一个考验他智慧的大问题。

如果是一个平庸的统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们都会把大军撤回后方以保存实力。但左宗棠不是，他不是一个平庸的统帅。他一定要胜利完成使命，绝对不能让这样的行为给他以往的光辉战绩抹黑。

左宗棠想出了一个只有中国人的头脑才能想出的办法。他下令将一块能够用来耕种的土地用壕沟围住，并建起一座营地，然后再让所有的士兵变成农夫，下地耕种。一支强大的军队顿时变成了和平的农民。他们将土地分成小块，分别种上谷物和蔬菜。

一年后，大军的粮食供给解决了。在这一年来，中国军队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宗棠意志坚定，坚信自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一个号角吹响的早晨，耕作的农夫们瞬间变成了士兵，他们迅速

加入到各自的队伍中。这支大军又开始向敌人的要塞进发了。一次又一次，因为缺粮，这些士兵们不得不停下来屯田种粮。但是，他们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经过数年时间的忍耐，终于平息了叛乱。

在中国人的身上，有许多特征是矛盾的，有些毫无疑问是出自于人性的弱点。其中一个主要的倾向就是，中国人对交给他们的任务都抱着一种马马虎虎的态度，而且还以此为满足。他们并不像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是“效率”那样，他们对生活是持着“马马虎虎”的态度，就像他们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那样。对于中国人，这样的判断可以说是完全公正的。

仆人们在家里，职员们在公司里，商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官员们在办公室里，无论干什么，中国人似乎并不认为他们应该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马马虎虎”这个词正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那种心态，而且，这种马马虎虎的行为随处都可以见到。

新买的东西，保修期刚过了几天就坏了；仆人把刚布置给他的事情忘了；坐办公室的人在外闲逛，而不在办公室里工作；约好了付款的时间，到时候却看不见钱的影子；让裁缝在今天把衣服做好送来，可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衣服带来。而且好像并没有人对上面这些事情感到不快。

许多像“别在意”、“别管它”、“别担心”等等这样与“马马虎虎”意思相近的词语被用来作为疏忽大意的托辞。不可否认，中国人的性格中有许多好的地方，但如果他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需要一场严肃的变革。他们中大部分人在生活中的那种懒懒散散的作风必须被一种更为积极向上的风气所替代。

我所知道中国人

（法）杜赫德

中国人都很温顺、人情味浓。他们举止文雅、风度翩翩，不粗暴、也不粗鲁。这种温顺的性格在普通老百姓中非常明显。付圣泽神父说：“一天，我走在一条狭窄的长巷里，突然许多马车把路堵住了。我原以为他们会像欧洲人那样大发脾气、用脏话骂人，甚至还会打架。但是，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互相致意，温良恭敬地说话，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然后大家相互帮助顺利通过。”

他们十分尊敬老年人，皇帝陛下为人民做出了好榜样。一位大约100岁的数学研究院官员正月初一进宫给康熙皇帝拜年，那天本来不想接见任何人的皇帝还是下旨让他进宫。这位老人虽然穿着很差，但大家都上前来帮助他。

他们将他引到了皇帝的寝宫。皇上非常热情地起身迎接他。

官员双膝下跪，皇上马上将他扶起来，非常仁慈地握住他的双手说：尊敬的老年人，从今往后，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见朕。朕要告诉你，在朕面前你无须再行君臣大礼。朕会起身迎接你，朕不只尊敬你本人，也尊敬你的年纪。为了表示朕对你的真情实感，朕现在任命你为数学学院院长。这位老人获得了一生从未有过的幸福。

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得注意不要太匆忙或太热情。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从容不迫地行事。中国人在一个月内听到的东西，法国人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就说完了。我们必须忍受这种冷淡，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非常正常。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缺乏热情或者活力，而是他们知道要及时克制自己，使自己比别的民族更文明，更有礼貌，更有价值。

一个外国人要适应中国人的情趣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些场合下，他们的礼仪非常烦琐。学会这些礼仪是一回事，将它们付诸实施又是另一回事。不过，这种麻烦只在首次拜访或官员过生日等特殊场合才会出现，因为同一个人见过数面之后，你与他就像自己的同胞一样熟识，如果这时你要讲究礼数，他们就会先对你说，请不要把我当外人，请你不要恭维我。

在没有被激怒的时候，中国人说话非常文雅平和，但是如果得罪了他们，他们就会十分狂躁，并且报复心很强。下面就是一例：

据说一位官员将饥荒之年皇帝发放给灾民的大米侵吞了。人们到上级衙门指控他，并且证实他收到皇帝拨来的大米400担，但只发给灾民

90担。这位官员立即被罢了官。他离开时，在经过的通道上，他发现并没有人们送别爱戴的官员时必备的装满香水的桌子和换用的靴子，倒是惊奇地发现自己被许多人围住了，他们不是来表示敬意，而是来侮辱他、指责他的。

有些人用嘲弄的口吻邀请他将皇帝分给臣民的粮食吃完再走，有些人则将他从椅子上拖了下来，然后把椅子砸烂。还有一些人坐在他身上，将他衣服撕碎，将他的丝织雨伞撕成碎片。大家随着他来到船上，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尽管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报复心很重，但是他们的报复进行得很很有章法。他们会掩饰自己的不满，甚至对敌人也保持一副公正的样子，让别人以为他们麻木不仁。但是，只要出现了置敌人于死地的机会，他们就会抓住不放。表面上的耐心只是一种心计、一种打击敌人的策略。

有些地区的人非常喜欢打官司，他们为了告状将土地、房屋、货物和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抵押给别人，就希望自己的仇人受到惩罚。有时候，后者私下塞给官员更大的一笔钱，而逃避惩罚，并且让板子落到告状的人身上。

这样就有了不共戴天的世仇，这种仇恨永远也不会平息，直到他们找到机会满足报仇愿望。复仇的一个方法就是夜间烧仇人的房子，这种方法很少使用。因为这在他们法律上是重罪，犯这种罪的人将会被处死刑，官员们在找罪犯的方面很在行。

中国人的谦逊是令人惊讶的。有学问的人非常稳重，不会越雷池一步，事事都表现得很得体。女性好像天生就有这些端庄的品质，她们常年过着幽闭的生活，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甚至连手也藏在宽大的长袖里不让人看到。即使要将东西给自己最近的亲戚，她们也要用长袖盖着手，只将东西放到她们的亲戚能够拿到的地方。

这个民族的最大怪癖是获取利益。当有利益可图的时候，他们就会调动自己所有的伎俩，采用各种方式向那些可能促成交易的人献媚，通过不断的服务来巴结对方，就算是非常小的事情也要充分利用达到最大的目的。

利益是他们的报酬。哪怕是利益非常少的时候，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总之，这使他们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大街上、河道上、公路上总有很多人走过来走过去，一直是处在运动中。

虽然中国人并不像李明神父描写的那样无赖、有欺诈性，但是他们确实不够诚实。尤其是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使用欺骗的手法，在骗局被人当场揭穿时，有一些人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自己的骗术不高明。他们说，你看，我只不过是个傻瓜，你比我更熟练，下次我对欧洲人无话可说了。据说是有些欧洲人教会了他们谋生

的行当。

没有什么比发生在一位英国船长身上的事更加荒谬可笑了。他与一位广东的商人谈好了一大笔丝绸生意。船长带着翻译去了中国人家里，想要查看丝绸的质量。他们打开第一捆丝绸，质地确实不错。但是，其余的包里全是腐朽的丝绸。

船长非常气愤，指责这位中国人不守信用、欺诈。中国人听了之后却回答说，先生，你应该责怪你那卑鄙的翻译，他保证你不会开包查验的。

这种欺骗的技巧在老百姓中常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自己出售的东西里面掺假。有些卖鸡的人知道打开鸡胸的诀窍，他们非常熟练地将整只鸡的肉取出来，填上别的东西，再熟练地合上开口，人们只有在吃鸡的时候才会发现。

还有人会制造假火腿，他们把一种泥巴糊在一段木头上，然后用猪皮包起来，这种骗局只有放在桌上用刀切的时候才会发现。不过，他们只对陌生人或者在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才使用这种骗局。中国人是不会上他们的当。

盗贼很少使用暴力，他们通常会选择狡猾的伎俩来达到目的。有些盗贼跟着船只走，他们常常混入山东省大运河岸上的纤夫当中。那里的纤夫每天都换人，这样他们就会不被人认识。

晚上，他们偷偷摸摸地进入船舱，点上一种香让船上的人昏睡过去，他们就搜遍所有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有的贼会跟踪一个商人两三天，直到他们发现合适的机会才下手。

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当他们听到传教士们离开祖国、朋友和所有的亲人来到异国他乡，为的只是崇拜上帝的时候，他们非常惊奇，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民族的另一特征就是对生活的异常热爱。没有一个民族比他们更热爱生活，尽管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妇女因为生气或绝望自杀。但是，通过发生在穷人中的一些事可以发现，他们更害怕死后没有棺材。

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这么细心，真让人惊讶。那些有九到十块皮斯托尔（欧洲国家旧金币名）的人，竟会把钱用来买棺材，而且是在他们需要棺材前二十多年就购置好，并把它当作家中最有价值的动产对待。不过，大多数中国人患了重病时愿意听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不需要费大力气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为了不漏掉中国人的特征，我再补充一句：没有任何民族比他们对自己的摆阔更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他们国家有各种习俗、生活方式和箴言警句，他们无法相信中国之外会有什么好东西。

虽然自欧洲人占有帝国一席之地以来他们变得谦逊了，但是，他们

无法相信除了他们的博学者知道的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见到欧洲人就问，欧洲是否有大城市、有城镇，是否有房子。

传教士在看到中国人面对世界地图时的惊讶表情常常感到很好笑。有一天，有些学者希望看看地图，他们找了很长时间，最后把半个地球当作了中国，实际上那里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

传教士让他们摸索了一些时间，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求解释一下地图上的字母和名称。传教士说，你看到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亚洲的这里是波斯、印度、鞑靼。那么中国在哪里？他们问道。在地球的这个小角落里，传教士回答道，看看这就是它的边界。他们惊讶地相互看了一眼，用中文说，很小呀。

即使中国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水平非常低，他们也不愿意按照欧洲人的方式去做事情。要想让中国的建筑师按照欧洲人带来的模型在宫中建教堂比登天还难。他们的造船技术非常差，也十分羡慕欧洲来的大船，但是，让他们仿照的时候，他们却很吃惊。

他们说，船是按照中国式样造出来的，如果不够完善也没有什么关系，它毕竟与其他的船是一样的。如果船的式样变了，那就是罪过了。

中国式的幽默

赵志伟

一位大学教授在给学生们上课，他穿了一套过时的西装，领带也未系，蓝色的衬衫领子早已洗得发白，胡子未刮，唯独头理得分外整齐，吹了风上了油。学生们在底下窃窃私议。胆子大一点的问他：“先生，您的头理得很漂亮，为何衣服穿得一点也不得体？”

教授一本正经地问学生：“你们知道知识在哪里？”学生回答说：“知识当然在头脑里。”先生又指了指自己的头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答曰：“这是头发”“不！头发是头脑的‘分枝’。我给头发吹风上油，是为了提高‘知识分枝’的待遇。”于是全场哄笑起来。

又有学生问：“那您为何不买一套新西装以配套？”教授又说：“理一个头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如果还要买西装的话，恐怕我只好饿着肚子给你们上课了。所以只好别着急，慢慢地给其他部门落实政策。一切要向前看，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于是，教室里又响起了快乐的笑声。

这便是中国式的幽默。

我想起了西方一位艺术家的话：“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确实，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作为一种传统，在中国国度里由来已久。从时间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从具备这种幽默本领的人而言，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下至平常百姓。

中国式幽默的特点为谑而不虐，合乎中庸；温柔敦厚，合乎讽谏。即使有讽刺之味，大多以滑稽的形式出之。如上述教授的一番话便是一个例证，它的幽默比起民谣中流传的“穷教授”、“傻博士”之类的戏称要隽永有味得多，也比“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之类的隽句要含蓄得多。

虔诚·隐忍·虚荣·书呆·迂腐·忠厚

周泽雄

虔 诚

中国人的性格矿产是非常全面的。有位女士读了我的《刁滑》后，便判定我拣了一个便宜。她的意思是，“刁滑”并非具有普通意义的性格，平均分布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若让一位瑞典人谈论刁滑，他就可能一片茫然，而中国的刁滑资源则是非常丰富的，一些国人运用起小刁小坏来，灵便程度不亚于使用筷子。

对此我尽管“心有戚戚焉”，却也不敢否认自己确实沾了身为中国人的光，不过我立刻发现，世上没有白拣的便宜，当我此刻试图进入“虔诚”的性格版图时，我意识到，还债的日子到了。

虔诚，正是大中华性格矿产中最为稀缺的品种。中国人之昧于虔诚，正与瑞典人昧于刁滑同。现在轮到我“一片茫然”了。

我曾在去某佛教名山游玩的山路上，见到非常感人的老太，凡行三步，必全身卧倒，做出标准的磕头动作，方始前进。真是三步一坎珂，一跪九莲花。对这位老太的虔诚，我只能本着最大的善意去估量，虽然，这位老太究竟因何迈此苦步，她的精神世界如何，文化水准咋样，我一概不知。

再说，我撰此小书，并无意惊扰或探究世上的苦行僧一族。我承认他们的存在，同时也承认自己对此兴趣寡然，我的评论兴趣不出市井里巷，评论对象始终是寻常百姓。正是在寻常百姓那里，我发现，虔诚要么没有，即有，也是姿态的意义远大于实质，世俗的功利百倍于精神的追求。

中国人在世俗领域中的务实倾向，是非常突出和注重实用的。中国人做出的种种貌似虔诚的行为，背后都有现实的利益或来世的果报支撑着。比如，一个从来不相信佛教、对大乘小乘之别都无所知的母亲，在儿子考大学之前，就可能去庙里烧香捐钱，三跪九叩，行出种种既如临大敌又莫名其妙的大礼。

若外人不察，单看她跪拜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谁都将以为她是世上最虔诚的女人，谁知她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增大利润空间，出门后又到太上老君的像前如此这般地再行跪拜起来。

在中国民间，观音娘娘的香火历来最盛，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也可说，观音娘娘在中国受到的侮辱最大。什么样的烂事馊事坏事，包括麻将的手气，阳具的力度，都可以到她那里去祈求，把个外貌玉洁冰清的菩萨都作贱成什么啦？

观音娘娘若果真“有求必应”，她不成了世上最大的贪官昏君，最浪荡的妓女？不觉想起钱钟书先生援引过的黄庭坚诗句：“设欲真见观世

音，金沙滩头马郎妇。”该“马郎妇”据说正是“施一切人淫”的观音菩萨，一名“锁骨菩萨”。我纵属无神论者，也觉得看不下去。

虔诚是一种宗教性格，就其理想形态而言，应指与现实功利脱钩的性格或行为，理应有一种通灵的属性。我们敬仰某师某人，自觉自愿地恭行某种仪式，履践某种生活方式，当非出于物物交换的目的，而是在精神上别有寄托。

真正的虔诚，当能洗涤心灵，净化情感，提升境界。它的作用在此，亦仅限于此，逾此辄成僭越。虔诚未必非要备齐猪头三牲，行太牢大礼。它的奉献是精神性的，索取亦当止于精神。

然而在中国，宗教意义上的虔诚很少见，我们习惯上最能接受的，亦只是比喻意义上的虔诚，如说某人具有一种艺术的虔诚。而我们见得最多的，则是以虔诚之道对待不必虔诚之物。

一张张充满虔诚的脸，同时却在干着亵渎的勾当，这在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我就亲眼见过父丧不奔的家伙，理由是什么呢？原来他所在单位正面临人事变动，自己那顶小乌纱帽有可能瞬间易手，出于对权势或官阶的虔诚，他只能把老派的孝道搁置不管了。

套用西方人的术语，虔诚者是一神教的，而如中国人之类具有随机信仰的人，则是泛神教、多神教的，所谓的“偶像崇拜者”。他们礼敬的对象，永远随偶像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我也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什么属于虔诚的东西，也许对文字有那么点，但这也是比喻意义上的。

隐 忍

以性格而论，“隐忍”似乎很有质感，来头不小。当我们想到它时，眼前浮现的总是些大人物或厉害角色，如三国时的刘备就是“隐忍”的典型。他在曹操眼皮底下效老农种菜时的谦恭，上厕所时偷偷抚摸那两条因久疏战阵而赘肉横生的大腿时发出的感叹，堪称中华隐忍术的经典范例。

中国从秦朝赵高开始扰乱朝廷的那些宦官，也个个擅长隐忍。他们男性气概上的致命缺陷，一旦被施之于宫廷权谋，好像总能提供意外的方便。说话是如此奶声奶气，举止是如此扭捏作态，以致谁都以为可以轻视他们，无视他们，谁都以为可以不把尔等人看，结果偏偏是他们，经常制造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在中国，我们一般都会心照不宣地承认，想发横财，不坑蒙拐骗不行，想做大野心家，不擅长韬光养晦，同样没戏。

但今天，在制作这张“隐忍”卡片时，我想把笔尖转一转，暂时从那种赵高级别的大野心家身上挪开。在我看来，大野心家的隐忍，本是世界范围的共通现象，西方世界同样不乏此辈。既然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人的性格，我觉得更有意思也更有必要首先探讨的，无疑是这个事实：为什么在中国，历来不乏超功利的隐忍者？

此话怎讲？隐忍，通常总有一个目的，你也可以说成居心叵测或包藏祸心。以刘备为例，他是身在菜园心在朝廷，此刻躬下去的背脊，正为了来日的光复汉室，高踞御座。但如果刘备完全没有那份雄心，就想着自己的自留地，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种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国内却并不少见。中国人信奉“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忍字头上一把刀”，此类格言的泛滥，会制造出种种可悲复可笑的生命行为，其中之一是，在国内我们经常会遇到些目的不明、价值可疑的隐忍。

一个人，可以像天下最伟大的野心家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点头哈腰，在小科长面前都善于把谦卑进行到底，以致小科长们都快要怀疑这家伙居心何在了，到头来却发现，他竟然全无居心。

他隐忍得如此惊心动魄，至陋至贱，似乎只有一个天大的阴谋才配得上这份隐忍的规模，结果，闷葫芦打开后却发现，他所谓“天大的阴谋”无非是希望能保住饭碗，能按时领到退休金。手段如此不同寻常，目标又如此不足挂齿，从功利角度考虑，即使用高射炮打蚊子，也比他的行为经济得多。

所以，我只能说这种隐忍是超功利的——超功利云云，当然只是碍

于我的理解力，也许对他来说，在小科长面前的曲意奉迎，与古代大臣在皇上面前的小步疾走，根本就是一回事，功利大得很哪。一个本无足道的寻常岗位，在他眼里不亚于一座帝国江山，值得用隐忍的方式去捍卫。

更可能的实情是，我们民族中存在着一种习惯成自然的隐忍。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不太容易产生中国式的奴才。我们在电影中也经常看到，西方大户人家的管家先生（想想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那些角色，或电影《蝴蝶梦》中的丹佛斯太太吧），走路往往还格外高视阔步，与主人说话时，甚至有居高临下之势。

在他们的思维里，尊严不是筹码，而是人的基本立场。当人的尊严可以无须呼唤地存在于每位个体身上时，隐忍也就无立锥之地了，即使忍耐（谁都会有忍耐的时候，西方人也不例外），也不妨昂起头来忍耐，不必非要低声下气不可。

然而，隐忍似乎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民族潜意识了，以致我们中一些人常常隐忍得莫名其妙，隐忍得完全丧失了立场和原则。我以为这才是最可痛心的事情。如果他真有赵高的野心，倒也罢了，可他们装孙子的目的偏偏就是为了做孙子——隐忍到这个份上，除了隐忍，他已经什么都不会了。

虚 荣

我有过十多年的教师经历，自打二十一岁离开大学校门，就一直在学校里工作，也理所当然地一直被人以“老师”相称。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缘故，我对内嵌于“老师”一词中的荣誉感，历来茫无所察，只是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职业，就像“律师”或“木匠”那样。

十年前我去居住地房管所办事，诧异地发现其中的办事员彼此都流行以“老师”相称，顿时大感别扭，但不多久我就见怪不怪了。谁都知道，“老师”的称呼早已在社会上泛滥成灾，今天，不仅文艺界有此爱好，企业界（尤其是房地产界）也是动辄以“老师”呼朋引类——人心的虚荣，正得到社会的大肆纵容。我们的媒体尤其喜欢以清仓大甩卖的方式，使用“著名作家”、“国际影星”、“艺术大师”之类称号。

日本人敬语很多，称呼一花一树木，一果一菜蔬，都得前置一个敬语，以示尊崇。按说他们应该比我们更喜欢纵容人心的虚荣，但是，如果你在日本某大学（更别提银行或房地产界了）称某位行政人员为“先生”（意即“老师”），他的第一反应是脸红，第二反应有可能纠正你的称呼，至于是否有第三反应“窃喜”，我不得而知。

和嫉妒一样，虚荣也是我们谁都免不了有一点的品质。和嫉妒一样，虚荣也是我们竭力试图否认的品质。把自己排除在不良品质之外，是人的共性。这件事当然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它表明了人类可贵的避恶趋善倾向，弊端在于，它又同时表明，人们是多么不擅长了解自我。“每个人和他自己之间的距离是最远的。”这话是尼采说的，所以，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认识你自己”，这话是苏格拉底说的。

虚荣，顾名思义，是虚假的荣（名）誉。它既体现了人类对荣誉的追求，又表明人类有一种对荣誉的强烈占有欲。这事儿正邪参半，优劣难分。通常，一个人某方面的欲求越强烈，他的虚荣也就越突出。一个人某方面的能耐越优秀，他在该方面的虚荣也就越能得到平抑。

以中国的房地产大亨为例，众所周知，在他们刚刚出道还没混出多少人样的时候，他们是喜欢被人称为“老板”的。当时，“老板”的称呼还带点港台味，因为“港台味”还很吃香，但现在，随着他们一个个钱包塞得鼓鼓的，私车一年一换，“老板”的称呼猛然间对他们已经不构成敬意了，他们甚至还觉得是一种亵渎，“老师”遂应运而生。唉，我们丢人现眼的行为，往往就出现在对不实之誉的攫取之中。

依据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顺手获得一种方便的观人法：一个人对某种称呼的计较程度，总是能够暴露出他虚荣的领域。虚荣心在该领域的盛衰消长，又可以像温度计那样，准确地反映出他的现状。

他不喜欢别人称他“老板”，说明随着钱袋的增长，他当年的暴发户心态已经得到了克服，他攒钱的事业干得不坏。他喜欢别人称他“老师”了，说明他知识方面的自卑正在抬头。知识的匮乏，既是他的痛处，又是他的痒处。

一旦哪天他确实具备了知识上的自信，部下们再当面称他为“老师”，就未必会收到当初那样的奇效了。我们相信，大学者陈寅恪不会介意别人是否称他为“教授”，只有那些被称“教授”而不去纠正的“副教授”们，才是真正的介意者。他可能还会感谢别人故意漏掉那个“副”字呢。

虚荣可以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的虚荣心能不断提升档次的话。相比较而言，女人在美丽方面的虚荣，就颇为可虑了，因为女人的美色明显不可能随着年龄递增。如果她拒绝进行自我调整，美貌每况愈下，虚荣勇猛精进，结果只能是无尽的苦恼了。

“啊，虚荣心！你就是阿基米德想用以撬起地球的那根杠杆。”这话是莱蒙托夫说的。

书呆

典型的书呆子，请参见下文“迂腐”条。我将书呆子形象特征一分为二，自然另有用意。比如已故大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虽然经常被人说成书呆子，但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显然不能归为一类。抬举孔乙己倒也罢了，贬低陈景润先生，会让我浑身不自在，觉得作孽。

首先我想探讨的，不是何谓“书呆子”，而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擅长将读书人称为“书呆子”，所以这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性格，而是试图探讨一种民族性。据我所知，西方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读书郎，通常礼敬有加，好像并没有“书呆子”一说。

照中国的标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实在是够呆的了，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不惜与魔鬼打赌。但是，他仍然没有被人称为“书呆子”，相反，人们总是愿意从所谓旺盛的“哥特式气质”中去理解他的行为。

若暂时撇开“迂腐”者，我可说，读书人并非中国独有，动辄视读书人为“书呆子”，才是我们的民族特色。所以，研究何为“书呆子”很可能是个伪问题，探讨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称读书人为“书呆子”，倒不乏实际意义。

本人即经常被指责为“书呆子”。我承认自己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两方面都有很大不足，既然不足，自然就有点呆。但若将这点“呆”归结为读书太多，我显然不能同意。

首先，我读书还远远不够，远远没到书虫的地步，其次，我坚持认为，真正的读书人，不可能把自己弄呆，“读书使人明智”，这是法国随笔大师蒙田的话，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类格言，不缺的当然就是“颜如玉”、“黄金屋”、“千钟粟”之类破玩意儿。

仔细想想，中国之所以会产生“书呆子”问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别的原因。我们目前的现状是，可以按是否读书把中国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读书的，一类是从不读书的。

与欧美国家比较，我们在民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反读书群体。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乏这样一种信念：读书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读书是每位现代公民的基础义务，普通人与知识分子在读书上的区别，只在于读多读少，如何阅读，而非要读就当知识分子，不想当知识分子就基本上放弃阅读。

根据我本人的生活经历，我发现甚至贵为大学师长的，现在不读书的风气也甚为风行。在中国，读书总是与可见的功利联系在一起，历史上是科举取士，现当代则是为了高考、评职称。纯粹为乐趣而阅读，为

丰富自己心灵生活而阅读，坦率地说，在中国基本上只存在于若干个体之中。

如此恶劣的求知环境，读书人被称为“书呆子”，也就逃无可逃了。庞大的反读书群体，由于无法理解、拒绝想象阅读对于提升个体修养、增加文明素质、丰富个人生活的积极意义，所以只能想当然地将读书人一概视为“书呆子”。将读书人视为“书呆子”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自己的大老粗身份得到某种捍卫。

在我看来，即使如陈景润一样人的行为怪诞的数学家，也不能被视为“书呆子”。读书、研究达到一定阶段，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飞翔感，会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远离现实生活，直接在精神领域翱翔。

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有可能忘记自家的门牌号码，浮士德也会选择与魔鬼打赌。西方的大量普通人，当然也和你我一样，不具备此种直接在精神领域过日子的能耐，但是和你我不一样的是，他们知道有这种状态，承认并且尊敬进入这种状态的人，所以，爱因斯坦不必担心被人指责为“书呆子”，而陈景润就生不逢地了。

中国有书呆子，但比之中国有书呆子更明显的是，中国更有一种视读书人为书呆子的危险倾向。

迂腐

感谢鲁迅先生，一想到“迂腐”，我们耳边就会回响起“多乎哉，不多也”的声调，想起那位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绍兴穷秀才。“迂腐”和“贞烈”一样，是中国文化特地熏陶出的两种病态性格。孔乙己的下场和旧中国四处可见的贞节坊，则说明了这两种性格的悲剧性，它们分别由男人和女人来承担。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逐圣弃智色彩，在儒家经典中浸淫既久，一个天资敏慧的读书人，都有可能被十年寒窗弄得木木呆呆，遇上中人之资，“迂腐”几乎成了他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他们满脑子利禄功名，思想的范围完全被程朱理学所圈定，因而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一边却不具备任何思想者的品质和热望。

他们的学问是以学代问，学而不问。先秦思想（尤其是四书五经）成了他们的先验标高，对这些思想臣服式的理解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对构成上述思想之文字一字不差地忆诵，也成为他们最基本的课业。

他们生活在亚细亚小农经济的世态格局中，周遭是艰窘困败的日常生计，眼前是缺米少柴的家常境遇，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能，却一屋不扫，满脑子充满“修齐治平”的无上宏愿。他们被强制灌输了过高、过大、过苛的生命抱负，以致其中任何一个家伙都会不切实际地提升自己的人生追求，都会将仅仅成为一位县太爷视为人生的失败。

与此同时，他们受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又是以使自己不具备任何现实能耐为特征的。简而言之，他们是浑然不觉地被某种“废物”模式培养出来的人间怪物，虽然生活在乡村僻壤，却既不会宰牛，也不会插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被“一条道走到黑”地培养出对现实生计的不屑态度。

他们仿佛接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牛痘，该牛痘有效地预防了他们在任何世俗层面上成为有用之人的途径，以致当他们以“安贫乐道”自欺自慰时，事实上却已经完全失去了转道他投的能力。

换句话说，“安贫乐道”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强迫症。当向上发展的空间由于资质或运气的原因而不复存在时，横向发展的途径也随之消失，一旦无法如期成为人上人，就必然成为人下人。

于是我们看到，这批资质平庸的读书郎，虽然满脑子“诗云子曰”，虽然自以为比所有人都更为斯文，更为正经，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游手好闲之徒。一件长衫从春穿到秋，一把破扇从夏摇到冬，肚里一把诗虫，身上爬满臭虫。

除了在某些乡绅家里课读几班顽童，再没有别种混饭吃的能耐，像

孔乙己般潦倒，几乎是这帮可怜鬼的必由之路。他们“迂腐”吗？是的，但账得算到传统文化头上，正如中国古代的贞烈女子之所以形成烈火般强烈的贞操观，同样得归罪于传统文化的邪恶影响。

由于我一次也没有在西方文化中见到哪位读书郎有“孔乙己”式的性格，这使我敢于断言：“迂腐”根本不是一种性格，就像“小脚”根本不是“天足”。

忠 厚

“忠”是忠诚，“厚”是憨厚。忠诚会给憨厚贴金，使憨厚升华，憨厚却只能给忠诚抹黑，使忠诚降格。于是，虽然身居高位者历来欣赏部下的忠诚，忠厚的家伙却只能远离官场，避开庙堂，老老实实地在街坊里巷待着，叭嗒着烟斗，在条凳上矮身长蹲，逢人露一口笑牙，道一声“饭吃了没有？”——那意思当然不是打算请你下馆子，而是表明：瞧，我正和您老人家套近乎呢。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里，忠厚无疑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作为一种性格，忠厚并非四处吃香，比如在欧美民族那里，它就没什么地位，以致我此刻大拍脑门子，竟想不出一位西方世界的忠厚好人。在中国那就太多了，我们完全没必要费神到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去找，随便看看左邻右舍和单位同事，忠厚汉满地都是。

仅仅二十年前，一个男人只要拥有忠厚品质，就足以成为待嫁娘的“那口子”了。就婚姻而言，忠厚者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婚姻之船不遭倾。如果“婚姻是女人的职业”（钱钟书语），嫁给忠厚佬虽然不是什么好职业，一般却不会面临下岗危机。“咱那口子，有贼心没贼胆”，这就够了。浪漫之情固然没有，花言巧语固然不会，但寻花问柳也就不必担心了。

中国传统型妇女权衡利弊之后，往往也就认了。她们认为，婚姻就像钉马掌，首要的就是个“牢靠”。鉴于这个认识有着极大的生活指导意义，大量忠厚佬的存在，事实上便奠定了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基石。小两口不用亲嘴也能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无须调情也能生下一窝健壮的儿女，生活稳健得就像一铺烧红的土炕。

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至少今天的都市女孩，已不再愿意沦为忠厚者的“那口子”了。随着城里女人流行管丈夫叫“先生”（世上最没道理的称呼），择夫标准也随之改变。虽然她们依旧不能容忍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但也不想付出有婚姻没亲嘴的代价，那也太惨了。

现在她们想脚踩两只船，内心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丈夫在内是浪漫的唐寅，风流至极，在外是彬彬的君子，柳下惠二世。今天的女性普遍同意“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甚至还会人云亦云地说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么，忠厚算不算男人样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它突然不算了。

不错，忠厚意味着不会背叛，不仅不背叛婚姻，也不背叛领导，得罪同事，总是两只手忙个不停，一只头点个不休。忠厚是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忠厚者的专长是追随，在家里追随老婆，在单位里追随领导和同

事，永远不会主动发言，永远只会点头附和，一叠连声地说什么“那是那是”。他没有激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不是出于世故，而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的意识层里总要降低一个等级。旁人感觉到侮辱的时候，他充其量只感到一丝不快，旁人怒发冲冠之时，他充其量只觉得有必要把头扭向一边。

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倒也看不出来。所以虽然处处容忍，事事吃亏，好在他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倒也相安无事。相反，任何时候只要自以为赚了点便宜，立刻便扭捏不安起来，内心冲突之激烈，不亚于小偷初次行窃或姑娘首次失身。

中国人喜欢忠厚者，却未必愿意被视为忠厚者。这是因为，忠厚天然有着舍己为人的秉性，它是利他的，长着一只萝卜的样子。生而忠厚，对他人常常意味着极大的使用价值和安全感，对自己当然只能意味着被使用的价值，这一点它和田地里的耕牛非常相似。顺着这个比喻，我们亦可顺道得出结论：忠厚属于农耕时代的品质。

面子·票子·命根子

佚名

中国人爱面子，世界闻名。

有个叫亚瑟·亨·史密斯的美国佬对此很好奇，在他那本叫《中国人的性格》的书中对此作了专门的阐述，只不过，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说了半天，还是让人不知所云。

到底还是咱中国人有能耐，林语堂先生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的实质一语道破：“在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换句话说，面子很值钱。值多少钱呢？那要看你面子的大小。

重庆忠县一姓周的“缩头乌龟”，在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人强暴后，因“深怕事情传出去后自己没面子”，没有报案，而是找对方要100元赔偿金了事。于是，面子就是一张面值百元的票子，只算他和他老婆，每个人的面子只值50元。

不过，要是换成这星那款的，那就摊大了。某歌星因为有人说她“没艺德”，也向对方索要面子费100，不过单位是万元。100万，吓死你。

比钱还值钱的是人的生命，于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面子恐怕就只能用一个人的命来换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没有了面子，命也就没用了，连根拔掉吧。数千年来，多少“不要脸”的女人被装入竹笼沉入河底，还有多少“要脸”的烈女舍身保洁，自绝人寰。

一日聚宴，某公介绍身边这爷：他曾留学东洋，期间，正宗的女朋友就耍了八个，干过不少为当年的慰安妇报仇雪恨的事。于是，这位为国人要回了面子的“民族英雄”受到了全桌哥们儿每人一杯酒的褒奖。在这里，面子已经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了。

人人都爱面子，只是不同的人对面子的定义不同。鲁迅就说了，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丢面子，但要是哪个富家姑爷坐在路边也做着同样的事那就没了面子。但车夫也并非没有面子，赤膊捉虱子不算什么，但要是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嘿嘿，这就丢面子了。

这一条“丢脸律”也适合上等人的，鲁迅由此得出结论：“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多。现在，名为争名誉权实为争面子的官司多系有

身份的贵人所打，我想原因就在于此了。

再者，同是面子，对贵人来说无非就是票子，换成贱人，可能就是命根子了。你伤了我的面子，要你赔一百万，对一个平民而言，你就是把骨头做成扣子卖也凑不够的。

论及性别差异，这面子的含义和价值也有所不同。男人因为要面子而不要命的故事鲜有所闻，但凡有此故事，主人“公”多为女人。倘若两口子吵架，女人丢夫弃子跑回娘家，一般地还非得男人亲自前去接驾以享衣锦还乡之美妙感觉不可。如此看来，比起男人，女人的面子大概分量更重。

只是，男人也不是不要面子的。不少男人，在家什么面子都可以不要，全给女人得了，一旦到了露脸的场合，面子也就是他的命根子，女人要是敢把他脸上的命根子弄没了，说不定就把自己婚姻的命根子也弄没了。

不仅如此，大概男人就是比女人聪明，关键时刻，他能面子票子命根子一起要。不就是老婆要打吗，我钻到床底下得了。“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这不，打没挨着，面子也好像还没丢。

选择权是谁的

冯骥才

一位美国官员在我国南方某城旅游。陪同人员说，今天我们去郊外看一个古庙。去时走一条路线，回来走另一条路线，因为两条路线风景不同。这官员很高兴这样安排。到了那古庙玩了许久，回来时这官员发现走的仍是去时的路线，很不高兴。陪同人员解释说：“你玩得太累了，另一条路线太绕，路程要多半个小时，所以还走来时这条路。”

谁料这官员听了很恼火。陪同人员很气恼，认为这美国人不懂好意，弄得双方都不愉快。回来后，同去的一个外国人对陪同人员说：“你不知道美国人的习惯，事先定好的，他们不喜欢随便更改。如要改，应当与他商量。把两种办法都告诉他，由他自己选择。他们不愿意别人替他们选择。”

这故事挺有趣，是观念不同造成的误会。西方人重个人意志，事事由自己选择和决定；东方传统重官方意志，便寄厚望于父母官的裁定。对西方人来说，选择权是他个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他们个人选择权限很大，比如对居住地的选择，对工作的选择；大学生学习科目由自己任选，凑足学分便能毕业；教授开什么课也由自己决定，他的想法可能挺怪，但别人不能干涉他，除非没人听他的课，乖乖地再进行自我调整。

做什么任由自己，成败听其自然。这样，个人的志趣发挥的机会便多，合理的人才调动自然用不着由一些半懂不懂的人一连盖七八个图章，缺一不可。

由他们这一观念出发，他们认为，不侵犯别人的选择权，是对别人权利的尊重。每见外国人与中国派出的人员研究日程安排，中国人总是客气地说：很好很好，都行都行。往往心里不满意也不好意思说。其实外国人按习惯正是把选择权交给你。中国人勉强自己，也正因为由别人代替自己选择惯了。

如果与别人同做一件事，商量好了，不能说变就变。你改变，是你重新选择，这就势必构成对别人的侵犯。在西方人与人之间这是绝对犯忌的。比如失信、失约，说了不算等。不只是你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是侵犯了别人。

有一次在爱荷华公园，见一妇女拿一件风雪衣与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儿说话，着急又认真，说个不停。过去一听，原来这件衣服一面是绿

的，一面是红的。她非要孩子自己确定是红的朝外还是绿的朝外，她不替孩子决定，这是孩子自己的事。

后来这小女孩儿决定红的，穿上后，两人快乐地走了，妈妈似乎比女儿还快乐。因为孩子已经能自作主张了。选择是我的权利——这一观念西方人从儿时起就深入心灵了。

中国式好人

李敖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

举目览八荒，谁为真好人？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不太弄得清，因此他采用一种检定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二分法”，对他很方便，对被他追问得烦得要命的大人也很方便，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或“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

但在实际生活上，有点头脑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坏人”可没那么简单，这个问题，得仔细研究才成。

孔夫子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他把人做了分类：有圣人、有仁人、有中人、有上智、有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显然不仔细，还是弄不清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到了汉朝的班固手里，这个问题被荒谬地研究过，班固在《汉书》里做了“古今人表”，把人分成九类：

一、上上圣人类——像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是也。

二、上中仁人类——像女蜗、女皇（唐尧老婆）、娥皇（虞舜老婆）、伊尹、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蘧伯玉、子产、颜渊、子思、孟子、屈原、鲁仲连、蔺相如是也。

三、上下智人类——像仓颉、果手（虞舜妹妹）、关龙逢、老彭、鲍叔牙、曹刿、百里奚、介子推、推母（介子推母亲）、董狐、孙叔敖、子贡、公冶长、范蠡、西门豹、廉颇是也。

四、中上类——像愚公、晋文公、赵盾、程婴、公孙杵臼、老子、伍子胥、勾践、长沮、桀溺，豫让、墨子，聂政、孙臧、商鞅、告子、田单、侯嬴、平原君、毛遂、蒙恬、高渐离是也。

五、中中类——像祭足、齐桓公、申包胥、扁鹊、孙子、列子、淳于髡、宋玉、范雎、春申君、吕不韦、荆轲是也。

六、中下类——像公子纠、宋襄公、越石父、吴起、苏秦、张仪、惠施、公孙龙、秦始皇、李斯、项羽、陈胜、吴广是也。

七、下上类——像易牙、崔杼、专诸、庞涓是也。

八、下中类——像瞽叟、象（虞舜弟弟）、商均（虞舜儿子）、夏桀、妹喜（夏桀心上人）、赵穿、赵武灵王、秦二世是也。

九、下下愚人类——像蚩尤、共工、三苗、后羿、商纣、妲己（商纣心上人），管叔、蔡叔、褒姒、夏姬、南子、弥子瑕、阳虎、吴王夫差、赵高是也。

上面这种分类，乍看是智愚问题，其实是善恶问题。班固在这个“古今人表”前面说：

“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他举尧舜为例：“禹、稷、筒与之善则行，玄、灌兜欲与为恶则诛。”）

“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他举桀纣为例：“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菴、崇侯与之为恶则行。”）

“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他举齐桓公为例：“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

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他把“好人”、“坏人”分成九类，成了“九分法”，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他仔细的标准，却是荒谬的。

例如伏羲、唐尧、虞舜是先生级的，就变成上上圣人类，而女娲、女皇、娥皇是太太级的，就变成上中仁人类，这是哪一门子的标准？比干是上中仁人类，而关龙逢是上下智人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周武王的两个儿子是中上类，而周公的七个儿子是中中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这种检定标准是：

第一，道统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道统中的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蚩尤、管叔、蔡叔分到下下愚人类，“非圣无张”是坏人干的事，一个人只要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打着这种招牌，他就被视为好人。

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视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逢、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

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视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视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可以“作之师”，可以颁奖“好人好事”。

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视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但“子见南子”以后，不怪孔子，而怪南子，所以南子在未婚、妲己、褒姒之后，变成了下下愚人类，可算一个例外。

以上五种检定好人的标准，当然不是全部，但都是重要的。这五种标准，都是有问题的：试看道统标准下，出了多少大好巨恶？愚忠标准下，出了多少鹰犬走狗？孝子标准下，出了多少公孙弘式的坏蛋？大臣

标准下，出了多少扶同为恶的权奸？美女标准下，出了多少被歪曲的中华儿女？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事实上，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

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这些例子，都反证了“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是有问题的，这种标准，不但不能选拔第一流优异分子，反倒制造出大量的伪君子、坏人和乡愿，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的好人，他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恣的，特立德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不得罪人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整天做公共关系的、随波逐流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韩孔厂的诗说：“举目览八荒，谁为真男子？”看了目前台湾这种软体动物的芸芸众生，我真要说：“举目览八荒，谁为真好人？”

秩序还好吗！

龙应台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跪在花圃边拔草，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头发里杂着青草。

按铃的什么人听到了我的吆喝，折进了花木扶疏的小径。我用手遮着阳光，觑觑来人，呵，是个穿浅绿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问，一面将手上的泥巴擦在蓝布裤上。

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你们来总不会有好事。”

他翻开手里的一個卷宗，我望望篱笆，苹果枝才剪过，不至于伸到行人头上；人行道上除了三两株长了白头的蒲公英，还算干净，早上取报纸时张望了一下，好像连狗屎都没有；我的汽车，规规矩矩地停在车库里头——你来做什么？

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人。

“这是您吗？”还用说吗！

“您在2月13日下午4时零3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做笔录：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13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10公里；您超过了3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20马克——”20马克，就是大约港币100多块，台币360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叫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50多岁的人有着特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相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

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17公里，超7公里；第二次，15公里，超5公里。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30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10公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10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10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20公里，也就是说，20公里以下的速度已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行速度属17或15或13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下，要求驾驶人为3公里、5公里之超速而罚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度仪上有10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13公里还是10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我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40马克，再不缴，就是60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180马克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受到了打击：“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

影，“恶法非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

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13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好，奋斗到60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道：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新置相机引起争议，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11公里被拍照，罚金20元，市长拒缴。消防队队长以15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20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被照相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妈的！

东方人和西方人



* 中国人就像一大群人挤在一条小船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破坏小船平衡的行为都是要避免的。

——罗斯

融入慧心的悠闲

俞灏敏

融入慧心的悠闲似乎最具有中国人的特色。追求现世的快乐，憧憬理想的实现。中国人用“浪漫”一词来形容逍遥自在、随意自娱的人生，它所追求的就是具有林下风流之情韵的悠闲，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浪漫境界。

中国人喜欢悠闲，一位在悠闲中品尝人生的现代作家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的，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为近情合理的态度。”

这种爱悠闲的性情烙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印记，它不同于印度人那种坐在菩提树下玄思宇宙、冥想来世的悠闲，而是热爱现世的生活，并加以理想的诗化。当然在古代社会，由于人的文化素养高低不同，悠闲也有品位的雅俗之分，士大夫文人有士大夫文人的悠闲，平民百姓有平民百姓的悠闲。

嗑嗑瓜子，东聊西侃；捧着一杯香茶，悠悠地喝上一口，闭目养神；几碟小菜，一壶温酒，浅酌慢饮，还不时地哼上一段小曲，这只是一般的悠闲。而真正达到浪漫境界的只有那种用艺术和哲学的眼光看待人生的悠闲，它不仅仅受到道家思想的浸染，其实也得到儒家思想的认可，曾皙描绘了一幅游春式的生活图景，优雅闲适，孔子不是就很向往么？

这是一种风雅的悠闲，它按照一定的人生理想诗化生活，一半是艺术的情，融入人的性灵，一半是哲理的趣，融入人的智慧。士大夫文人特别倾心于这种悠闲，明人洪应明编过一部很流行的书，名叫《菜根谭》，其中专辟“闲适”一门，载有许多这方面的联珠妙语，如：

昼闲人寂，听数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

千载奇逢，无如好书良友；一生清福，只在碗茗炉烟。

鸟语云光，只是一般景物；读书品茶，仅为平常消遣。然而，要是带着一颗充满情味和理趣的心去听，去看，去消遣，那悠扬之声，舒卷之态，可以疏濬性灵，消除人世间的一切尘虑杂念；读书的意趣，茶的

清香，可以修养身心，享受人生真正美好的悠闲。这种悠闲融入了慧心，又融合于天地。心，生活，宇宙，浑然一体，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

士大夫文人为了达到这种悠闲的境界，全方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风花雪月，山石林泉，琴棋书画，声色酒友，无一不讲究高雅的品位和韵致。清朝有个叫张潮的文人，写过《幽梦影》一书，篇幅虽小，仅一卷，但论述起士大夫文人的生活艺术，却相当透彻，极富一种悠闲的情趣。下面不妨摘录几则来看看：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有一番情境。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款乃声，方不虚此生耳。
玩月之法，皎洁则宜仰视，朦胧则宜俯视。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以上是谈观赏景物的艺术。看也好，听也好，玩也好，品也好，都要有悠闲，有慧心，才能像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所说的，“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享受到别人得不到的“另有一番情境”的视觉、听觉之美。达到这样的境界，人生才算是有趣有味的。

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月下听禅，旨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以上是谈自然与生活相融的艺术。读书论诗，弈棋说剑，听禅访逸，饮酒谈情，都是悠闲的生活，放在自然中，春夏秋冬各为宜，花月雨雪皆有适，无不融入人的性情、人的智慧，更能品味出其中的闲情逸致，同时也更能在生活中领略到自然的妙趣。

人只要有那性情，那智慧，也能在生活中创造自然的美，从而增添在盎然中悠闲的无限情趣。张潮说：

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

风吹松叶，月笼高台，云绕青石，雨打芭蕉，小小的庭院便有风清月明、云出雨细的韵趣；花丛飞蝶乱舞，柳上鸣蝉并欢，池塘曲水，萍藻绿映，充满自然的生机。造此天地是人的慧心，赏此天地是人的悠闲：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

雪的皎洁与高士的品格，花的鲜艳与美人的容貌，酒的浓烈与侠客的豪气，月的团圆与朋友的欢聚，山水的美与诗文的清韵，由自然联想到生活，只有闲人才会如此悠悠地想，全无半点功利的色彩。这想，本身就是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悠闲。

悠闲，能使生活艺术化，充满高雅的情趣，所以张潮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悠闲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散不同，懒散是出于对生活的消极旁观，而悠闲则在于对生活的积极品味。生活是丰富多样的，悠闲最要品味的是人这个万物之灵所特有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人充分享受到自己生命真正的、独特的乐趣。

“能闪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者”，不为追名逐利而奔忙，闲得自在，故能不断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精神的丰富性，又忙得快乐。这鲜明地突出了悠闲那种超尘脱俗的浪漫韵味。

融汇与同化

服部宇之吉

性格矛盾

所谓中国人的矛盾性格是指，中国人同时具有常识的、实际的、理性的和理想的、想象的、感情的这种冷热两种性格。

善综合

在需要冷静地、实际地、常识地判断事物时，情绪常会妨碍理智，想象使得判断力迟钝起来，其结果使中国国民具有一种一般说来能综合地但无法分析地判断事物的倾向，即综合的国民性。

私 心

尽管从“子罕言利与仁与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看儒教是否定利己主义的，但观察中国国民的普遍道德观念，却是与儒教完全相反的，总的行为动机就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就今日之中国来说，中国人是私心重的国民。中国人以利害为本位，利害中又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以公共责任观念薄弱，国家观念淡漠。

爱好和平

后世中国人的自尊和看不起他人，在古代并不存在。虽然古代自尊心不强，但绝无轻侮外族的念头，中国人征服外族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同化，从文化的同化主义产生和平。汉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是从儒教、道教和其他各个方面都能得出的同样结论。

重 礼

中国人的礼中包含有外国人的组织、法律规范、道德教化，但是到了后来，重体面了。重礼，以礼维持国家是中国的国民精神。重礼的结果流于形式主义，从重形式又流于重名义。

番鬼来中国

（英）威廉·C·亨特

一位名叫番鬼的先生最初来到广东时，发现只因为自己穿着紧身衣，戴着高帽子，就成了众人好奇的焦点，这让他很难理解。更使他感到困惑的是，当他与一位自认为能讲一口很流利的英语的中国人说话时，他竟然一句话也听不懂，同样的，对方也听不懂他的话。

面对如此奇怪的用词和如此奇特的语言结构，就算他听说过洋泾浜英语，他也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置身于腓尼基人或伊特鲁里亚人中的外国人。

当一个中国人对他说“My. hin. hin you（我的亲亲你）”时，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会是一种友善的问候。当他去拜访一个中国人，主人把他安排在右座，他也不可能想到这是在表示对他的尊敬。

当“主人”回访他时，戴着帽子进来，并一直戴在头上，他也不可能会想到这完全是出于礼貌。他只会认为对方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但在中国，这的确是一种礼貌。

当他看到一队身着素服，头顶回响着极不和谐的唢呐声和刺耳的锣鼓声的男人经过时，他也不可能想得到，这是一群送葬的哀悼者。

或者当他遇上另一队伍，男人的肩上扛着无数托盘，上面放着穿戴的衣物和奇特的家用器物等，后面跟着一顶遮得严严实实的轿子，抬轿人吹着近似哀婉的铜号声，长长的木轿子发出短促而奇怪的声音，还有铙钹的敲击声，他不可能猜到，在他面前的是一队护送新娘子出嫁的人，而轿子中坐着的新娘，正在被送往她的已订婚的丈夫家中，而他更不可能猜到的是，新郎和新娘从未见过面。

番鬼注意到，在中国，朋友相遇时，行礼的方式是双手抱在一起，举起来，然后落到身体侧面；在名字方面，姓放在最前面，比如放在布朗、乔治、格莱、大卫、布莱克、雅克布的前面；裁缝做衣服不是从中间缝起，而是从侧边缝起的；鞋子，则是前宽后窄，并且鞋底老厚；军人随身佩剑，从右侧上马。

他还注意到，在中国，不再存在世袭的头衔，早已过世的祖先受到敬仰；在把指南针装入箱子时，一个人会不停地念叨：“东、西、南、北”；询问一个家庭中女性成员的健康是允许的；在学识渊博、令人尊敬的长者面前，晚辈要俯首鞠躬，以示敬仰。

番鬼受中国人之邀去赴宴，他被安排在小圆桌旁，一桌四人。每张

桌上皆有鲜花，小杯子里装着大豆，没有刀和叉，而是用纯象牙或镀金银的筷子，每人一双，其他客人也得到同样招待。

桌子从五张到十张，或十五张，或更多不等。他发现不管宴会规模大小，妇女是从来不上桌的。就餐到一定时候，主人手拿着酒杯离开座位，一桌接一桌地敬酒，先与客人稍事寒暄一番，再与其干杯，并用大拇指敲击酒杯，以示喝得见底了，对每一位客人都如此。

他还发现，若在冬季，室内温度低，佣人会拿来软毛皮衣给客人们披在肩上，若在夏季，同桌吃饭的人会脱去上身的礼服。席间，话题免不了谈到中国人的穿着，中国人喜欢穿宽松的衣服，把身材掩饰起来，而他喜欢穿紧身合体的衣服，显露体型。

客人们喝到酒兴浓起来时，他非常吃惊地看到右边的客人举起三个手指，大声喊道，“三”（向边上朋友发出一个信息），那位客人同时举起五个指头，喊道“五”，如此继续下去直至其中一位猜对了两人手指合起来的数目，输者罚酒一杯。其他人逐渐把这个游戏继续下去，直到交织在一起的大喊声和笑叫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最后，宴会结束了，一天过去了，客人离去，主人护送到大门口。主人安排了一顶自己的轿子送他的朋友番鬼，轿子上悬挂的大灯笼，写有主人的姓名和官衔。

回去后，番鬼很快就在蚊帐里睡着了，突然被重棍打在竹子上的急敲声吵醒，他跳到地上，发现是更夫为了保护人们的安全在街道上守夜，更夫为了预防小偷和火灾，居然如此地吵闹。他边进屋边自言自语道：“真是个奇怪的国家！”

番鬼还发现，让人好奇的东西实在是无穷无尽。在中国，白色代表深深的哀悼，蓝色代表一般的伤悲，重新穿起深色衣服表示戴孝的日子结束了，在此之前，家庭的男性成员从不理发。

番鬼还发现，在书中标位置，他会把书页一角往内折，而中国人则会往外折；中国的书名和卷数印在书的封面，不在封底；中国人写东西是从右到左写，不是横写而是竖写的；写信时姓名、地址一律写在文章下方，不使用诸如“Sir（先生）”“Dear sir（亲爱的先生）”、“My Dear Smith（我亲爱的史密斯）”之类的称呼，而是用“仁兄”、“高贵的阁下”之类的称呼，下面署上作者的姓名，并带上谦称，然后是日期，日期的顺序是年、月、日，而不是月、日、年。

在野外郊游时，他会注意到山两侧的高地用以埋葬死人，而低处和平地则用来住人。坟墓做成马蹄形（和希腊字母欧密嘎Omega，Ω一模一样，这真是太奇特了）。没有人要求他“应该轻轻地从遗骸上跨过去”，或突然召唤他“停下，想想自己的后半生，并为之做出准备”。

他试图寻找赞美死者的碑文，却发现只是徒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表明立碑者是出于挚爱、爱戴，或者是出于义务而为死者立的碑，坟墓不记录死者生前的功德，只是葬身之处的一个标记。

他看到，中国人不会因为面对着死者的遗物而悲伤，他们克制自己的悲痛，免得让其他人担心和同情。在“马蹄”开口处，立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死者的死亡日期及年龄；例如“秦氏第六代可波，卒于三十岁，大清道光十五年九月初八立”。

他还发现，在中国，戏院通常是露天的，没有布景，一般都在白天演出，乐队坐在后台，戏院入口和出口不在侧面，而在后面，而且进出口只有一个：左边进，右边出。另外，在西方，那些从商的人使用真名，而中国商人没有一个是这样做的，他们使用的是想象的名称，以表达他们的美好愿望。

众所周知，在中国，男人穿小褂、扇不离手，女人穿灯笼裤；木匠刨木头时，工具朝向自己；在学校，学生学习功课时大声朗读，让老师确信他们的注意力在书本上；如果问及某个东西的长度，得到的回答是“从十中分出三”，而不是十分之三；如果问的是质量，回答是“十个等级中位居第三”，而不是三等品；中国绅士在衣服外面的丝绣腰带上挂两块手表，表面朝外，而不放一块在口袋里。

在西方，询问别人的年龄是不合礼节的，而在中国，却是表示尊敬的。当问及姓名时，正确的问法是：“请问贵姓？”回答则是：“免贵姓陈。”番鬼的衣服有口袋，而在天朝帝国的臣民们穿的衣服上找不到任何口袋。

穿在裤子外面的长统袜和靴子是存放文件的容器，扇子不用时也可折叠起来插入其中，手帕则藏在衣袖里。鲜花从不栽在地上，而栽在花盆里，排成圆形或方形，或角锥形，这样摆放起来很漂亮，且方便搬动。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怪异而有趣的观念与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把鸳鸯看作美满婚姻的象征，把蝙蝠看作生活幸福的象征，把鸭子看作家庭和睦的象征，把仙鹤看作长寿的象征。

中国在签《南京条约》之前是一个快乐、知足的国家，他们的典型特点是勤劳、克己、简朴。他们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样，理智而成功地经历了生存的严峻考验。

旧中国杂记

（英）威廉·C·亨特

中国式法庭

中国人的内政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人不存在愤怒，因为如果愤怒了，就要求得公正，那么一个政党或另一政党就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使之变成一个昂贵的奢侈品。因此对于律师而言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也是西方国家值得借鉴的最好的例子。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法官们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便成立一个新的审判团，于是一个案子便从这个法庭转到另一个法庭上，直到宣判有了结果：判处犯人绞刑或宣告他无罪。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陪审员在时间上的消耗，给每个人带来的不便，经常是非常繁重的。而这样的决定，他的错误并不会比在一个小小的法庭中只有一个法官或地方官员主持的审判所做出的决定要少。

然而在中国，这些耽搁时间、不便、开销上的不必要的浪费都得到了节省，这是因为，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地方官员担当了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的两种角色。法庭只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证词，而双方也要用发毒誓的形式，证明他们的证词是可靠属实的，如果他们的指证不属实，就会让他们应验毒誓。

原被告双方在发誓的时候，记录员会记录下宣誓后所作的言辞。审判时，地方法官会在某些必要的环节上提醒证人，唤起他的记忆。最后得出的是终审的判决。如果地方法官对案件仍有疑虑，或在判决上犹豫不决或不情愿，那么整个案子就可以移交刑部，也就是北京的刑事委员会来解决。据说这种诉讼和判决模式沿袭于远古，而且好像非常权威。

例如：著名的案例“灰阑记”。说帝国早期，有两位妇女同时认领一个小孩，她们为了争夺女儿都自称是孩子的母亲，最后，她们请求地方官员做出判决。于是地方官员就在案桌前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圈，让两位妇女只能沿着圈走，孩子就在粉笔圈中央。然后，他会宣布，哪位是孩子的母亲，她就可以把孩子领走了。

当两位妇女同时抓住了婴儿时，有一位拉得很用力，抓得很紧，以致小孩痛得叫了起来，而另一位见此便马上松了手。最后，地方官员把孩子判给了松手的这位母亲，理由是她的行为完全出于母亲的本能，为的是不让孩子痛。

这个故事是1832年由儒莲先生在巴黎翻译成的外文。人们称它是“所罗门判决”的最初版本。以中国为起点，穿越印度、阿拉伯到达地中海和埃及的商队贸易期间，这远远比所罗门统治的时代要早，最后该故事被传到了西亚。

中国式学校

我们在广东旅行的时候，发现每座城镇、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为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经询问，才知道整个帝国普遍都是这样。

与西方相比，学校的教学体系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当你走到一个村庄时，你会被像歌声一样的朗朗读书声所吸引，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会告诉你是在去往学校的路上。可见他们这种大声朗读的学习习惯，意味着学习者的注意力完全融入到书本中去了。

然而，在这些公立学校中，老师传授给孩子的只是教育中最基本的知识，就像我们最基本的读、写和算术，其他的更高层次的教学是没有的。有些才华出众、勤奋刻苦、并立志走向仕途或从事文学生涯的人，在掌握基础的知识后，会由在社会和政治上已具有一定地位的士大夫资助，继续他的学业。

这些知名人士对民众中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处理公共事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会形成一个非常保守的阶层，反对内外事务的变化、对官方的出轨行为提出抗议，即使不受重视也会因此而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

文学的进步不仅是对一个人（除了戏子、佣人和他们的孩子以外）的开放，它会通过每年的乡试而得到激励。每年有一次会试，由县令和该县的高级文官监考。劳工、技工、商人的儿子通过这次会试都有可能当上帝国的最高官职。

就拿林则徐禁烟运动的例子来说吧。在当时，最高职位的人不由皇帝直接任命，他会把最高的权力暂时授权这个职位的人。文人常常会因敌视外国人而受到指控，特别是敌视在国内地位低下的传教士。可见，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极其排外的国家。

宽容的宗教信仰

中国在宗教方面，也就是说对“不可见的世界”的崇拜和忠诚，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宽容。任何人不管提倡什么，都曾被视为他自身的信念，没有谁因此而遭受迫害或招惹上麻烦。

佛教徒、基督徒、道士、犹太人、穆罕默德的弟子、孔子或老子的信徒都有信仰的自由。他们中的任何一种信仰形式，只要安分守己，就不会受到禁止。

关于基督教，不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东正教，或者是东正教下的无数教派，只要不对当局发泄怨气，信奉者便可以平安无事。而东正教的传教者却认为他们的主张需要演示，于是他们与各省官员有了接触。

倘若他们的演示达不到宽容的界限，那么布道就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在中国政府看来，各种宗教均有传播不满种子，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产生分歧，或嘲笑当局的欲望（如果是现在至少是不公正的）。

总之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中国人更宽容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着像万花筒一样无穷无尽的颜色和形状的变化思想，一旦在儿时出现萌芽，那么最好就由他自己做出判断。

然而，政府认为，一个人不管信仰什么，前提必须是建立在为国家尽义务和效忠的前提上。在这一点上，它体现出了适度和超人的见识。与西方世界相比是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国家有很多不能调和的阵营，常有屠杀、骚乱和暴行的宗教战争发生。十字军东征使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两败俱伤的倾轧、宗教法庭年复一年对异教徒的审判，尽管如此他们到处宣扬的却是“善待他人”。

中国式民主

中国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政府实行统治的一个特点。在民主中，人们的权力和特权被时间和旧俗神圣化，依旧保持了相当的活力。民主这个词的含义，并没有采纳西方的严格的政治性意义，这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政治民族。

他们对关于民主本质意义上的问题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政府任命地方官或其他职务，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因此他们很少会出现互相倾轧、仇恨、敌视或恶性流血的事件。

但在西方国家，由于任命是由公众投票选举产生的，就免不了发生上述事情。而这些，几乎都是国会议员在竞选过程中产生的附属品。在中国，这一点是绝对民主的，那就是一个清朝高级官员不敢随便滥用职权，或者实行专政，因为在涉及那些反对地方官的叛乱的案子中，都有可能追溯到官员不讲公道或企图施行暴虐统治的原因。

在广东，我们亲眼目睹了一次老百姓反抗的情景，老百姓在大街上拦住了县令的轿子，县令被迫而逃，而他的轿子则被愤怒的人群砸得粉碎。

是什么原因激起老百姓的愤怒呢？原因是：抬县令的轿夫弄翻了路旁正在出售的一桶活鱼，而县令却置之不理，命令轿夫继续前行。于是他就被人们从轿子上猛推下来，最后只得步行而逃，轿夫则被暴打一顿。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位卖鱼的人受到了平白无端的伤害，所以人们要为他抱打不平。

相反，另一位官员为人正直，在他告老还乡时，老百姓纷纷赠送他纪念品和礼物，以表达感激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广东李总督在无数个请愿团那里收到了赞扬信，当他离开广东调往别处任职时，有许多官员和百姓跟随轿后，一直把他送到离城门很远的地方。

世界君主统治

1842年签订条约以后，不同种族的人纷至沓来。从种族分类上说，他们这些人被“一统天下”的统治者和居民称为“大洋彼岸的人”或“外国人”。并以“一统天下”而自居，这对于当时辽阔的疆土而言是不足为过的。

除了中国国土以外，北有蒙古，南有交趾支那、暹罗、高棉，东有琉球群岛、朝鲜、日本，西有缅甸。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不完全是出自战争和侵略的结果，上述国家都震慑于他们的道德力量并效忠于它。

因此，中国确立了地理上的中央帝国地位，使周边国家对它的敬仰和依赖，形成了“一统天下”的称号。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威，当然应归功于上苍的恩惠，也就是说天朝帝国本身的存在。由于国民勤劳、本分，物产丰富，因此又有“中华大地”的说法。

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至今为止，东方国家，对于欧洲各国的存在只是在遥传中略知一二，其他一无所知。据历史记载，在3000多年前，中国是通过不定期、不正规、行动缓慢地穿越印度的商队，知道埃及的，这一点从古埃及墓葬里不断挖掘出来的小型中国瓷瓶中得到了证实。

但是对西方人和西方政府了解中国，则是十三世纪后半叶在马可·波罗及他的父亲、叔叔在对华访问时才开始的，尤其是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到来。而且，对帝国当局来说，对这个信息的大致的了解，以免因得知这世上存在不屈服于它的主权而震惊，但是帝国的自给自足、惟我独尊使他们对这一信息并不关心，甚至是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中国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力量、文学、风土人情、哲学家和学识渊博的人，进一步巩固了它的至高无上权威。从而使四海之内都向它报以效忠，被动地接受它的君主统治。

这样看来，当一个中央帝国得知来自西方的新民族靠岸登陆时，他们所遇到的尽是以“世界主权国”口吻表达的诏书和文告，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就像1839年，帝国的林则徐向英国女王陛下传达信息时，也是认定它是世界主权国，信息表明了：“天底下的土地和外国国家都被我们伟大的皇帝拥有”，“有一万个国家被天朝帝国统治着，并最大程度地对各国散播仁慈的影响。”

总之一句话，“世界君主统治”是千百年来千百万人顺从的结果。

优雅的举止、高贵的尊严

“员外”，给人的感觉就像离岗的官员，总是文质彬彬、知书达礼。他们接受过训练，能够自觉遵守等级和职位的高低，从而自命清高、沉默寡言。但是，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费力地推倒“官方人士”。

“员外”是一个非常悠闲的阶层，他们沉着、冷静，带有一种天生的尊严和礼节，不会犯任何错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知道，“尊敬他人”和“服从”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几乎不会因“尊敬他人”和“服从”而认为被冒犯。

我们用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员外的这些特点。

在番禺的一个乡绅庄园，帝国钦差和法国的莱考特·德·拉弟门特先生安排了一次会面，为的是将法国政府的公文递送给帝国钦差。当时罗素家族公司的负责人是圣·保罗·福伯斯先生，他拥有任命法国驻广东领事的权力。我因此也受邀出席。

跟随钦差一起来的还有两广总督、海关提督、该市的首席地方官吏，以及几位官职略低的官员。光随从和佣人，人数就超过两百。

在会面一小时左右时，钦差大人提供点心让满清官员们、莱考特·德·拉弟门特和他的随同人员及受邀出席的客人，坐下来享用。每桌四人，屋子很宽敞，是用中国人非常擅长的形式大加铺张的，有的雕刻，有的镀金，有的打格子。桌子上摆放很多的鲜花，都插在造型别致、漆得很漂亮的花瓶里，很是雅致。

会面的整个仪式让人觉得非常奇特有趣，就连两位与钦差大臣有过几次会面、多次通信的美国人，特别是福伯斯先生也是如此。后来钦差大人被调到北京，然后被派遣与额尔金勋爵谈判，然而谈判的结果令北京政府十分不满，于是命令他又回到了北京。当他一回来，就送来了白绫让他悬梁自尽。

莱考特·德·拉弟门先生及他的随员和客人，参加完在花园举行的仪式后，便回到了法国巡防舰Engone号，海军上将塞斯尔和船长里劳伊所在的leopatrah号船上。

在回办事处的路上，伯爵怀着惊奇和钦佩，不断地讲述刚刚辞别的中国官员的尊严、礼貌、沉着和忍耐，并说：“我访问过众多欧洲宫廷，结识过他们中许多优秀的人物，但就高贵的尊严、优雅的举止和从容悠闲的作风而言，我还从没看到有谁能超越中国人。”

在描述义律船长和琦善之间的一次会面时，约赛林勋爵说道：“琦善见到我们进来，就立刻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迎接我们这个代表团。清朝高级官员的这种态度，让最优雅的欧洲朝廷中的任意一位朝臣，都

感到了莫大的荣誉感。其中的一些人还有着古老的家族史。”

中国战神

在中国的河南庙里，通往右殿路的左边有一个大厅，里面供奉着天朝王国所有臣民崇拜的偶像——中国战神。

据说这个中国战神代表了一个神化了的武士——关夫子（关羽）。“东汉”王朝（公元63-226年）时期，关夫子英勇善战，在汉帝手下任重要的职务。他在平定“黄巾起义”的数次战役中功绩突出。

关夫子英勇威严、武艺高超。在史书《三国志》（三国的编年史）中，这样描写他：“八尺身高、髯二尺、面色暗红、双唇朱红、丹凤眼，脸宽大，举止刚毅而高贵。”

一次，他的一只手臂中了毒箭。由名医华佗为他治疗。当华佗从他的伤口割至骨头挤出毒液时，他继续与人下棋、喝酒，丝毫没有一点痛苦。他在“黄巾起义”即将平时，与魏国（三个鼎立国家之一）的一次交战中不幸身亡。据说他生前常戴的特大头盔，还保存在山东省的一个寺庙里。

精神偶像

除了皇族以外，孔夫子是惟一拥有世袭的人。根据王国的形式，他的姓氏“孔”之后是头衔“公”，相当于公爵，于是他被称为“孔公爷”。在当今的山东省内，孔夫子的直系后裔依旧生活在这个家族的土地上。

孔夫子在中国人中，是惟一享有特权的人，他可以在皇帝面前就座。每逢过年或生日，都能得到皇上馈赠的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这些足以表明了皇上对他的关心。英国领事M. 莫里森先生在几年前去上海的路上参观过这个古老家族的居住地。他向我描述了这个有趣的居住地和家族，说这个家族至今仍保留着他伟大祖先的遗物。

中国的各个城市和地区都有孔庙。庙里既没有他的雕像也没有他的偶像，祭坛上只放一块刻有他名字的镀金牌子。全省的最高官员会定期公开在牌位前焚香，以表达敬仰之情。就连学校也刻有这位圣人的名字。学生们早晚都需在牌位前祭拜一次。

1827年我在广东拜访了西班牙传教士阿密尔特，他谈到在北京时，说孔夫子的后裔——名叫孔秋汉，曾“赏脸拜见了”。孔秋汉是孔夫子的七十一代传人，“也许是世界上有根可寻的最古老家族”。他是一位谦逊乐观的人。传教士对他的评价是：“知识渊博，但绝不自负。”

与孔夫子同期的哲学家——孟子，据说也有后裔，他的家族也居住在山东省，而且与孔夫子家族居住地相距不是很远。像他们这样的两个人物，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千百年来他们的教条从没间断地被传教和推崇，他们的教诲成为众多人的指南，他们对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影响至今丝毫没有减弱。

庆祝活动

中国人为了烘托节日的气氛，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例如：游行、唱歌、赛龙舟。到了晚上的时候，整条街上都张灯结彩，让人眼花缭乱。

如果你要问这些活动有什么意义，他们会很机智地回答你：这是“和平菩萨”，关于神的事情。偶尔我们也会从一位很有学问的人那里知道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很长的传说。这样，我们会觉得很满足。其中的许多节日是有历史考证的，如“龙舟”这个最古老的节日。

追溯到公元前300年，没有人会想到它是来自那个时期的一次悲伤的事件，为了慰藉亡灵而形成的。直到今天，每到五月初五，“四海之内”的三亿多中国人都在为之举行庆祝活动。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中国生活着一位名叫“屈平”（屈原名平）的政府官员，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厌恶现实，于是整天闷闷不乐，变得十分孤僻，渐渐地忧郁占据了他的心灵，使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终时他写下了《辞别赋》，但不知什么原因却没有流传下来。

通过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如何对待病态的心理，感受到他写完颂歌，怀抱石头投入汨罗江的那一时刻的心情。每到他祭日的那一天，附近一带的居民们就会划着船，船上挂着亮丽的明灯去江边，慰藉死者的亡灵。这已成为了当地人们的风俗，直到今天演变成全国性的。

现在每到五月初五那天，全国各地的河里，都会被像蛇一样长的船只覆盖着，上面插着绚丽的彩旗。一般有五组，每组由二十人组成。他们以敲击锣鼓来协调木桨划船的动作。

屈原投江的事件，成了全国人民五月初五普遍遵守这个风俗的起缘，是对许多人不满意而忧郁的解脱。正是屈原的牺牲，换来今天这个节日。

面子第一

（英）麦高温

“面子”在汉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同时又很有趣的词。在这个拥有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里，这个词并不是用来描述人的相貌的，而是代表了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使每个中国人像演员一般在生活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出滑稽戏。

中国人总想在别人面前显得体面和优越些，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算是有“面子”，反之则是“丢面子”。中国人深知体面的好处，因而总在别人面前像演戏一般表现得很体面。旁观者尽管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为了某种排场而上演的一出戏，但仍表现得像出席葬礼般地不露声色，如果稍一显露，就会破坏了整个效果而使主人“丢面子”。

姑且不论“面子”一词隐含的别的多种涵义，大体上讲，它包含了两种主要意思。第一种是荣誉和声望。

例如，有一个人作为公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由此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并且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大名和事迹，使之在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于是，这个人就有了很大的“面子”，这使他成为举国上下敬仰的人物，而他那些住在偏远省份中的穷乡亲们也会不厌其烦地读着有关他的报道，而欲使之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去。

以前，在中国的一座城镇曾有一名官员，他在此地的就职期已满，正准备到其他省份接任新职。他能力过人，政绩卓著，不像官场上其他官员那般压榨百姓。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清廉到了不收取贿赂的地步。他用一万块钱买了这个官职，当然还要把这笔钱再收回去。可是从来也没有人会想过他会收受贿赂。所以，他在卸任时就能够名利双收。

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从未从百姓身上敲诈过什么。而他的那些前任们却因巧取豪夺出了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把正义和怜悯之心抛在了脑后。而这位官员却把维持正义和改善百姓生活状况作为一生的主要目标。

于是，百姓决定送给他一件临别赠物，这赠物凝聚了所有老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同时也使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可以受用终生的“面子”。这件赠物就是“万民伞”。顾名思义，这是老百姓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惟一可以给予他的东西。

皇帝可以授予他辉煌的荣誉，但却不能给他这样一件东西；他的上司们欣赏他为官的刚正不阿，却也无法以这样的赠物来嘉奖他。这“万

民之伞”象征着成千上万受益于其政举的百姓们对他的忠诚和爱戴，所以它也只能由老百姓来赠予他。

这把伞由红绸制成，伞身巨大，伞张开时沿伞沿儿垂下一圈两英尺长的帘子，上面用黑天鹅绒绣着筹备这件赠物的主要人物的名字。除了这些名字外，还有一句简短而感人肺腑的话，“他保护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

现在，这个官员启程的时刻到了。整个衙门里的人都兴高采烈。文书、捕快和拥在夹道上的随从们都高兴得不能自己。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涌来想再最后看一看这位受他们爱戴的官员，衙门附近的那几条狭窄的街道已被人流堵塞得水泄不通。

然而在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中最惹人注目的，要数那被众人中几双强壮的手臂高高举起、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红伞。专门有一个乐队站在伞的两侧准备把它护送到河边，那里停着接官员上路的船只。待那官员走进轿子，刚一起轿，护伞的乐队好像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一般，吹打的声音即刻间响了起来，充斥了整个衙门，接着，他们穿过人群，渐渐远去了。

在这样的场合中，每个中国人都显得十分快活。官员平时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上浮现出和善慈祥的表情。无数张脸上都挂着微笑，无数双黑眼睛都闪烁着欢快的光芒，失去了这样一位正直的父母官，老百姓那压抑许久的肺腑之言都以东方人那种特有的方式娓娓倾诉出来。

送行的队伍在蜿蜒前行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人群从胡同巷口涌出。而那烘托出官员的荣耀和拥着红伞的乐队，也仿佛认为能营造出今天这般场面全靠了他们。他们在吹奏时脸鼓得像气球一般，杂乱而古怪的乐曲声弥漫在空气中，一会儿如绝望的尖叫声，一会儿又显得豪放激昂。

这真是快乐的一天，人们一边观看着游行的队伍和那灿烂的红伞，一边低声交谈着：“今天他真有面子啊！他一定很快乐，当他给朋友讲述今天的情形时，朋友也一定为他感到自豪啊。”

这位官员的确很快乐，只是出于礼节的原因，他只能独自一人坐在那儿，无法和别人分享这一快乐。在他的历史上，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此时，那把正为他遮荫的红伞在他的眼前跳跃着，仿佛成为万物中美的化身，这把伞在他的生活中将具有永恒的价值。

那些仰望着他的人群会散去，乐曲声会消失，他对这个自己曾备受敬仰的城市的记忆会渐渐消弱，但这把伞会永远伴随着他。他会把它带回家，并将它放在供奉祖先灵位的大屋内，在他死后，这伞也会代代流传下去。

“面子”这个字眼包含的另外一层涵义是自尊或尊严，这是中国人在

任何时候都会全力维护的东西，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对是错，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蒙羞的境地，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来维持住自己的“面子”。

例如，一个苦力得知他的洋人老板对他很不满意而欲解雇他。他立刻就编造出一些让他老板莫名其妙的瞎话，说自己不想再干下去了。这位老板也只是个蛮子，根本搞不清其中的奥妙所在，更想不到那人是要挽回自己的“面子”，只是庆幸自己可以摆脱掉这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家伙。

这个苦力离开老板时面带着微笑，因为他尽管丢掉了工作但却换回了“面子”。在这之后的两三天内，他在朋友面前走路的样子都是趾高气昂的。他的一个朋友遇到他说：“哎，顺便问一下，听说你现在不在某某人那儿干了。”

“不了。”他答道，郑重得俨然法官一般，“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了，他既粗俗又没教养，我感觉跟着他是在挫伤自己的个性，所以我辞退了那活儿。他恳请我留下，甚至愿意增加我的工钱；但你应该知道，钱并不意味一切，我还是离开了他。”

“当然你不应该再干下去了。”他朋友说。他们俩人都一本正经地看着对方，好像都很认真的样子，其实却不然。这个朋友并没有受骗，他知道那个家伙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而在演戏，并且凭着一种中国人的本能，他也进入了角色，表现得好像被完全欺骗了一样。

为了挽回面子，人们常采用一些荒唐可笑的把戏，如果没有这些把戏，必然会丢尽了面子。这其中的一个就荒唐之极，而且也只可能出现在中国。

例如，有一个富人触犯了法律。官府对他发了逮捕状并传唤他在某一天上庭受审。他很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行。并确信等不到上庭审案就会被按倒在地遭到捕快的杖笞。这一奇耻大辱必定会让他在朋友面前丢尽面子，但在中国，金钱是万能的，有很多巧妙的方法能够使有钱人不失体面以渡过难关。

受审那天，当他来到衙门口，一群徘徊在那里的人一下子将他围住，争着要替他受罚。这些人是专门靠替他人承受鞭笞来谋生的。对他们来说，挨打并不伤体面。他们并没有犯罪，只是以这种方式光明正大地谋生，受刑过后，他们仍可以清清白白地离开法庭。

于是，富人开始同其中的一个讨价还价，因为他挨多少鞭笞，富人就要付给他多少块钱。接着他走进了衙门，一副坦然的神情好像无辜者一般；而那个要真正受苦的人却显得心虚，悄声地跟在富人后面，大气也不敢喘。当他的雇主对簿公堂时，他在后面缩成一团，而那审案的官员也受了贿赂允许他使用替身受过。

现在，真正的闹剧开始了。富人跪在县官面前，县官郑重而严厉地痛斥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最后，他命捕快用竹板杖答这富人。命令一下，富人便迅速爬了起来站在了一边，而那个他指定的人被狠狠地按倒在地，此时，公堂上就只听到行刑的杖答声和一阵痛苦的叫喊声。

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人们并不去加以掩饰。县官和捕快都清楚那个在地上挨打的人不是罪犯，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至少通过替身而使正义得到了伸张，富人也因此而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他节余下来的钱通过间接的方式最终投进了县官的口袋，最后他会发现为了挽面子，他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面子”的观念遍及整个中国，人们总把它同人类生活之外的许多东西相联系，总是谨慎小心而不使有失尊严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以至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衙门就是其中一例。衙门是那些代表皇上行使权力的官员的宅邸，是控诉罪恶与压迫的地方，是维护社会安定的纪律象征。因此，维护其在老百姓眼里的威严和声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为了使大家理解这一点，有必要说明一下，就在衙门的大门内悬挂着一面大鼓。古时代有一位英明的帝王，他知道官员们审案很难做到雷厉风行，于是命令国内的每个衙门里都要有一面这样的鼓，在情况紧急或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时，人们可以来敲这面鼓，以免因迟缓的法律程序而误事。

于是，官员们无论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候，都随时有可能出来听审案子。显然，这是有损其往日的尊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衙门由于暂时被剥夺了那对大众形成威慑的威严而丢掉了面子。

因此，为了恢复这一度受损的威望，在听案之前，那些擅自击鼓升堂的告状者都要受到轻微的鞭答，这已成了衙门里不成文的规定。这样做不仅仅抬高了衙门的威望，也挽回了面子。

我们今天的“面子”思想并不是现在的产物，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了。据记载，周朝时一位很有名的王者发现他的宰相有收取丝绸作贿赂的习惯。他并不想责罚宰相，因为很需要宰相的辅佐。他想使宰相改掉这个毛病，但又要不伤宰相的面子，好让宰相能继续任职。

于是，王者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一天，王者送给宰相大量丝绸作为礼物。宰相前来拜谢时，表示很惊讶王者送给他这么贵重的礼品。

“我听说，”王者说，“你很喜欢这样的礼物，所以我想你收到我这样的一份礼物也会很高兴。”宰相立刻意识到自己收取贿赂的事情败露了，但看到王者用这种和善的方式来告诫自己，他知道王者这次宽恕了他。同时，他也保全了“面子”，所以自己仍然可以继续辅政。

人们不仅仅出于维护自己的体面而极力去挽回“面子”。把眼光放宽一些，我们就会发现，人们并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尊严或只想使自己避免

出丑而不顾其他。这个民族的特性使人们彼此之间在感情上有一种微妙的影响。人们对任何有碍自己体面的事情都很敏感，同时也热衷于维护其邻居的面子，使他不蒙受羞辱。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我的意思。

在我所管辖下的一个乡下教堂里，那儿的传教士很不受欢迎。他的言辞拙劣，没有一点儿诗意和想象力，他传教的方式刻板而毫无生气。生活中他几乎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不仅不会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在言语中表现出自己的慈悲心肠。这个人简直无趣到了极点。

最后，教民们都不喜欢他，想解除他在本地传教的资格。但如何办这件事却很棘手，因为那会让他“丢面子”的。如果让他暂停传教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也避而不谈，由于教民们想出的许多办法在实行时都可能伤及传教士的“面子”，因而被一一否决。

于是几个教民的首领把此事托付与我，让我想法解除这个与他们毫无联系的传教士的职位。这事对我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我也无法做出有伤他面子的事，于是就编了一套让他觉得莫名其妙的说词把他调到另一教区。

在给这个传教士安排到另一教堂作传教士之后，我让他写了一份辞呈，然后就去通知他原来的教民，告诉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传教士辞退了这里的传教工作，因此，他们必须再找一位来做他们的导师。宣布这一决定时，人们脸上的表情装扮得像演戏一样逼真。他们看上去好像惊呆了，脸上呈现出由于惊愕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人们开始抗议并恳请传教士收回辞呈。如果我不了解其中的原委，也不知道教民的真实想法，我真是会被骗的，也和他们一起劝那位传教士看在教民一再挽留的份上收回辞呈，但我没有那么做。

相反，我宣布说教士的意思很坚决，已没有更改的余地了。一会儿过后，挽留的声音才安静下来，教民最终接受了教堂传教的职位暂时空缺这一已成定局的事实。

现在，这些人不应因其虚伪而受到谴责。他们出于善意的动机而上演的这出戏保全了教士的体面，尽管他们对他的传教方式毫无好感。他们本可以毫无人情味地把报酬交给他，并告诉他教民不再需要他了。这也许将使他几年内在教堂里的名声蒙受羞辱。他们想保全教士的自尊，所以才采取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但整个事件却没有以那天的表演而告终。大约几星期后，仆人来到我的书房告诉我，那几个首领和这个教堂的传教士想见见我。我心里琢磨着他们找我会有什么事，在他们落座并彼此互致寒暄之后，我很客气地问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和我商量。

其中一个最有身份的人告诉我，他们为失去了教士而深感不安。自

他辞去后，整个教堂里显得杂乱无章，情况很让人担忧，他们来就是想和我商量看能否对他重新考虑一下他的决定，请他看在他们一再恳求的份上留下来继续为他们指点迷津。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表明了这层意思，并罗列出充分的理由让我劝他撤回辞呈。我被他们搞得不知所措，就是这些人在不久前费尽口舌让我设法把他调走呢，我做到了，可现在他们又来了，还带着这个他们打心眼里十分讨厌的家伙，就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滔滔不绝地陈述着挽留他的理由。

而那传教士也站在我身边，说他已下决心接受了另一个教堂的邀请准备到那儿传教。又谈了些其他的话题之后，他站起来离开了，因为他还要再赴一个约会。

当他走出门后，我冲着那几个人厉声说道：“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搞出这么些名堂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开始说不想要这位教士，我出于同情给他安排了另外一份工作，并成功地照顾了大家的面子，而现在你们又来这儿恳求让你们无法忍受的人继续做这份工作，这把戏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这个时候，这些人仍保持着一副严肃的表情。他们连眼皮也不眨一下，脸上更没有流露出一丝正在作假演戏的神情。

其中一个人的表情最为庄重，他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脸上带着出自内心深处的微笑，他仰起头对我说：“我们想摆脱这个人是一千真万确的，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不能让大家看出这一切。那样的话会使他丢尽颜面，甚至在今后的几年内也无法挽回。而现在，他离我们而去时保全了面子，人们对他一再挽留的事情也会在他即将上任的教堂里被传扬，他到那里可以抬起头了。”

他在慢慢地讲这些话的过程中，笑容在他的脸上一点一点地泛起，最后弥漫到他的整张脸，那双透着点幽默感的眼睛也不时地闪烁着光芒。其他人也为他们一手炮制出的这出喜剧发出了会心的笑。那笑容如导电一般，从脸庞延展到前额直至发根。他们的笑是如此有感染力，连我也和他们一起发出了出自内心的大笑，那笑声在整个屋子里久久回荡。

中国人具有着无穷无尽的幽默感。若没有了这种幽默感，他们就无法去承受他们不得不承受的辛劳、饥饿、痛苦和种种磨难。它就像是从天堂里照到我们身上的一线光明，就好像是欢快地唱着歌儿沿山而下的潺潺小溪，就好像是遮天蔽日的层层云雾中的一道彩虹，给灰暗的天空带来一段美丽，让人们感到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也会有一丝光明的存在。

在所有可能展示这种美妙的天赐的幽默感的方式中，没有一种能像

这种有趣而普遍存在的风格一样，为此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国人那古怪奇妙的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的欣赏都通过这一风格体现出来，令人欣慰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这种观念已从完全维护个人体面的最初阶段，发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并开始兼顾自己和他人的“面子”了。

无往而不胜的中庸

蔡元培

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

中 庸

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唯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这可用两种最有权威的学说来证明它：一是民国15年以前2000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

儒家所标举以为模范的人物，始于4000年前的尧舜禹，而继以3500年前的汤，3000年前的文武。《论语》记尧传位于舜，命以“允执默中”。舜的执中怎样？《礼记·中庸篇》说道：“舜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尚书》说舜以典乐的官司教育，命他教子弟要“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宽与刚简，虽是善德，但是过直就不温，过宽就不栗，过刚就虐，过简就傲，用温栗无虐无傲作界说，就是中庸的意思。

舜晚年传位于禹，也命他允执厥中。禹的执中怎样？孔子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若是因个人衣食住的尚俭而对于祭品礼服与田间工亭都从简率，便是不及，又若是因祭品礼服与田间工事的完备，而对于个人的衣食住，也尚奢侈，便是太过，禹没有不及与过，便是中庸。

汤的事迹可考的很少，但孟子说，“汤执中”是与尧舜禹一样。文武虽没有中庸的标榜，但孔子曾说：“张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是文武不旨为张而弗弛的太过，也不旨为弛而弗张的不及，一张一弛就是中庸。

至于儒家的开山孔子，曾说：“遭之不行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又尝说：“过犹不及”，何等看重中庸！

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求文质的中庸。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我无可无不可”。是求可否的中庸。又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减而不猛。”他的弟子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都是中庸的态度。

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篇，是传述祖训的。

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例如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往往又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

尊民权的或不愿有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又往往蹂躏民权，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四权，专关于用人、制法的大计，谓之政权；给政府以王权，关于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庶政，谓之治权，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是为人民与政府权能的折中。

持资本主义的，不免压迫劳动，主张劳动阶级的专政的，又不免虐待资本家，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生主义，一方面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资本家的专横，又一方面行种种社会政策，以解除劳动者的痛苦，要使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相冲突，这是劳资间的中庸之道。

由此可见，孙博士创设这种主义，成立中国国民党，实在是适合于中华民族性而与古代的儒家相当。

礼仪之邦

（美）古德诺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稳定的，经过漫长的历史不会改变；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是悠久的，永远不可能被打断；中国的人口是超级多的，人口的巨大压力可能造成的混乱和暴力，对社会进步乃至社会生活本身都是极其危险的。

因害怕出现这种危险，中国人总是在尽可能地避免混乱和暴力的发生，因此，中国人极为崇尚和平；同时，中国人所普遍接受的儒家思想观念也反对用强制手段来保证道德规范的实行。

总之，上述的这诸多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找到像中国人一样的温良、谦恭的气质。

中国人有一整套的礼仪规范，他们做每件事都很注意讲究礼节，甚至一个微小的动作都是一种礼节，几乎到了表演某种仪式的程度，这常常使得与他们打交道的欧洲人感到无所适从。欧洲人的日常行为很随便，哪怕与中国社会的下层人士相比都会显得粗野，即使是非常讲究礼貌的欧洲上层人士，和注重礼节的中国上层人士站在一起，也仍然会显得很缺乏修养。

中国人在与人打交道时过多地追求礼节的周到，无疑会给人造成一种不真诚的印象，这些礼节看来更多地似乎是为了避免矛盾、避免发生冲突、造成混乱，因为严重的混乱会危及到社会秩序。

正如罗斯教授在他的《变革中的中国人》一书中所说的，中国人就像一大群人挤在一条小船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破坏小船平衡的行为都是要避免的。要想这条处在平衡状态的小船不被颠覆，必须要坚持的原则就是不要让小船有任何摇晃，否则全船人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

中国人是十分忠诚和友善的，他们的生存条件使他们受到了严格的训练，让他们认识到：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都应承担义务，这样社会生活才能正常进行下去。

东方人和西方人

卢秋田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差别是东方思维方式讲究求同原则，而西方更强调求异原则。这种差异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如果大家留心就会发现，中国人喜欢的东西一般具有大、新、同的特点，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小、土、异的东西。

比如说，漫步街头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招牌：“天下第一面”，乍一看挺唬人的，走进去一瞧，不过是间小小的烩面馆，两三个伙计，四五张桌子，七八个顾客，让人啼笑皆非。再往前走不远，又见到一家用巨大的涮锅装饰的门面，比涮锅更大的是它的招牌：“天下第一锅”，其实整个店面也就顶个招牌那么大。

这种贪大求全的现象在房地产界体现得也是淋漓尽致：明明是楼间距不足15米的住宅群，偏偏叫什么“广场”；地砖缝里长出几棵小草，就改称“花园”；盖成长长一排的房子没准就是“连体别墅”……

1. 标新立异的西方人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量，这样贪大求全的现象不能不说是我们求同攀比的思维方式在作怪。所谓攀比，无非有两种，要么是别人不能比我高、多、大等，要么是我不能比别人低、少、小等等，哪怕是仅仅从名义上拥有呢。

这一点从征婚启事上也可以看出来。随便翻翻报纸杂志的征婚栏目，常常会看到“某男，多少岁，身高若干米，留美博士，或英俊潇洒或成熟稳重，事业有成（即有车有房乃至有名车豪宅），欲觅多少岁以下（通常是比自己小2~10岁），身高若干米（通常是1.65米）以上，相貌美丽，皮肤白皙，温柔可人之女士为友”，反之亦然。相当格式化。姑且不论其中有多少是不实之词，这至少说明了一种社会导向。

反观欧洲人的征婚启事，我们很少会看到这样的陈词滥调，大部分人会写出自己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如：“我，金发素食主义女郎，喜欢大自然，擅长游泳和瑜珈，觅能与我共享此美好人生的志同道合者为伴。”鲜明的个性呼之欲出。

在西方没有“奇装异服”一说，你就是穿得再惊世骇俗，大家也会见怪不怪，处之泰然，没准还有人夸你“别致”。因此，在西方，想要“引人侧目而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大家都在标新立异。这跟西方重视个体的传统及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喜欢求同的思维方式亦是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孔夫子的“中庸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表现为不敢为天下先，正如俗语所说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一般来讲，中国少有变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不“争先”，却很“恐后”，一俟某种变革渐渐占了上风，成了主流，大家又会忙不迭地随波逐流，惟恐自己落在了后头。

中庸思想经西汉的董仲舒发扬光大，遂成大一统思想，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高悬于顶的最高道德原则。体现在国家理念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而重视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井然有序。“家和万事兴”，做事要讲究和睦，“和气生财”，人与人之间要讲究和睦，团结就是力量。至于人和自然也应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长此以往，服从、附和、求同等品质被视为美德而大行其道，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家庭和睦乃至生态保护都可称得上功不可没，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它也会使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甚至成为不讲原则的“和事佬”。

例如，国内很多出访团组在结束访问时，往往会感谢当地接待方说：“你们的国家非常美丽，你们的人民很友好，你们的接待很周到。”对如此面面俱到、热情洋溢的赞扬，外国人有时似乎显得并不领情，尤其是经常接待中国团组的人员，他们会奇怪：这么多中国客人万里迢迢从东方来到西方，为什么都是这么几句话呢？难道没有一点不同的感受？

后来有个代表团在回国前夕答谢之时除了上述“老三篇”以外，代表团团长还补充道：我现在想提点建议。对方马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洗耳恭听。

第一条是建议你们的介绍材料译成中文，因为中国来的团组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德文；第二条是晚餐的牛肉能不能煮得更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无法消受，再说天天吃牛特产我们也不习惯，可否考虑为大家准备些方便面；第三是希望你们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交流。

德方听了觉得特别好，当即表示非常感谢，这些意见有益于改进接待工作，所提的意见中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早着手去做。一时做不到的，至少也了解了你们的真实想法，以后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事过很久之后德国接待方负责人同我会面时还不无感触地同我谈起这三点建议，认为这种不同的声音难能可贵。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实例：荷兰政府公开发行的宣传片中，出现了一

个要饭的，虽然不是衣衫褴褛、不堪入目的那种，但的确是个要饭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恐怕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事，避之惟恐不及，哪有大张旗鼓去宣传之理？何况荷兰的乞丐也并未多到满街都是。

然而，荷兰人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把他表现出来，似乎大家也都没把它太当回事，因此也没去向政府抗议、请愿什么的。这种思维是否值得我们玩味、深思呢？

2. “大处着眼”的中国人

中国人重整体性的思维特点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写信封总是先写国名、省名，接着是市名、区名、街名，然后是门牌号，最后才是收信人的名字，而且名字的先后顺序也是先姓后名，体现了对整体的重视。西方则恰恰相反，写信封是先名后姓，然后是门牌号、区名、市名、省名、国名，整个颠倒过来了。

再比如写简历。我们通常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诸如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出生于某地，以前甚至连家庭出身都得交代清楚，然后是何时到何时上小学、读中学、念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就职于何单位担任何职务，逐条逐句交代得一清二楚。如果是求职或申请类的简历，则在最后大多会来上一段表态的话，看起来四平八稳。

西方人的简历则很少追溯至大学以前，而是经常会谈及自己有何特长及兴趣爱好，对将来有何期望等等，鲜明的个性跃然纸上。

中国人习惯于从“大处着眼”，深谋远虑，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思危”，为了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可以放弃眼前的享受，深信“守得云开见月明”。西方人想问题则是先想个人的、眼前的，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然后才会考虑社会的、长远的。

比如我认识一个姓杨的老华侨，他在德国开了家中餐馆。由于努力工作、经营得法，生意做得很是红火，也赚了不少钱。但他依旧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赚的钱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一部分用于孩子的教育，还将一部分存起来以防万一。而与他同时起步做跑堂的德国人，现在在为杨先生儿子的饭店打工，仍然做招待。

一个省吃俭用已经成为很有实力的老板，一个仍然与过去一样，他们之间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差别，除了节省等原因外，还有对人生的追求不一样。一个是要发家致富，为了后代努力积累财富；一个是为了自己过得好，今日有钱今日花。两种人生观也反映了两种文化。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像他这样，其实德国人比起有些南欧国家的人来说还算比较节俭的。德国有句俗话叫“不怕穷，就怕老”。因为西方自我意识强烈，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一般是：并不是我自己要出生，是你们决定生我，既然你们决定生下我，就理所应

当地对我负责，直到我成人为止。

同时，随着西方出生率的普遍降低，许多国家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人们生育，有些福利甚至把小孩从出生到上大学的一应花费都包揽了，所以西方父母不需要怎么含辛茹苦就能把孩子养大了，一俟18岁大部分西方青年就相当独立了。即使有事向父母拿钱，也是有借有还，至于将来如何对待父母全看个人的关系，就像是处朋友一样而没有必然的孝顺观。

因此许多老人生活得非常孤独，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听德国老人羡慕中国尊老爱幼拥有天伦之乐，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吧。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来分，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请言其大者：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自西汉以来，黠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擅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

斯说也，吾无以易之。若西洋诸民族，好战擅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

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曰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到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

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

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

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纲。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

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之重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此。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

或谓西俗，夫妇非以爱情结合艳称於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

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

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

夫妇生活之外无有余赘者，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英国贵妇人乃以爱犬不爱小儿见称于世，良以重视个人自身之利益，而绝无血统家族之观念。故夫妇问题与产子问题，不啻风马牛相去万里也。

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

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

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人。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

昆季之间，率为同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事蓄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兹？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

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

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

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中国人与西方人

佚名

从词汇看人格

如果给你一支笔一张纸，让你尽可能地写出描述一个人特点的形容词（这个人可以是你的邻居、朋友或你自己），你能写出多少词？又会选择什么词？你是否知道这些词语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你所看重的人格因素？

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和奥伯特经过长期研究指出：在某一社会中，长期使用的所有语言，应能包含描述生活在这一文化中人的所有特点的词语。他们从1925年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的40万个词中，挑选出能够描述个人行为 and 人格特点的词约1.8万个。

以后又有许多研究者在阿尔伯特和奥伯特的词表中不断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词语化简和归纳，就像画航海图那样，试图总结出人格的维度（人有成千上万个特点。如有的人非常健谈，喜欢与人交往，而有的人把独处视为最佳的享受。把人这些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特点集中起来，将其中最为相近的一些特点归纳在一起，用几个简单的方面来概括所有的人格特点，在心理学研究上，便被称做人格维度）。

1942年，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对词表进行了分析和压缩，总结出16项人格因素，形成著名的卡特尔量表。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图普斯和罗克斯特对卡特尔量表重新分析化简，最后得出五个“描述人格的维度”，简称“大五”。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心理学者继续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在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中（主要是欧美国家，亚洲的菲律宾等国）抽取样本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了与“大五”较为一致的人格维度。一时间，西方学者把“大五”看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似乎“大五”成为全世界人的人格特点。

那么，这个“大五”是不是也适用于中国人呢？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人格上会有什么不同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博士与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杨国枢先生从1990年开始合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时进行中国人人格的研究。

王登峰教授从《现代汉语词典》、小说、报刊、影视剧和学生语文课本中挑选出描述人格特点的词汇8000余个，然后再化简至400个词，并在大陆各高校找了近2000名被试者进行样本分析。1999年初，终于完成了中国人人格维度表（大陆）。王将此表与台湾学者的研究结果一对照，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而与西方的“大五”对比，两者果然不同！

1. 西方学者研究得出的“描述人格的维度”

- ①外向，有活力，热情
- ②愉快，利他，有感染力
- ③公正，克制，拘谨
- ④神经质，消极情绪，神经过敏
- ⑤直率、创造性、思路开阔、文雅

2. 中国（大陆）大学生的“描述人格的维度”

- ①势利浮夸（卖弄、炫耀、贪心）
- ②外向开朗，内向拘谨（乐观、活泼、健谈）
- ③沉稳干练，迷糊懦弱（恒心、毅力、沉稳）
- ④善良宽厚（友爱、好心肠、和善）
- ⑤暴躁固执（急躁、暴躁、刚烈）

3. 中国（台湾）大学生的“描述人格的维度”

- ①势利浮夸
- ②沉稳干练，迷糊懦弱
- ③善良宽厚
- ④外向开朗，内向拘谨
- ⑤暴躁固执

面对同样的情境，中国人、西方人各自如是说：

1. 在选择配偶时

中国人说：他这人心眼儿好！

西方人说：他令我眼前一亮！

分析中国的“描述人格维度”表的第一项，可以发现中国人重个人品质，西方人重外在表现。

一说“这个人”，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的外在表现：是否有活力？是否热情？是否健谈？……而中国人是从“这个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来看，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描述人的前提。中国人关心的是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小人还是君子”，外表印象并不很重要。这一点在中国人的交友、择偶方面表现很明显，在选拔人才时也强调德才兼备，“德”是放在首位的。

应用：如果你和西方人打交道，应该明了西方人很注重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外向开朗有活力的形象往往能给对方以好印象。在与人交往，比如做生意时，这样的印象往往可以使事情好办得多。

而西方人如果要想和中国人交上朋友，“日久见人心”便显得很重要。中国人要看你的优秀品质，外表的虚话中国人不信！

2. 在人际交往中

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西方人说：他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我们都喜欢他。

把西方“人格维度表”的第二项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维度表”的第四项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西方的人际交往特点是直接指向他人的，是较流于表面的浅层次的东西，比如令人愉快、有感染力等。

而中国年轻人的人际交往特点是直接指向个人品质的，是内在的东西，如善良宽厚、好心肠、和善等。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生活比较封闭，人际交往圈子小，所以非常注重选择交往对象的品质。

西方人爱开鸡尾酒会，一大群人凑一块儿，打打哈哈，聊聊天气。而中国人则讲究三五好友，一壶清茶，推心置腹地深入交流。正因为两种人际观念不同，所以常会听说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外国时常显得很孤僻，不合群。他们总想和人品好的人做朋友，而不习惯于和周围人泛泛的交往。

应用：现在中国年轻人人际交往的圈子不断扩大，如果只重视内在的东西，而不注重表面形式的话，人际交往也会产生困难。在人际交往中不但要看对方的内心，表面浅层次的东西也不可忽视。这对年轻学生来说，是走向社会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修炼内容。

3. 做事风格

中国人说：重要的是沉稳干练。

西方人说：关键是公正，不然你越能干，问题越大。

两个人格维度还反映出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做事风格。中国人讲究人要“沉稳干练”，有“恒心”、“毅力”，这些都是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西方人则十分看重“公正”、“公平”。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讲“公平”、“公正”，只不过中国人的“公正”会随具体情境和人而变化。同样做一件事情，中国人与朋友合作和与陌生人合作，其“公正”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做，那么在利益分配、分工等问题上，中国人会寻求一种大家都较能接受的公正，这是根据“我”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来权衡的一种公正，而在与陌生人共事时，此时的“公正”就与彼时的“公正”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人”的观念很重，人与人之间亲疏关系不同，做事原则和方法也就不同。

西方人的“公平”、“公正”则是铁定的，很少随情境人情而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碰到利益问题时显得那么冷冰冰、不近人情的原因。无论你抬出什么友情，亲情，他们都会对你耸耸肩说：“对不起，一切按规定办！”

应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不要指望着凭你与他的私人关系得什么便利。

4. 关于创造性

中国人：看上去没有可行性的东西就不考虑。

西方人：我们喜欢异想天开！

在西方学者研究的“描述人格维度”中有一条“直率，创造性，思路开阔”。这一点在中国人的人格维度中却没有发现。

西方人比较注重独特的东西，思维上的约束规矩较少；而我们中国人更强调共同的东西，强调共同就会有一些严格的约束，客观上也会影响创造性的发展。

例如，遇到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脑袋里闪现出一个解决办法后，他旋即又会想到更多的不可实施性，于是就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而西方人则会肯定自己有了一个想法，再来一步步论证这个想法是好是坏，好在哪里，又坏在哪里，怎么去克服困难。总之就是勇于去尝试解决。

应用：知识经济最核心的原则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21世纪需要具有创造性思维的高素质人才，因此从个人来说应当进行一些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而在大环境上，不论是搞教育或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搞实际工作，我们都应营造出一种氛围——一种鼓励充分发挥创造性的氛围。

顽强的生命力



* 中国人并不是不自豪的民族，正确的做法是“谦虚”由他负责，赞美的“反驳”由你负责。

——桑科

戏说中国人

桑科

你认识的中国人是怎么样子的呢？

中国人的第一个嗜好是工作。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疯狂地喜欢工作的民族了。中国字里男人的“男”，是田和力，也就是“在田里的劳动力”；中国字的“妇”是女和帚，意思是指“拿着扫把的女人”；中国的“家”字是“屋顶下养着一窝猪”的意思（当然啦，并不是说屋子里没有人，只是说要有人有猪才成其为家）。总之，你要叫一个中国人不做事，那简直是要他的命。

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土地，中国人拼命工作之后，如果赚了钱，他就立刻再买一块地，中国人无论在全世界哪里，他都习惯性地要往土里种点什么，他会傻里傻气地跑到沙漠里去种白菜，而奇怪的是当土地搞清他们是中国人之后，果真很听话，种什么就长什么，一点也不反抗。

中国人如果发了财，他绝对想不出怎么花钱，他把钱全留给儿子，而这儿子，同样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又把钱留给了孙子。

中国人注重名分，全世界你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把名分看得比事实更重要的了，中国人即使为此吃了大亏也在所不惜。

传统的中国战士连怒发冲冠勇往杀敌的时候也不忘记问清楚对方的名字，章回小说中标准的说法是：

“来将通名，宝刀不斩无名小卒！”

奇怪，那些来将竟老老实实在地把名字都说出来了。

传统的中国人又非常谦虚，他们叫自己的文章为“拙作”，他们建议你把他的画拿去“补壁”（遮墙壁的洞），把他的书拿去“覆瓿”（封坛子口），他说自己的小孩是“犬子”，自己的太太是“拙荆”（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他的房子是“寒舍”， he 自己是“鄙人”（边远地区不识礼的人）。

连中国皇帝都要称自己作“寡人”（没有道德的人）或“孤”（没人理会的人）。如果你听一个中国人说：“我一无所长，希望跟阁下多学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他其实是要你知道他的谈吐多么有教养。如果你听见他和他太太合力保证他家的菜准备得又少又难吃，你可以大胆地赴宴。他们弄的东西绝不比国宴差。

当然，中国人并不是不自豪的民族，正确的做法是“谦虚”由他负

责，赞美的“反驳”由你负责，如果他说：“我这只小犬，又笨又懒。”你就应该说：“贵公子真了不起啊，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聪明的7岁小孩了，我家犬子比他差远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中国人又极保守，在翻译外国名词的时候，我们总小心地不要伤害自己的尊严，我们把马铃薯翻成洋芋——外国人的芋头。我们把火柴翻成洋火——洋人的火。一辆汽车不知怎么的，居然翻成轿车——像我们的轿子一样舒服的车，而番茄，不知怎么竟是番人的茄子啦！

当然，也有翻音的，但即使翻音，美国增加了“美丽”“坚利”的意思，英国平白拣了“英华”和“吉利”的好彩头，而德国呢，是“道德”“意志”。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日本人怎么会把美国译作“米”国，美国跟“米”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曾有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在垂暮之年即将临终之际把他的学生叫来了，说：

“你看我的牙齿呢？”

“没有了，都掉光了。”

“我的舌头呢？”

“还在。”

那学生忽然明白了柔韧的东西永远比坚硬的东西更强，更适合于生存。中国人非常懂得“以柔克刚”。

在香港，你会看到家家厨房在雪亮的不锈钢瓦斯炉或电炉上放着个黄褐色的砂锅——他们是在努力保留一部分的中国。在新加坡，在最热闹的地方开着中药铺，那些中国人，在他最病最弱的时候，他情感上需要的是中国的药草。在马来西亚，成千的华侨社团吵着要一所中文大学。而在新加坡，已经有了一所教中文的南洋大学——当初捐钱建它的陈六使先生竟是个不识字的华侨。

不管中国人到了哪里，他的中国特质绝不改变，南洋的华侨甚至还有“义山”，华人死了也要葬在华人的鬼域里。

传统的中国人是不容许你有私生活的，他理直气壮地问一个小姐的年龄，他甚至追根究底地盘问你为什么要跟长得挺不错的玛丽分手；传统的中国社会至少有个好处，不需要到心理协会找医生——反正谁都可以听谁的隐私。对中国人而言，一个人如果有“不可告人之事”，他一定不是好人。

不过，在台北，中国人渐渐也试着去了解外国人了，并且尊重外国人的生活了。

不过中国人虽然爱看人，却不至于大惊小怪（中国人脸部肌肉的活动量向来是美国人的十分之一，欧洲人的五分之一）。中国人看到TNT，很不屑，说：“跟我们过年放炮用的不也差不多吗？”中国人看到

电子计算机，说：“我们早就有算盘了。”中国人看到电讯，说：“哎呀，《封神榜》那本小说不是早就说过顺风耳了吗？”

阿姆斯特朗辛辛苦苦跨了一步，上了月亮，中国人毫不佩服，说：“嫦娥早就去了。”就连裸奔，中国人认为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而是中国古代的刘伶发明的。这有什么办法呢，中国历史5000年，人间所有能发生的，在中国都已经发生过了。

在上古时候，中国曾经以为外国人都跟兽类有点关系——不然怎么身上会有毛呢？后来进步一点了，叫外国人为“洋鬼子”，鬼虽然不是好称呼，但毕竟是人类的续集；后来慢慢地才发现他们是洋人而不是洋鬼——这一点我一直认为大家都应该感谢好莱坞。

他们把多么优秀的洋人样品送给我们看啊，我们的男人很快地就爱上了嘉宝、秀兰·邓波儿、伊莉莎白·泰勒、费雯丽或今天的费·唐娜薇，我们的女人也开始偷偷喜欢瓦伦蒂诺、克拉克·盖博、罗伯特·泰勒或理查德·波顿、查尔斯·布朗逊……洋鬼子原来也有这么漂亮的，大家都同意，把“洋鬼子”改“洋人”比较有道理。

中国人与印度人

（印度）帕兰杰毗

印度和中国相邻，却又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隔开，中国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我们大不相同。如果我们想超越这些限制，就必须要了解中国丰富的传统和文化。

中国人与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敬重长者和权威，重视学习，热情好客，看重家庭生活以及男性享有优越地位。而我们双方的差别则可以归结为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人生观：中国人是“现世主义者”，而印度人是“来世主义者”。我们关心的是来世，因为它会支配我们现在的生活。这种观念导致印度人对目前的生活趋向于否定和悲观。

中国人只相信今生今世。在他们看来，眼前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也是生活的目的所在。由于在他们眼中只有“今世”，中国人愿意尽力过好每一天，让自己过得平和、舒适和富足。他们更愿意面对现实，做实用主义者。

印度人相信宗教，并幻化了诸多神灵以供敬仰。敬神是出于畏惧，或想得到切实的好处（发财、升官、得子）。印度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取悦神灵，并创造出天堂和地狱等概念及作孽和积德等观念。

虽然佛教试图将许多印度教的教义传入中国，但中国人依然不像我们这样来看待作孽与积德。佛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都曾传入过中国，但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仍显得不冷不热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

印度人认为自己只注重精神世界而自豪，因此他们信仰精神与灵魂。中国人却要和精神、物质两个世界打交道。对印度人来说，精神世界比物质世界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意愿比表达重要。对中国人来说，形式和表达则比精神和意愿更重要。

印度人靠积极上进、非常自信来处处显示自身的优越感，而中国人则正好相反，显得非常谨慎、仔细和谦逊。他会和你谈你的事情，却闭口不谈他自己。当要合影的时候，一个印度人会使劲向前挤，而中国人却不会这样做，除非有人特别邀请。

印度人出于自大心理，往往会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子上。中国人则会把牌留到最后，而笑到最后的也往往是他们。中国人非常善于使用拖延的技巧，通过请客吃饭和观光旅游让对方先提起话题。

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代表团有时不得不等上许多天甚至几个星期，而中国人却正按部就班地让对手变得焦躁不安、极不耐烦并最终决定不惜

任何代价使双方达成协议。因此，和中国人打交道一定要非常有耐心。

印度人关于“来世”的人生观使得他们将超度灵魂作为人生的首要目标。他们相信身体禁锢了灵魂，是灵魂超度的障碍。因此，人生的目标不是用美食和好酒来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是让它饱尝饥饿并穿最简朴的衣服。

出于这种原因，许多印度人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滴酒不沾。中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用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来放纵身体。对中国人而言，身体是父母赠送的礼物，应该善待而不是去伤害它。

中国人创造了美味的食物、奢华的家具及精致的瓷器。信仰物质生活的西方人很自然地会被中国吸引。而印度人在精神方面高谈阔论，物质生活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从而让整个世界远离自己。

中国人能制定富有远见的计划，并愿意为此牺牲眼前的利益。或许这也是中国人重诺守信的原因。印度人非常乐于请别人一顿免费午餐，而中国人的午餐却不是免费的。他们在别人请吃饭时一般不会毫无表示。有这么一个说法：“送中国人一块石头，他会还给你一块玉！”

趣话中西思维方式差异

卢秋田

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民族文化最深层次的一部分。

中西思维方式主要有哪些差异？其一，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其二，东方人强调整体性、综合性，而西方人重视个性；其三，东方人感情含蓄，西方人外露；其四，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意会性，西方人则具有直观性。

开会时大家都不愿意坐到前面来，恰恰是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反映。我在德国时，开会晚到了以后，往往坐后面，前面位置早被人占光了。

所谓“相逢未必真相识，相识未必真相知”，我主要讲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些差异。这里所讲的西方以欧洲为主。

其实欧洲如果细分，许多国家的思维方式亦有差异。德国人有时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道我们跟法国人有什么不同吗？比如说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临死以前，你问法国人，你死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法国人的回答是我想喝一杯最好的香槟酒。德国人则说，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我想再做一次报告。这就是德国人，喜欢做报告。

什么是思维方式？

根据我的思考，可否这样下定义：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我的第二个理解是，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民族文化最深层次的一部分。对文化怎么下定义呢？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给文化下的定义有260种，也就是说，最难下定义的是“文化”两个字。

人的思维方式渗透在各个领域，也许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反映出你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个美国人给日本人写信，日本人看到信，准马上就上火。因为美国人开门见山，将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后面才讲些客套话。

日本人为了保持心理平衡，看美国人的来信往往先看后面。而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越看越糊涂，到信的末尾有几句才是对方真正要谈的问题，前面都是寒暄。美国人读日本人的信也是倒过来看。这种不同的写法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们国内的宴请，主人在宴会开始前就开始致词，而国外的祝酒词是在主菜以后甜食以前。有人问为什么要放在后面呢？讲完再吃饭不是更好吗？不然老想到等一会儿还要讲话，心里不安，吃得不消化。这里也有思维方式的问题。

思维方式的差异很难反馈

思维方式的差异有时很难反馈给对方。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跟对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某种冲突以后，往往反馈不到你本人。

一次，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出访快结束时，要搞告别宴会，准备答谢一下东道主。答谢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当代表团走了以后，主人跟我讲，我跟你是老朋友，我告诉你实话，我非常讨厌这位团长。

我问你为什么讨厌他？他说这位团长和我握手的时候，眼睛却看着我后边的人，竟然还跟他讲话，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在他们国家，握住谁的手，必须眼睛看着谁。可惜这位团长没有机会，也永远不会有机会听取这个主人对他的意见。

记得有一年，荷兰有位贵宾到中国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得笔端笔正的，在门口迎接她，她看到这些感觉很不舒服。接着参观幼儿园的教室，进去后，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都背着手，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她很快结束了参观。

回国后，她请我到她家里看她拍的参观幼儿园的幻灯片，说这是这次访问感到最不舒服的事，下着雨，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是这样笔端笔正地坐着，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那才像幼儿园。

我想幼儿园的老师，为了做到秩序井然，一定做了大量的工作，认为这才是有礼貌的文明表现。而就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出访的代表团，在活动最后一般都是交换礼品，我们送给德国人礼品，对方立即打开并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代表团的人跟我说，为什么他们都急不可耐地看礼品？是不是对我们送的礼品不放心？

我说，不是，这是他们的习惯。反过来，德国人也对我提意见，送给中国人的礼品，他们为什么不打开看一看，是不是对礼品不感兴趣？我说，不是的，他们认为当面打开很不礼貌，到旅馆以后，绝对会打开欣赏。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但反映思维方式的差别。

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友谊是友谊，生意是生意”。我在卢森堡任大使，举行一次宴会，邀请了十位有名企业家来使馆做客。他们吃得很满意，感觉很丰盛，告别的时候一再表示感谢。

恰好第二天，布鲁塞尔来一个代表团，我必须到火车站去接。由于我去得太早，就先在火车站旁边逛书店，没想到书店的老板正是昨天我

宴请的客人。他又提起昨晚宴请，再次表示感谢。我说我想买一份今日早报，于是我买了一份《卢森堡时报》，他领我到收钱的地方，请我付钱。

旁边的司机兼我们使馆招待员说，昨天来使馆吃饭的不就是这个胖子吗？为什么一张报纸还要收你钱呢，太不够意思了。我说老李，你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你等着，很可能一个月以后他要回请我，他可以用5000法郎来宴请我，但这10个法郎却照收不误。

中西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

差异之一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

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中方代表团到了德国以后，主人问今天晚上你们吃西餐，还是吃中餐？我们代表团的答复往往是“随便”、“客随主便”。他们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说一听到“随便”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

我们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不能随便提要求，万一给主人出难题呢？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

反过来，欧洲的代表团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吃什么，他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今天就吃西餐，或者就吃中餐。而中国人往往较少表示个人的愿望，比如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团时间，各位想喝什么？如果团长说喝茶，后面几位可能也都说喝茶。人家奇怪，怎么一个说TEA，就全TEA下去了？

另外，我们在感谢对方时往往是这样几句话：你们国家很美丽，你们人民很友好，你们接待很周到，等等。他们认为万里迢迢从东方到西方，难道没有任何一点不同的感觉？为什么一律都是这么几句话呢？

后来有一个代表团走的时候说，我现在想提点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希望你们的介绍材料能译成中文；第二条是你们这个牛肉能不能煮得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受不了；第三点希望你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

他们听了感觉特别好，因为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了。

差异之二是东西方的感情表达方式。

我在卢森堡当大使的时候，正好国内送来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怕他们看不懂，就把故事梗概译成外文，预先发给他们看，放映前又请人做介绍。电影结束后搞了一个招待会，我问他们看懂了没有。他们说，看懂了，但看得很累。

十八里相送，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暗示我们听来很累，用那么多的暗示来表达爱情，为什么不直接说一句“I LOVE YOU”呢？他们说，故事的年代、情节同《傲慢与偏见》基本上一样，而伊丽莎白和达西可不是这种表达的方式。

我说这是中国表达感情的细腻，我们认为这是美，你们可能认为外露是美，我们觉得有些话直接说出来，反倒没有深度。他们说不可理解。

差异之三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意会性，他们则是直观性。

比如我们在文章或生活中喜欢用暗示，或者喻古论今。这种含蓄需要你去意会，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与西方人的直观性不太一样。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一是东西方发展道路不一样。

中国长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我们大陆文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特点很大程度上强调一种乡土情谊，乡邻情谊。德国人如果在国外遇到一个同乡，不会很激动，而我们的华侨，在外面有很多同乡会，西方人一般没有同乡会。我们经常讲本土本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还有落叶归根的思想，都带有很浓厚的情，这种情愫在西方恰恰很淡薄。

从哲学和文化体系角度说，我们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而他们是基督教文化。

思维方式的差异和原因讲完了。我很愿意再讲讲德国的思维方式。除了欧洲人共同的思维特点外，德国人还有几个特点：

第一，办事严谨，思维的严谨性比其他国家强。比如法国人在房间里丢了东西，他会张望一下，四处翻翻就可以了。而德国人要找东西，首先要找坐标，一块块来找。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这说明德国人的严谨性。先找坐标，后找东西。

有一次，有几位中国人在法兰克福向一个德国人问路，问路怎么走，大概要多长时间能走到。这个人根本不理，他们认为这是日耳曼民族的傲慢。没想到这几位往前走了几步以后他追上来告诉说，大概往前走1500米左右，再往右拐75米是你们找的单位，时间估计需要11分半。

问为什么刚才你不答复？他说，你们刚才不光是问怎么走，还问多久走到，我必须要看你走路的快慢，据此我才能算出时间。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德国人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德国人追求程序的完美。譬如，我们到火车站可以看到，大家都背着包或提着行李，来来往往找自己的车厢。而德国的火车站很安静，划成ABCD几个区，都跟车厢对号，你的车号在哪儿就站哪儿，用不着跑来跑去。

另外，坐过飞机的都知道，比如广播说1568航班现在可以登机，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很多时间，前面人放行李，后面人等着。刚到德国，我以为德国国内的航班也这样。

我从波恩乘飞机到柏林，他们一说登机，我也排队，而他们说，先生你这时还不能登机，只有航班的一区可以登机，我一看才知道票角上写着区号，他们是按分区登机，很有秩序也很方便。德国路边的垃圾桶分五种颜色，每个德国人预先都把垃圾分好类，按照垃圾种类分别投进不同的垃圾桶。

但德国人办事有时不够灵活，不容易拐弯。一次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预先同他们的礼宾司长讨论，欢迎宴会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谈了三次谈不下来，他把同多少人握手、讲话、上几道菜都算上时间，共需要108分钟，一点也不能少。谈判很辛苦，但一旦达成协议，他们很守信用。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我们讲这些是为了了解对方，而且各国应该相互学习，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我们有些思维方式不太适合新时代的发展，这也需要改进。在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创新”两个字。只有创新，我们的民族才能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生活中的强者

（美）罗斯

在我们出生的十个小孩中，一般有三个难以长大成人，而在中国，或许会有五个乃至更多难以成活。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难以成活是因为其在婴幼儿时期的生活环境艰苦。假如出生时白种婴儿与黄种婴儿体力相当，那么活下来的中国人就必须有比白种人更强大的生命力，否则他一定会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夭折。

活下来的中国人会将他们异常旺盛的生命力中的某些因素遗传给他们的后代，这样其后代的后代也会这样遗传，因此，活下来的中国人会传给他们的孩子更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东西方婴儿的这种死亡率使我们得以探讨两个种族间体格的差异。现在，如果我们白人因为有宽敞的住房、丰足的物品、先进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得一些体质弱的孩子存活下来，而在中国，那些孩子则会被淘汰，而存活下来的中国人将显示出比白种人更强大的生命力。

为了弄清在刚过去的一两个世纪我们与生活抗争的能力显著降低以及我们维持生存更为强大的技能是否对我们的体格产生明显影响，我详细询问了在中国不同地区教会医院工作的33位白人医生。

在这些医生中，只有一位在青岛工作的技术高超的德国医生说中国病人没有任何超乎寻常之处。他认为，比起以前他曾治疗过的朴实又能吃苦的德国农民，中国人抵抗伤病的能力很差，也不配合治疗，也不能忍受疼痛。

另三个曾在中国工作过25年或更长时间的医生观察的结果是，两个种族在体质上没有任何不同。我认为他们短暂的工作体验已随时间而忘却，并且那时他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将中国人和西方人加以比较。而且，他们中有两个承认中国人确实有极好的耐高烧能力，并且能很快从血毒症中恢复，而西方人一遇到血毒症则必死无疑。

剩下的29位医生则一致认为，比起他们的家乡人，中国人的体格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至于外科手术情况，大家一致赞同一个英国外科医生的说法：“他们恢复得轻松极了！”

据他们观察，在外科手术中中国人很少有休克现象，在这些狭小简陋、只是部分灭菌的中国教会医院，中国病人从严重的手术中恢复的情况与他们家乡设备优良、灭菌条件好的医院一样好。

福州的肯耐尔医生刚从法国家中休假归来，他发现，用简单的设备

和中国本地的助手，他治疗炎症的结果不亚于著名的冯·鲍曼在柏林良好的条件下为柏林的市民治疗的结果。

许多人为中国人从可怕的伤痛中恢复过来的情形惊叹不已，有人告诉我，有一个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胸部被撕裂开来，他用手托着肠子，由两个人搀扶着送往医院，他的胸部可能已被感染，医生将细菌连同肠子一起缝合起来，他竟很快就恢复了！

病人对于治疗的反应也同样令人吃惊：一个男孩的手指不小心被切伤，只是匆忙地用脏布裹了起来，当他来到医院已是一个星期以后，那时他的手肿得很可怕，并明显显示出破伤风的症状，医生们将他的手洗净，把他送回家让他的家人为他准备后事，让医生想不到的是，三天后，他居然没有破伤风的迹象了！

不久前，一个手指被二轮运货马车压碎的人来到医院，他的整只手臂和腋下都染上血毒，经过简单的治疗后，危险消除。一个在受伤几天后发着高烧、伤口流脓的病人被送进医院，将他的伤口彻底清洗后，高烧很快就减退了。一个刚做过严重的乳腺癌手术的女人受了感染，发着高烧，她的丈夫喂她吃坚硬的栗子，她竟然活了过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震惊于中国人对血毒的抵抗力，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是这样一些看法，如“血毒极少见，中国人对败血病的抵抗能力比我们强”；“对于产脓病菌有较强的免疫力”；“对于坏疽的抵御能力比我们强，在我们国家会造成严重的坏疽，在这里不会”；“特别抗感染”；“坏疽特别严重时极少发烧且很快痊愈”；“经过一周高烧后恢复，而这样的败血症可使白人致死”。

因此，许多外国医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并不以为奇，即：“除非中国人已死去，否则就不能放弃救治。”

南方不盛行裹脚，所以女人很容易生孩子，她们几乎都不喊叫，一两天就能恢复体力。在广州工作的斯文博士说，他曾不止一次到舢板上请女船主渡他过河，回答是让他等一刻钟或半小时，一刻钟或半小时后，船上的女主人就生了一个孩子，她把婴儿放在一个角落的破布上就准备渡他过河！

妇女生小孩时在一个脏兮兮的茅屋里，由一个又脏又老的接生婆接生，但在白种人看来，这样的环境能使白人妇女出现使她们致死的分娩热。除非出现难产，才会请来医生，从产妇体内取出死婴，产妇发一阵烧但很快就会痊愈。

生活在这样一块人口稠密、令人窒息的土地上，卫生条件极差，使得老百姓对有毒细菌有极强的免疫力，而这样的免疫力令外国人感到吃惊和羡慕。

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被蚊子咬了一口会肿起一个大包，但他们却

不受任何影响；他们饮用被污染的河水不会引发痢疾；很少有伤寒，过去，病人身上出现类似伤寒的症状时，医生往往误诊为伤寒病，因此，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得了伤寒，得通过一系列的检验后，才能得出结论。

所有医生都一致认为，在中国人中，天花是小病，有人把它比作腮腺炎，由风湿热产生的器质性心脏病在中国也很少见到。

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使用起麻醉作用的氯仿时很少像白种人一样会经历一段激动迷狂的阶段，而是很安静地睡去。开始感到恶心后，他们几乎都很放松自然。事情的本质在于他们能忍受手术的剧痛，而我们则一定要用麻醉剂。

他们不用麻醉剂就切除肿瘤，而且拔牙也从不用药，有时一些大面积的切割手术，如切除已深入肋骨末端的瘤，他们也默默忍受而不退缩。只有三个被采访的医生没有提到其病人对疼痛的忍耐能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忍受拷打折磨的原因。

然而，这种神经迟钝现象似乎并不普遍：那些常忽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平衡的学者并不坚强；那些吃肉喝酒的贵族阶层比吃素食的劳动阶层要缺乏坚忍的意志力；那些避开一切物质或精神活动沉溺于声色享受的绅士对疼痛十分敏感而且很惧怕。

因此，有人指出，人们经常说的神经迟钝不是一个民族的特征，而是普通中国人不自觉的淳朴与节俭的生活使然。

一个医生说到，在他的家乡，一个紧张沮丧的人听到给篮球之类的东西充气时所发出的刺耳声音感到不舒服是很常见的，而在他的中国病人中这种情况却很少出现。另一个医生说到神经衰弱和由紧张导致的消化不良在中国也极为少见。

一名负责军队医务工作的首长说，在秋季军事行动中，士兵们睡在潮湿的地上，下面只有一点稻草却没有生病。我曾看到过苦力背负着重担小跑前行两小时后狼吞虎咽地吞下热饭，然后又继续工作两小时，要是一个白人这样一定会消化不良而在地上打滚。

中国人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入睡，我曾看见他们睡在一堆砖、一堆石头或一堆木柱上，用一块砖块作枕头，而且任由炎热的太阳照射着脸部。他们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长时间从事单调的劳作，从不休息也从未有任何动作上的改变。

但是，中国人抵抗肺炎的能力没有我们强。有些医生说，他们抵抗肺炎的能力没有白人好，他们会因疟疾发烧，而且情况很糟糕。在香港，他们比外国人似乎更易因瘟疫致死，孩子们常患麻疹和猩红热大量死去，在抵御肺结核方面他们没有我们有优势。

他们虽然很容易从高烧中恢复，但他们不能忍受长时间发烧。有些

医生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不卫生的生活环境而导致生命力降低。他们对新鲜空气心存恐惧，即使是在炎热的夜晚，也要把卧室门紧紧关上。

在学校，如果教师坚持宿舍开窗，学生们也会用被子捂住自己，以免鬼魂在夜间飞进来靠近他们。中国人承认对这些柔弱的外国人来说卫生固然很好，但对他们自己却无此必要，因此，中国学校的女生赶不上美国女生的学习进度，她们常觉得体力和精力不足，或是要休息很长时间，在英国教会学校，由于课程较慢，女生学得也比较好。

只有个别的医生都将其病人特别的抵抗能力和复原能力完全归结为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而否认其种族在生命力上的优越性。另外一些为中国城市市民看病的医生则认为，中国人的精力为其糟糕的生活条件所破坏，但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下，黄种人比白种人有更坚定的生命意志，有更强的生命力。

通过以上陈述我们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坚韧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特殊的种族生命力，这是他们为消除比我们北欧祖先更少的生活必需品而在长期的艰苦的文明进程中获得的。

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与其说增强了中国人的体力和精力，不如说培养了他们恢复健康、抗感染和忍受恶劣生活环境的能力。

几千年以来，中国南方和中部地区的人们挤在他们的村庄或城市里，用的是被污染的河道或灌溉稻田用的肮脏水，吃的是变质了的猪肉以及由污秽物刺激生长的蔬菜，住的是低矮的房屋、肮脏的地面、杂乱的小道，睡的是小得令人窒息的小屋和脏得发臭的小窝。

无数的人因过度拥挤产生的毒素致死，而且只有几乎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能够把对有毒物质的免疫力传给他们的子孙，那些幸存的最健康的人必须有能力抵抗肮脏的空气、恶臭的气味、令人疲倦的毒素和潮湿、腐食与毒菌。

我敢肯定，要是同样多的美国人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在厦门或苏州，不到半年就有四分之一人会死去。但中国人在坚忍的同时也对身体的发育造成了伤害，中国的儿童普遍比其实际年龄应发育的体格瘦小，在出生时婴儿也没有我们的强壮，虚弱的婴儿更易死去，即使是那些幸存者也会因生活条件的艰难困苦而变得虚弱。

我不会把中国人巨大的生命力与你们在非洲贝督因人或东南亚达雅克人或美洲印第安人身上发现的原始生命力一视同仁，这些早期原始人所具有的资质由发达的肌肉、非同寻常的力量和承受力、正常的体能以及承受困苦的能力构成，他们没有对疾病的免疫力。

野蛮人若是生活在文明人生活的条件下，会像苍蝇一样地死去。爱斯基摩人能在格林兰的冰屋里生存，却不能在纽约的楼房中存活；欧洲

殖民者传染给当地居民的疾病比他们的枪炮更快地将土著人清除出去；进入文明状态必须增加对病菌传染的免疫力。

现在，中国人所具有的奇特的免疫力有效地抵抗了其近邻互相传染的有毒病菌，他们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能力似乎不是继自五六千年前的游牧生活，而是从后期文明社会痛苦中获得的，它本来只会在拥挤的城市或是所有农作物都受污染、所有的溪流都变成开放的下水道、所有土地都是滋养蚊子的稻田的农村滋长。

这种对病菌的忍受力或许此前从未如此发达，此后也一定不会有所进展。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知道如何扫清其前进道路上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并将不再以旧有的方式培养这种免疫力。

对西方来说，中国人坚强的生命力或许有其对于西方人不利的好战特性，西方人担心，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中国军队能战胜人数同样多的条件较好的白人军队。

但现在有少数战争是在帐篷和伙食团内展开肉搏战，若是战役拉长，同时还伴有不规则时饮食、不卫生的饮水、早起、不能睡觉、疲惫行军、风餐露宿、激动和焦虑，白人士兵就会比黄人士兵损耗得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更坚强而较少战争精神的人在最紧张的格斗中会比那些缺乏韧劲的士兵打得好。

基于此，我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竞争不像一些人想象的简单，但在恶劣条件下黄种人会比白人做得好，因为他们更能忍受粗糙的食物、破旧的衣服、肮脏的空气、吵闹、炎热、脏乱、不舒服与细菌。

以白人瑞利和华人阿三为例，瑞利“优于”阿三，但阿三能“战胜”瑞利，阿三不能抢瑞利的饭碗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人，但由于他能以瑞利根本不可能适应的工资生活并做一些他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三或四个阿三能抢走瑞利的饭碗。

他们确实也会这么做，除非瑞利工作的地方将他们挡在门外，瑞利努力把阿三排除在他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外，这并非一个人害怕在同等条件下与另一个优于自己的人相斗，实际上，事件并不像那么简单、自私与狭隘。“真实的情形乃是，能够胜任好的工作环境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他拒绝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一个能忍受较差环境的弱者。”

当然，随着西方卫生设备的引进，中国人依靠坚韧顽强的毅力而生存的过程将会结束，这种坚韧的特性也将会从他们种族的体格中一点点的消失。但在现在他们的存在仍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顽强的生命力

（德）赫尔曼·凯泽林

我感到越来越困惑的是：中国这一民族的不可思议的平静。印度人的平静并不会令我感到诧异，土耳其人的平静也不会使我感到吃惊，因为印度人缺乏生气与活力，而土耳其人则属于冷漠气质。但是中国人，无论他们表现得如何平静，他们都绝不是冷漠的，而是极富有生命力的。他们的大众又如何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平静的印象呢？

人们曾和我讲过他们也有那种无法控制的愤怒，据说那种愤怒甚至比斯堪的纳维亚暴徒的还要强烈。他们说这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发怒者的火气如此之大，以至于要经过数日的时间才能重新平静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据说他像发怒的公牛似的完全不顾原因地大发雷霆。中国人把这种现象看做是愤怒的物质——“气”的积聚。许多疾病也归根于“气”，而欧洲的医生已证明了这一理论在其总体上的正确性——器官上的许多疾患，甚至一些致命的疾患，中国人都相信是由于压抑愤怒所造成的。

现在，大众的平静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难解之谜了。大家都知道，诸如凯撒、拿破仑、穆罕默德、亚历山大、彼得大帝，甚至俾斯麦之类的行动上的巨人，他们都周期性地或多或少地有精神性危机，这有时表现为精神癫狂，有时是雷霆大怒，有时是精神颓唐或发出阵阵哭喊，而这些都总是被视为精神病医生所称的“解脱性反应”。

不断积聚起来的暴烈气质，如果不让它们突然爆发，那么就需要一个安全阀门，在间隔一段时间以后，打开一下，以缓和它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适合这些英雄的东西也适合于中国这个民族。

他们一方面极为富有生气，另一方面则又保持着所有民族当中最为强大的自制能力。因此，在演绎的基础上就可以推测，如果本质仍然是本质的话，那么，愤怒的突然爆发就必然属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何况那种爆发甚至比习惯于毫无拘束地发怒的南欧人更为猛烈。这些事实是和理性的假设相符合的，我因此而感到满意。

如果我没有完全弄错的话，中国人在全人类当中所具有的身体活力是最为巨大的。无论是作为单个的人还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的能力似乎都是无穷无尽的，他们能够战胜对其他民族而言的致命的疾病，他们能够承担过量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中国人所固有的活力是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数千年来迫于外界环境

而奉行自我抑制，并且受到一个睿智的道德体系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那不是已成为一种可继承的财富了么？而在我们当中，这种财富只有通过有天赋的人的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

当然，切不可忘记的是，在中国，自然选择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许多问题，天性懦弱者在中国几乎是没有生活能力的。

稳重而可靠的中国人

（美）罗斯

新兴民族一般历史都短，思维也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对刺激物的反应却很迅速，他们很难抑制自己的冲动。但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就不会冲动，他们能抑制并打消最初的动机，他们习惯在思维中找答案，而不是在印象中获得。

他们的才智源于复杂而不间断的刺激产生的持续意志力组成的合力，这种类型的人只有做好最终计划后才会开始行动，并且在他行动之前就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他的感情不像草叶那样易燃易爆，而是像能将铁熔化的熊熊火焰一样保持持续的温度。他的行动不是随兴而至的念头，而是深思熟虑的决定。他的意念不是犹疑不定拐弯抹角，而是平稳有力持之以恒。

社会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小心谨慎，科学越来越进步，以至于做什么也必须深思熟虑，这种稳重而可靠的人越来越为社会所需要。

现在，中国人突然集体性地转向了这种类型，他们现在绝不会有热情如水或勇往直前的行动。他们对感情进行理智的思考并懂得如何隐藏以便蓄时待发，不再冲动鲁莽，不再轻易做出承诺，因为他们懂得做事要稳重而可靠。

夏威夷一位对人身保险做过考察的先生为中国人处世审慎的性格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依据。他发现日本人易受影响而且容易说服，尤其是在他得知其他日本人正得到保单时，如果你告诉他他的朋友参加了保险，他马上就会预定一份更大的订单。但当一个月后纽约总部的订单来了，他们的兴趣就会减弱，但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他必须预先付出一定数额的订金，他才能领取保单。

而中国人既不会被甜言蜜语诱惑也不会被压制阻碍吓跑，他会把保险单样本带回家彻夜研究，以决定第二天是否购买保险，由于尚未获得任何利益，他会拒绝交付订金。第二天他考虑清楚了才去付保险费。之所以介绍这一比较并不是在诋毁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才能举世公认，我的本意是想要说明中国人谨慎稳重不易受影响的性格。

正如希望苹果树能够在十月开花一样，中国人希望天才能够集中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他们相信古代的智者就是智慧的完美化身。

中国集体思维在他们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是成功的。在它们的影响

下，庞大的人口能保持稳定的秩序和一定程度的幸福，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观念向外延伸以扩大其影响时，他们从未遭遇任何能与之对抗的观念体系，直到现在。

中国文化一直在向外传播，直至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对它顶礼膜拜：基督徒一度在中国繁荣但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开封府的犹太人丧失了他们的语言和宗教，除了相貌与中国人不同外，他们已为中国人彻底同化，征服者满洲人已忘记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字。

有一句话说得好：“中国是可以容纳一切外来事物的海洋。”几个世纪来，中国人发现自己是一个被层层包围的巨大物体中的一个小小的自足文化圈，或许几千年后我们的后代会发现自己也是这样。

当小小的发现像一条潺潺小溪从巨大的实验室中流出；当人类的精华令我们为之激动不已且正在享用硕果累累的新发现时，或许不需减少其力量，我们人类的智慧会在健全而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思维体系中发展成毫不动摇的信念。

在马来国，中国人从死气沉沉的空气和受束缚的社会组织中逃了出来，他们是那么机智聪明，以至于没有偏见的白人开始把他们看成是智者。国内工程师会告诉你，二十到四十年内，当这些聪明的中国青年完成与西方青年同等水平的技术培训后，在远东工程和技术领域就不会再有高薪的白人专家的位子。

聪明的中国人已开始在上海学习玩这项游戏。据称，银行、航海、棉花贸易以及其他外国人赚钱的行业很快将落入中国人手中。有人认为，白人将无法在中国沿岸谋生，他们会像在日本那样被挤出，这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我曾问过43个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教师、传教士和外交使节：“你发现黄种人的智力与白种人一样吗？”除了五个人外，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是”。一个曾从事过传教士、大学校长以及使馆咨询者等不同经历的汉学研究家的说法令我吃惊不已：“我们中大多数在这儿待过25年以上的人开始感到，黄种人是正常的人类类型，而白种人只不过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

他们普遍认为，要是把中国人的头脑用西方的艺术和科学武装起来，他们的智力与我们不会有什么差别，尽管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和知识阶层在能力上的差别比西方的要大得多。

有意思的是，在“中央王国”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优越的白人在如何为其政府效劳这一点上常变得极像中国人。有人就抱怨罗伯特·赫德爵士简直是个中国佬。据说许多在中国服务的领事官员支持以中国人的方式看待问题而反对西方人。

似乎东方文明正一点一点地进入、渗透并占有他们。他们在那些较

有修养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了比他们白人更丰富的知识，更宽广的胸怀，更富哲学意味的忍耐力，这似乎是对那些性急、鲁莽的西方人的嘲弄。

问题的本质主要在于：由于美洲的发现，西欧白人占领了西印度、美洲、澳大利亚、非洲、海上群岛和南部亚洲，而他们的东欧兄弟则占领了亚洲西北部和东部。白人在扩张中遇到了几百种此前对他们来说一无所知的种族和民族，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未碰到任何一个能与其军事优势抗衡、文明程度比他们高，或政治与工业组织自行独立的民族。

现在，三百年过去了，由于这样的经历，白人已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地球上无须争论的统治者，他结识了亚洲东部这些或许与白人一样有才干而且会威胁他进入他已为自己规划好的版图的人。

无论如何，未来文明的承受者和推动者将不再是白人，而是白人和黄人，对地球的控制权将不再是在一方手中，而是在两个种族手中。

实际上，所有能理解认同另一个民族的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成了中国人的朋友。他们不是像对日本人那样，为其优雅的礼节、细腻的情感或优美的艺术所吸引，而是被他们稳定坚实的人格吸引。

中国人的性格

（英）罗素

西方人有一种观点：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满脑子的神秘思想，外人很难理解。如果没有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过，可能我也会抱着这样的观点。但是，根据我在中国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来看，并没有发现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谈话就像和英国人谈话一样，他们回答我也很像一个英国人在回答一个中国人，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而且，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又明智。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一类的说法。

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时，常常只有一方能获利。毫无疑问，一般都是白种人受骗上当，除非当时的中国人是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

中国人最深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是他们把握别人情感的能力。不论是到中国旅游，还是在中国居住多年，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尽管英日两国已经结成联盟，但是我想不出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会像孤身在中国的英国人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只有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那些人，才能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评判标准。

初次到达中国，你一定会感到震惊，因为那里的弊端很明显：乞丐成群，贫困惊人，疾病肆虐，社会混乱，政府腐败。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首先都会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都会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应该进行改革。

但是，中国人，甚至那些本来可以因此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他们对西方人的这种改革的热情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自动消失一样，他们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

而且，这种盲目等待的观望态度，也逐渐影响了被弄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性。等最初的愤怒激情过去后，他们也开始怀疑自己原来一直遵循的信条是否正确了。

时刻准备着，提防灾难的可能到来，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呢？而放弃现在已有的快乐，终日想着不幸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又是不是一种该有的谨慎呢？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这个梦想中度过？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们能忍受贫穷、疾病，甚至腐败。但是作为对自己的安慰，他们保持着在困境中寻找乐趣的能力。他们经常开玩笑自娱自乐，在阳光下嬉戏和讨论哲学。这是在工业

化的国家中不会看到的。

中国人，包括各个阶层的人，比我所知道的任何民族的人都喜欢娱乐。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解争论。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几个人雇了几顶轿子赶路。当时所经过的路途崎岖险峻，要穿过山丘地带。所以那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息十分钟。

他们立即停下了，并且拿出烟斗，有说有笑地聊起天来，似乎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在意。如果在其他随便哪个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天气的炽热，以便要求增加小费。而我们那时却在担心汽车是否已经在约定的地点等候我们。

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和你海阔天空地探讨一番：宇宙的日月星辰是循环着转动的，还是直线型轮回运行的，一个完美的理论家是彻底奉献自己呢，还是有时也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

二

你偶尔会遇到一些目光短浅、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他们一叶障目，被表象所迷惑，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恰恰是这种人忘记了真正构成文明的要素。

北京没有有轨电车，电灯也很落后，这是事实；但是，北京有很多令人神往的美丽地方，而且至今保存完好。而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而将它们糟蹋得肮脏不堪，这也是事实。

受教育良好的中国人善于吟诗作赋，而不善于记住可以在《特克年鉴》里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这更是事实。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作为旅游者的你向一位欧洲人询问合适的下榻地点时，他会向你推荐一个，然后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

但是，中国人却会对有无火车毫不在意，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只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你：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建造的。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视野和对生活看法的不同，才被一些西方人误认为不文明。

只要是中国人，上至达官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不张扬而含蓄内敛的自豪感。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育影响和教化的人，也不会失去这种特性。无论是中国的个人还是整个民族，他们都是很谦恭的。他们的自豪来自于自信。虽然他们承认自己国家的军队不如外国的军队强，但是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主要看国民或民族的素质的高低。

我觉得，中国人在心里是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的。西方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是因为评判的标准不同。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可笑的。毕竟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结论是不会相同的。

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性格差别，形成了根本的鲜明对照：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言语上的说辞罢了。假使有人问我们，机器是否真正改善了这个世界？我们肯定会急着回答：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它确实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我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其爱好“进步”实际上

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来改变事物。

为了追求这种乐趣，一个美国人会不要命地工作，以致当他事业有成，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的时候，自己也成了一个消化不良的患者，只能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维生。当他设宴款待宾客时，筵席上摆满了山珍海味，而他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即使这样，他仍然会自我安慰地想，他能控制国家政治，能按自己投资的需要发动或者阻止战争。

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民族特性，使西方人具有所谓“进取精神”。

当然，中国也有雄心勃勃、抱负远大的人，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表现形式。他们选择了追求权力带来物质享受这一形式，也正是这种享乐、贪婪观点的泛滥，使得中国由盛变衰、由强变弱。

金钱意味着能够享乐，因此中国人把金钱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对我们西方人来说，金钱只是争取权力的工具。很多政治家能安于自己寒俭拮据的生活，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而非金钱。

而在中国，掌握大权的官僚们几乎都把权力看作工具，一种可以满足自己搜刮大量钱财这一欲望的工具。他们争取权力的目的就是获取巨额财富，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携款逃往国外，在那里安度晚年。因逃离造成的权力的丧失，对他们来说是根本无所谓的。

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灾难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西方则不一样，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政客们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人们的利益。

中国政府的腐败和管理混乱所造成的危害，远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严重。我们西方那些所谓“高效率”的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他们掠夺成性，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比中国政府的腐败所能带来的灾难要大得多。

事实上，大部分现代政府的政治行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们做的越差，实际成效就越好。中国政府懒散、腐败、愚昧，而个人却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丧失殆尽。中国的法律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不是很完善。有时候，某个人会和他英国、美国一样，在中国也因为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的压力下坐牢。

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见，平常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干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如同1914年以来的欧洲人，或者1917年以来的美国人所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并没有需要被大众认同、与其一致的压力感。人们依然只需要像自己，并不用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个人主义在中国依然存在着，虽然在西方已经被废弃。这有好的作

用，也有坏的影响。在中国，每个劳苦大众，都或多或少保持着自尊和人格尊严，而在西方，这种自尊只有极少数金融巨头才有。

在中国的外国人经常会觉得中国人的“死要面子”很荒唐可笑。但这只是中国人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一种个人尊严。在中国，每个人都要“面子”，包括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

如果你使一个中国人丢面子，就是在羞辱他，也是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德规范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说话，当他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时，你的话必定是被他当作了笑料，他一定会嘲笑你的。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没有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所以我就像以前对英国学生一样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很快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都很不自然地笑了。后来我才明白原因。中国人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中国人也是如此。

事实上，“讲究客套”这个习惯不但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不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诚挚、真实的关系。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会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麻烦。而中国人因为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这种温文尔雅的心性。至于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还不忍妄加断言。

三

在一个英国人眼里，习惯妥协或屈服于公众舆论压力，是中国人的特色性格之一。在中国，很少有一种冲突会发展成为轩然大波的，满洲皇帝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西方，国家一旦成为共和体制，被废黜的君主的头向来都是要被砍掉的，至少也会将其流放到国外。但在中国，人们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还给他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贯俸。

十六岁的溥仪还能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后来又被推翻，即便如此，他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就主要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安福国会”是亲日派，还接受日本贷款。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当时的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发起的。虽然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是士兵们被舆论影响，舆论让他们知道应该为谁而战。所以，最后士兵们倒戈，以致革命派进入北京时，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安福国会”的政府。

这种公众舆论的力量，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由于政府腐败，财政资金一直很紧缺，并且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要求发工资。结果，政府出动了士兵和警察出面镇压，在双方的冲突中，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

中国民众一直都有着尊师重教的思想，这一观点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因此，这一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闻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

当时，政府刚从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那得了900万元的不义之财，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拒绝教师们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我想是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的。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力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生存所造成的威胁。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也明白在香港的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

他们更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

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尺，虎视眈眈。日本国的经历是中国的一个典型先例，他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严酷的纪律，倡导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

但是中国人既不模仿日本当时的措施，也不屈从于外国列强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的，而是以几个世纪来计算。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亘古不变。他们以前也曾被外族政府征服过，开始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是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后来都被他们同化了。经过几代人之后，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

四

满洲里地域广阔，有一大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侵入满洲里，声称需要殖民地容纳其多余人口。事实上，从中国内地迁到满洲里的移民要比日本移民多一百倍。

不管此时满洲里的政治势态如何，它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国处境危险，满洲里肯定会重新回归中国所有。因为四万万的中国人的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

尽管中国也有内战，但只是表面喧闹。中国人总是一直等到敌人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了锐气和精力才起来反抗，这是他们蔑视敌人军队的方法。

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而且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延续了下来。

一直以来，中国文明也在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最初的佛教文化，以及现代的西方科学。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中国人变成欧洲人。

在中国我遇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的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但是并没有因此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没有脱离自己国家的人民。他们认为中国人应当摒弃西方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而应该学习采纳他们的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逐渐衰败，其文化与艺术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勃勃生机，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是受过欧美文化教育影响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外来文化的一些新因素来振兴自己的传统文化。

因此，他们开始注意西方文明，希望它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能不被煽动起尚武的精神的话，他们一定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化，这种新的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现在为止，我主要谈的都是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方面，而中华民族同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愿意谈到中国人性格上的缺点，是因为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深刻感受到他们的

谦恭礼貌，温和善良，所以宁愿说些自己的好的感受。

但是，不论是出于对中国真正的友善，还是从尊重事实的角度来说，不承认中国人性格有缺点都是错误的。

我只希望读者能记住：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同时，我准备起草一份严肃的起诉书，控告任何一个欺侮中国的列强。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曾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态谈了这几点：贪婪，懦弱，缺乏同情心。

很奇怪，那位作家不但没生气，反而承认我批评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如何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根治。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

五

每个西方人都震惊于中国人的同情心的缺乏。他们缺乏因遵从人道主义而产生的冲动，而西方人因为具有这种冲动，会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挽回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

比如，我们一再禁止奥地利加入德国，阻止他们移民和获得工业原料。结果，除了一部分维也纳人愿意依靠我们的救济而活下来以外，许多人都饿死了。

中国人不会花精力去饿死维也纳人，也不会济世行善，去救济一些维也纳人。我在中国期间，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有的人还会为了几块钱卖掉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给别人去当奴婢，如果拿不到这笔钱，他们甚至会杀死自己的孩子。

救济饥民这种行善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白种人在做，很少有中国人参与。即使政府发放救济金，这极少的一笔钱也会被贪官污吏所克扣。当然，也可以这么说，西方人之所以做这些善事，与其说是在帮助中国人，不如说是在安抚他们自己的良心。

事实上，只要中国依然保有现在这种高生育率和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饥荒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这一次的饥荒中靠别人的救济活下来的人，也许在下次饥荒中很难存活。

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只要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中国是可以永远消除饥荒的。因此，他们采用别的方法去拯救饥民，而不用白人这种单纯救济的方法。

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种同样的解释，并且对许多有关问题的看法是趋向一致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我无法理解。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看热闹，他们会认为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很好笑，并以此取乐。

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很开心看到别人痛苦。从中国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的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绝不是没有采取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还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懦弱，是中国人另一个让人很轻易就能看出的缺点。但是，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的就很缺乏勇气，怕死。两军相对于战场上，双方都会想逃离战扬，胜利其实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时，军队也纯粹是由雇

佣兵组成的。

当实际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然而，我认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中国人是不勇敢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知道消极地忍耐。

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他们会为了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比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藏匿物品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但是，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这并不代表中国人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会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贪心，是我认为的中国人最大的缺点。生活艰苦，挣钱不易，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外，很多人都贪污或者犯罪。有时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愿冒生命危险。

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陷入困境，主要还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府官员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这种贪婪的根源可能是经济条件的落后。也许在以前的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都得不到所需要的钱，生活窘迫。

只有当经济条件提高了，这种贪婪的状况才能少一些。我不相信今天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厉害。

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当然，西方人实际上如何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六

我已经说过，中国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聪明能干而且多疑。但这只是他们性格的其中一面。另一方面，中国人又会很狂热激动，这种狂热激动常常是一种集体行为。尽管我很少见到这种情况，但这无疑是事实。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动乱。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得他们变得不可捉摸，也使得中国的将来难以预料。你可以想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疯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

我个人认为，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不确定因素，才使得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顾一切后果的冒险者，尽管平时他们都表现得小心翼翼。虽然在中国浪漫的爱情远比在西方更受鄙视，但是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丢掉皇冠。

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很难。对外国人来说，印象最深的仅仅是中国人至今保留着的未受到工业化影响的古代文明。然而，在侵华者日本、欧洲和美国金融资本家的压迫下，所有这些古代文明都有可能丧失殆尽。

中国艺术正在遭受毁坏，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模仿欧洲的二流绘画。大多数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都对本民族的绘画缺乏审美能力，而且轻率地认为中国没有遵循绘画的透视法则。

到中国旅游过的外国人会发现，独具魅力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很难保持下去。它必定会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保留下去的，比如中国人的某些优秀的道德品质。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静温和的气质，因这种气质，在解决争端时他们会更多地讲究平等公正，而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当然，中国人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这种性格，完全取决于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假如中国人被迫面对日本那样在中国实行极端野蛮的军团主义暴行，中国人会出于自卫而变得更加无畏。

谦让的中国人和自信的美國人

荀遂山

中国人把谦让、容忍特别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当成是美德与国粹。美国人则把谦让、容忍，看成是信心不足，无所作为，甚至无能的表现。

在谋职时，美国人常说：离开我不行；中国人往往谦虚地说：我不行。老板并不认为你是谦虚，而是真的认为你不行，因为他们缺乏谦虚的思维方式。多少华人因此而痛失就业机会。

美国对自己毫无把握的事，常说TRY（试试），也绝不说我不行。美国人可以直接要求老板给自己涨工资、要求升职毫无赧颜之感。我认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华人，大家公认他的工作出色，鼓励他向老板要求升职。当他羞羞答答地向老板提出时，老板惊愕地说：为什么你不早说，不知道你有这种要求。

中国自古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成是美德，美国人是典型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思维。美国的飞行员出国参战，都把自己的姓名、籍贯编号印成卡片带在身上，一旦击落被俘希望活着回来，活着回来的被俘人员也不受歧视。美国出国参战人员往往士气不高，绝不会有中国荆轲刺秦王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概。

在权与钱的问题上，两国人的观念大相径庭。中国人重权胜于重钱，美国人则相反。他们把权看成是暂时现象，如白驹过隙。

美国的银行家，电脑专家，钢铁、汽车、石油大王……比总统更有钱、阔气、显赫，甚至总统都要听他们的摆布。在一个州的大财阀可以呼风唤雨，州长在他眼里是小菜。往往最有权的站在最有钱的一边，实质上钱在左右权，所以美国人把钱看得比权重。

在钱的问题上中国人和美国人还有一点重要区别。中国人把钱看成是生活需要或留给子孙。而美国人拥有大量的财富，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有聚财本领，其次金钱也是地位的标志，有了钱感到无上的光荣。

有的虽至耄耋之年，已拥有几十亿、上百亿甚至更多，还在拼命挣钱。金融杀手索罗斯、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都已进入世界首富之列，还在绞尽脑汁把钱往自己口袋里装。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等级观念和惟上思想，这是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痼疾。在农村有能跟县长说几句话就兴奋得睡不着觉，能给乡长白干几天活就会处处夸耀，能给首长开上车就会使人羡慕不已。

惟上思想的肥沃土壤，产生了“文革”中的造神运动。美国人的等级观念、惟上思想比较淡薄，有的低层人士竟不知道总统是谁，雇员只知道自己的老板。我认识的几位华人在大学搞科研，除了知道自己项目的主管教授外，连系主任和院长都不知道。

美国人崇尚实用主义。美国自60年代起几次修改移民法，每年从国外移民近三万人。移民法明确规定，凡学者、教授、专家不分国籍、民族、信仰、资历优先移民。在科学上他们并不苛求理论上的天衣无缝，而是着眼于实用。传统思想是：宁愿使1%的有用理论付诸实践，不追求100%的完善理论，这就是美国的1%大于100%的著名论点。

我曾对比过前苏联和美国的高等数学教材。极限是高等数学的基础，前苏联用几十页讲这种理论，美国教材仅用半页的篇幅，毫不影响以后的应用。一位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清华教授对我说，美国的教材看上去很不系统，但很实用，凡此等等均体现了实用主义精神。

中国人往往安于现状，美国人截然不同，他们极富冒险精神，他们信奉的是刻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大门上的“只要能够梦想的，我们就能实现”。我在参观航天中心时，同行的许多人争相拍摄这句誓言。

美国人就是在英雄主义、冒险精神的激励下，以二百多年的历史，创造了人类历史灿烂文明，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大。美国人的冒险精神，有时使人感到悖乎常理，有人乘铁桶漂流尼亚加拉大瀑布，有人游泳横渡大西洋，五位妇女在海底一间房子里生活了两周……

中国人的简朴著称于世，中国人在美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此。中国在美国的莘莘学子买二手车，打工糊口，对此美国人也伸大拇指。美国人是恣意享受、超前消费，他们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世界25%的原料，他们每人消耗的电是我们的二至三十倍，借债买豪华车、购高级房、寅吃卯粮、银行卡几乎家家透支、全国平均每人有两万美元的债务。

中国人的『阴阳思想』



* 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
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陶东风

中国人之德性

林语堂

一、圆熟

德性“Character”一字是个纯粹典型英国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教育 and 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了。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统治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

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建树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

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表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我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能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现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所以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知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

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当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演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他们也是中国人德性的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性，则我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此等德性的修进，往往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冤家，狭路相逢”。

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我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

- （一）稳健；
- （二）淳朴；

- (三) 爱好自然;
- (四) 忍耐;
- (五) 无可无不可;
- (六) 老猾俏皮;
- (七) 生殖力高;
- (八) 勤勉;
- (九) 俭约;
- (十) 爱好家庭生活;
- (十一) 和平;
- (十二) 知足;
- (十三) 幽默;
- (十四) 保守;
- (十五) 好色。

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

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生；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司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

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

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以致剥夺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而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

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

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

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苍老，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怎么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劣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

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

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以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就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

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二、忍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

它们是怎样产生的？

我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

所以它们不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到今日还存在，是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势力下。如果这种势力除去，其品性肯定也会变得相当地衰微或消灭。

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形。

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源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

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

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导源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没有人对这点存在疑问。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真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

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

我们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但我们的忍耐量小一些，我们的灾苦也会少一些，这一点却未可知。可是这种容忍折磨的度量现在被冠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

我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的德性来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住它吗？中国把忍耐看做崇高的德性，我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此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性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

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性，竭力互相容忍。在大家庭中，即掩闷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中，自幼受了训练使之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流涕，赐缣帛而去。

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

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性，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

我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

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这几个人的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泰尼说过：罪恶和美德犹如糖与硫酸之产物。假使不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性，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是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

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我们说：“学乖了。”）。

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适适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到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略的新闻记者——1926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乖巧了。

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

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值之德性而作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愔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

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

因为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所以就不具有这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乎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传》一书，可为代表。

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常之气焉。ElinorC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立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所以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迹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知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

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给予我们的解答，极为清楚而明确。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许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却被宦官禁压而结束。

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地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166至169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一直百年之后，始为发觉。所以产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

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

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摄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

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起俗。似另一大诗人阮成，常与婢女私通，一日访至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成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

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四、老滑俏皮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索性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言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来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

做一个比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倒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要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

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另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而嫁给他们的秘密。

假使人生值得什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给了人们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意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诘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我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

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着”。顽强的品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是中国最高的智慧，它阻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

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秘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

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深刻的实证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

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知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证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

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实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

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不能谓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卡洛斯因为飞得太高，让蜡质的羽翼都融化了，以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狄德勒斯则低低地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当一个人年纪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糅和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

实利主义是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菱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和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

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是在嘲笑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无信心，此无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

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所以当顺利发展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我们之中努力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性，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的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

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

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是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的支柱。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我们属人民一份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我们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是在法庭以外所解决。

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把它看做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的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

我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我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我们不教导青年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

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惟人主义者”，而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

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性，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我们国家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是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我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计谋，它的性质或许比侵略更为可怕。

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怒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动弹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

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和平

前面我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松懈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

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人生之酸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忍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寻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乐达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使得快快活活地生活。

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只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所以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我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我们有时觉得他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

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使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源于灿烂之学理，而源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

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宏见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我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我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地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

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词语。

“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练容忍这种功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作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倘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

他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糅和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

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管是为一个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

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说：“财钱不可用尽，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锋芒太露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

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人所信守，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说：“切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我们叫它“涵养功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以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的，缺乏涵养功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他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

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地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我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我们应有之程度，虽然我们尚有不息的内战。

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我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我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趣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

因为他们不用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地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元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

我曾耳闻过两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喝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间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

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功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老百姓从来不要中国战争。

六、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兴奋而知足。像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是因为与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相比较的缘故。如果处处用欧美生活标准来衡量，则没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居住在恒温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

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的，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曾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因为巴威地方很少有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当然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种老式理发椅就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仍可在伦敦的Kingsway和巴黎的Mrtrartre发现。

照我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

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以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所以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的神秘感，乃出自西方人的幻觉罢了。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知识阶级，也流露于非知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

可以到北平去看看着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浹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的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

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

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在文学里，这个意识当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我们可以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我曾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和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它。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

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我们就感觉到茫无头绪，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泥的故事常令我们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慕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

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泥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部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谓要摩登的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借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泥之深，因为中国人对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过，中国人与第俄泽泥不同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

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借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

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方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

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就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个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的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

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难弄到；他又想弄一壶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倘他能：“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关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纤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今无此清福，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哀心戚戚。

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的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一身之所有，但如果今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神。

我看中美面子

王安妮

中国人的“面子”，在英文里对应的词是“face”，说白了面子即是脸面。脸面是给别人看的，也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要活得体面，决不能没面子或者丢面子。“面子”素来是件大事儿，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人人都想为自己、为家人、为国家多争些面子回来。

1. 失节事小，面子事大

由于经济文化、习惯礼仪的不同，东方和西方玩面子的方法和角度差别很大，玩出来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在礼仪之邦的中国，人们待人接物都十分“客气”，这既表现了自己的面子，也是给对方面子。失节事小，面子事大，所以万万不可随便丢了面子。出门的时候穿戴要讲究，体体面面见人；吃饭宴请的时候要出手阔绰，免得被人小瞧；送礼要瞅着贵的买，买便宜的丢不起那个脸。

讲究惯了的中国朋友认为“西方人穿着特随便，牛仔T恤满街走”。他们真的是特随便吗？我看并不见得。正式场合他们决不含糊，上班、重大会议、宴会上西装革履；运动锻炼时则一身体闲运动打扮；平时怎么舒服怎么穿。

倒是在中国，摆地摊的、卖菜的都身着西装，甚至还有身着西服脚蹬球鞋的，登山的时候你还会看到穿皮靴或时髦高跟鞋的女郎，她们涂脂抹粉，俨然是去参加重大活动似的。同游的美国客人好奇地问：“中国的皮鞋柔软吗？”

“可能。”我的含糊中夹杂着尴尬。看来硬撑着面子，有时往往事与愿违，失了脸面。

面子不能不要，关键是要合时宜，表现恰当，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2. 愈想表现愈失面子

中国人好客，请人吃饭必然肉鱼鸡鸭，品种愈多分量愈足就愈能表现主人的热情体面，无形当中做客的人也觉得受人重视特有面子，双方心里都会有种满足感。

美国人不同，他们请客要“秀”的东西实在太多。

我曾陪同国内的一个处级干部到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家做客。主人可谓在花足了心思做足了面子。空气里隐隐飘浮着好闻的香味，那是主人的熏香炉点起了特选的香油，桌子上是漂亮的餐巾和精致的全套餐具，吃饭之前主人先是安静地祷告一番，就餐时音箱里传出优美的舒伯特的

音乐，饭前有开胃酒，正点一道道地上，饭后有甜点，礼仪极尽周到。

大家都轻声交谈品尝美食，突然我听到声声入耳的“咂嘴”声，原来是处级干部正津津有味地大嚼玉米饼。我听到主人们小声地交流了一句，他们说原来这个饼很“crunch”（英文意思：发出嘎吱嘎吱声），然后掩藏着笑，会心地交换了眼神。

聊天的时候，处级干部对我说：“告诉他们这个音乐很好听，我会唱《卡秋莎》（前苏联歌曲）呢。”当我在他的催促下翻译过去，对方非常友好地摇头表示不太清楚这首歌。“我还会唱《我的太阳》呢！”他自认为对音乐的理解并不比美国人差，他愈聊兴致愈高，饭后他干脆脱了鞋子翘起双脚，边说话边抖腿。

从美国农民家出来，看得出处级干部十分满意自得，他觉得对方非常客气令自己十分有面子，而且和他们相谈甚欢并无距离感，殊不知早在他大嚼玉米饼时，在主人的相视一笑中，在那0.01秒之间其实一切都改变了。有时愈想有面子，却偏失去了面子，看来光顾穿着打扮还不行，还要修饰装扮自己的“里子”，表里如一方能真正地“有头有脸”。

3. 抓住“爱面子”这根辫子

鲁迅先生算是把中国人的“爱面子”看透了，他说面子是某些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牵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如今，西方的商人就是牵住了中国人“爱面子”的这根辫子，不厌其烦地把名牌服装、化妆品、名车名表输送到中国市场，销售火爆令他们挣得盆满钵满。你穿登喜路我就要穿阿曼尼，你用兰蔻化妆品我就要用雅诗兰黛，你用古奇名牌包我就要用路易·威登手袋，你手腕上戴欧米茄我也要买块劳力士。

为啥？面子呗！为了面子暗暗较劲，拿钱去砸面子的事也并不鲜见。北京推出一台标价888万元的宾利轿车，据说早已有人要求定货。这样的天价轿车，为什么不选在富有的美国或欧洲、中东之地推出，却偏偏选在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

当然不是中国的富翁比欧美巨商、中东王室更有钱，而是中国人更喜欢头脑发热充“面子”，拿这些天价的東西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表现自己的尊贵过人之处。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有钱人才讲面子，中国普通百姓也要面子，有的身上穿名牌衣服回家喝稀粥吃咸菜，为了开上小车住上大房子节衣缩食，在饭店酒楼为抢付账好像打架，结婚不惜借贷摆阔事后挨苦还债，死读书拼命工作就是想有出息光宗耀祖。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在中国比比皆是。

4. 美国人是玩面子的高手

美国人虽然很少为了面子委屈自己，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玩面

子”高手，其手段方法之高明令中国人望尘莫及。

我在美国举行新书发布会，出版商为我请来了专门的经纪人，发布会现场是美国的高级会场，普通人根本进不去。送我去现场的是豪华加长轿车，进了会场我并不需要直面众多的媒体记者，而是进入一间小屋，一切发布事宜全由西装革履的美国经纪人出面，其间只准《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几家影响力大的媒体入贵宾室逐个提问，每个记者只给短短的5分钟时间。

后来去新加坡和香港参加出版社的新书发布活动，仍是由美国人担当经纪人，其职业水平令人不得不折服。他们就是通过这类专业经纪人营造出十足气派，为自己争回了百分之百的面子，而最终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经济效益。

别忘了，资本家最终的标准是利益如何最大化，与中国人绝大多数时候纯粹是为了面子而充阔绰相比，他们倒要显得理智、冷静得多。

美国人买车买楼从事交易，处理交通事故或人际矛盾、经济纠纷时，不会当面争执吵闹，而是把这些事交由保险公司、经纪人、律师去处理，每当有人提高声调要与他们吵架时，他们会笑着对你说：“Have a nice day!”

他们与凡事有理必争的中国人截然不同，中国人惟恐在吵架时输给对方而丢了面子，甚至为一点小事打得头破血流，而美国人认为当众嚷嚷就是丢光面子的事，他们惟恐避之不及，生怕丢了身份失了面子。

为了做足面子，美国人每一处空地都种上花草树木，裸露的土地在他们看来就是有碍观瞻，家里布置也是无一处不精致，连厕所都摆鲜花种植物。中国大城市里建有许多高档的大厦和住宅，内里装修极尽富丽奢华，价钱达到每平方米数万元。然而在某些高档场所的附近，也许就有垃圾场和泥巴地，或是肮脏的小巷，发臭的水沟。

5. 恰如其分是一种修养

在中国的西方人，他们有特定的居住区，活动场所也局限于他们认为够档次的地方，用北京话说就是爱“扎堆”。他们在香港云集在半山上居住，在北京爱到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消遣，在深圳喜欢购买华侨城附近的高档住宅，而一旦中国人也跟着他们凑热闹沾点面子时，他们又开始寻找新地方。

他们极力保持距离避免被同化，尽量保持自己的生活圈，无非是为了享受那种优越感甚至特权，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出西方人有钱的样子，只不过他们大多显摆的形式比较低调，用意比中国人含蓄而已，不像某些中国人喜欢拿钱去砸。

凭能力挽回的面子是一种荣耀，用机智骨气装点的面子是一种修养，不懂装懂虚面子是一种无知，委屈自己硬撑出来的面子是一种悲

哀，拿钱砸出来的面子是一种庸俗。

说实在的，谁有面子，谁没面子，谁的面子大，谁的面子小，谁是虚假的面子，谁有真正的实力面子，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面镜子，一清二楚地映照在里面——你还玩什么装什么呢？

中国人的“阴阳思想”

李经康

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很特殊。最明显的一点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可能是“意在言外”。换句话说，中国人一向不喜欢“直来直往”，如果哪一天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双方扯破脸，就是关键性的时刻到了。所以，身为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中国人；要了解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中国式的“阴阳思想”。

当对方回答“不”的时候，未必真的是“不”，只是碍于面子，第一次需要拒绝来摆摆架子，或是客套的礼貌性回答。而第二次再恳求时，对方可能就同意了。反过来说，当对方说好的时候，也未必就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不愿当面给你难堪而已！

例如：老板在会议上，提了一项改革计划。在老板的长篇大论之后，问问各级主管有没有意见。正当大家都静默无声的时候，有个不识相的家伙，立刻站起来，提出他的看法，并针对计划的弊病，说得口沫横飞，还提出另一项改革计划。

几天之后，他被调职了。不久，又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老板又连降他三级。老板既然会在会议中先提出计划，就是摆明要大家等一下表决时，全部没意见通过。表决当然也只是形式而已，否则在计划公布前，自会先私下征询部属的意见。如果是公开要各级主管做评估时，可别当真，他只是给大家面子而已。

这是典型的“阴阳思想”。老板问大家有没有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告诉大家——不准有意见。

聪明人必须懂得察颜观色，善加分辨，认清对方是真要你开口，抑或只是礼貌性的客套。要弄清楚状况，以免自误，像那位不通“官场文化”与“中式人情世故”，而又口无遮拦的主管，不仅被连降三级，而且保证前途黯淡。随着经验的累积，你的分辨能力也就日益增强。但这种“阴阳思想”的经验，却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什么叫“阴阳思想”呢？

简单来说，就是表面上的动作和心里真正的想法“表里不一”。换句话说，中国人的“行动语言”有时候要反着看才正确。非到关键性的时刻，中国人不会轻易地肯定表明“是”或“不”。

多数人恐怕都会有下面的经验。

例：有一天晚上，临就寝时间，有个朋友忽然来访，经过一阵礼貌

性寒暄之后，双方就座，我开始准备洗耳恭听来意。谁知道，这个朋友东拉西扯地侃了一个多钟头，我还弄不清楚他的来意。由于时间实在太晚了，我只好委婉地下逐客令：“老张！大家明天都还得上班，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或者，我们明天再谈！”

“没事！没事！我不过顺便过来和你聊聊而已！”

我一听，只好站起来送客，走到楼梯口，我正要说再见时，老张开口了！

“老李，最近手头不方便，能不能周转个10万元，下个月我标了会子（会子是台湾民间常见的金融互助活动，“标”在此作动词解）还给你！”

天啊！这么熟的朋友，5分钟就可以谈完的事，这老兄居然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没有深入去体会中国人这奇特“阴阳思想”的民族性，生意是无法做大的。若想以西方式的买卖方式——直来直往，一切公开化，同意与不同意，全部坦然地摊开来讲，用在中国人的商场上，大多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是卖方，当对方对货品既不批评，也不开价，只是一味地打哈哈，甚至称赞“不错！不错！”时，你就得留意了，因为对方很可能是表示“没有意愿”的讯号。例：我初入公司时，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

我提出一个自认完美的企划案，呈给上级，并详细口头说明：公司若接受这个案子，不但每月的销售业绩可增加一倍，而且，员工的流失量会减少，向心力会增强，还可让升迁管道畅通等等。

上级听了，赞不绝口：聪明，有智慧，企划案也很高明等等。最后给了我一句充满希望又值得期待的答案：“再‘研究’看看！”就这样，我就天天期待董事会“研究”之后的好消息。

几天之后，我又主动请示上级，不知董事会是否采纳建议？上级这么答道：“一切的组织与架构都做得很好，很完美。”听了真让我心里非常喜悦，但上级又接着说：“不过，时机未到，董事会还要再深入‘研究’。你的想法不错，年轻人，好好干！将来有你的了！”

这时，我才明了，原来，第一次上级就不认同了。若上级接受，一定会找出案子的瑕疵点，继续讨论下去。只是，碍于情面，不愿让我难堪，嘴里虽然说“不错”，其实是表示“拒绝”。

例：有一天，我部门里有个销售新手，喜滋滋地回到公司来对我说：“我掌握到一个好客户，这客户对这栋房屋非常满意，既不嫌价钱高，对格局、装潢也不挑剔，并直道‘不错’，还说这么漂亮的房子一定很多人喜欢，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

我就问他：“对方有没有第二次看屋，或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呢？”

他说：“没有，但客户只说‘再联络’，所以这一定是个准买主。”

“再联络”就是“再研究”，我的直觉反应是，客人其实不满意，这笔生意肯定泡汤了。果然，以后的发展就“风萧萧兮易水寒.....”了！

反之，如果客户对房子诸多批评，嫌东嫌西，又要查产权，又嫌价钱贵，贷款又少.....，意见一大堆时，我反倒觉得，客户对这房子有兴趣。观察得愈仔细，问得愈多，愈挑剔，正表示他喜欢这房子，只不过是“以退为进”，迂回地拉大议价空间，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利益罢了！毕竟“嫌货才是买货人”哪！

权谋文化与复杂中国人

陶东风

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王蒙在大会发言中向近来各个电视台正在热播的帝王戏开战，指责目前黄金时段播放的帝王戏，内容多半比较粗糙，质量有待于大大提高。

王蒙的发言得到作家魏明伦的积极响应，他直言现在影视中的“帝王戏”多表现非理性的帝王崇拜。这一批评引起了各媒体的热烈讨论，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了帝王戏的种种危害：人治观念、明君崇拜、清官情结，鼓吹等级观念（“奴才”、“皇上”、“万岁万万岁”满天飞），等等。

这些批评都言之成理。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些帝王戏中表现的权术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潜在、长远的消极影响。

帝王戏的核心主题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斗争，而中国的权力斗争的特点是没有显规则而只有潜规则，或者显规则名存实亡，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潜规则。显规则是写在纸上说在口上的，但却常常是摆设，潜规则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在实质上制约着人的行为，决定人和社会的命运。

这个特点最典型地体现在宫廷斗争中。无论是在早些时间播出的《康熙王朝》、《少年天子》，还是近来热播的《大汉王朝》、《大明天子》、《至尊红颜》，无不让人感到宫廷的风云诡秘，特别是近来热播的《少年康熙》更是把权术这个主题推向了极端：极端复杂的宫廷权力斗争终于成就了所谓的一代“圣主”。玩弄权术成为每一个所谓“盛世明君”必备本领，也是每一位大臣的必修课。

这种权术文化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至今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长久受到权谋文化的熏陶浸染，结果是形成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一个突出国民性：老谋深算、城府深、诡计多端、少年老成，一肚子的花花肠子。

在我直接、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中国人比外国人复杂得多，说话办事绕弯子，从不直来直去，而且连他们眼睛也相当的不同：西方人的眼睛显得直率单纯，像一个孩子的眼睛；而中国的孩子大约到了七八岁，眼睛里就没有那种单纯之光了，而

是充满了狡猾、防范、警戒、算计。

我从来都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复杂性是天生的，其实它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同样，西方人的单纯和没有心计（当然也是相对的）也不是天生的，它是法制的结果。法制社会是一个按照明文规定办事的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存在潜规则，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却是显规则。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事情再想办法、找门路也是没有用的，时间长了也就养成了单纯直率的性格，即使有制度的空子可钻，常常也不会或不想钻了；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明文规定的规章，上至法律，下至各种具体的政策法规，从来不是绝对的，不能办的事情可以私下通过关系办成。

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这样，大家就养成了爱琢磨的性格，不是科学家的那种琢磨，而是琢磨人际关系，琢磨怎么才能绕着弯子把事情办成。其中道行高的人常常能够把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些个“英明君主”不多是这方面的高手么？

当每个中国人都变成这样精的人的时候，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大约也就病入膏肓了。

“模糊语”不模糊

杜树人

日前看到一份汇报材料，越看越糊涂，这里摘取一段：“近年来，官兵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员素质有较大进步，革新成果不断涌现，精神面貌变化巨大，学习意识不断增强，激励机制日臻完善。”

读罢如坠迷魂阵中，何谓“近年来”？何谓“明显提高”？何谓“较大进步”？何谓“不断涌现”？何谓“变化巨大”？因为没有过去和现在数字的比较，也没有事实作为依据，所以让人不知所云。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一次我到单位搞调查，问一位领导：冬季取暖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回答说：问题不是很大。不知到底多“大”？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有不少同志常讲这些“模糊语”，比如：大概、可能、也许、许多、不少、不一定、差不多、基本上、原则上等等。

就拿“基本上”这个词来说，它究竟指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还是指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或者是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有“原则上”这一概念，也频频“出境”，它是指坚持原则，还是指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不要原则？某单位规定：上级来人原则上不搞超标准招待。结果在执行上，各按各的理解去做。

以上所列举的“模糊语”、“模糊概念”的滥用，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用于交流，则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使对方难弄明白。

比如，有位同志在向来人介绍抓好安全工作的经验时说：“我们的口号是，领导亲自抓，机关合力抓，基层重点抓。”听者莫名其妙。又如有的单位正式下文说：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不发，可讲可不讲的话不讲。面对这一要求，下级可犯了难，到底可与不可的界限在哪里？

不过，运用模糊语言和模糊概念也有莫大的妙处。

妙处之一，可以进退自如。比如，上级要听某项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有人以“基本上完成”对之。这样回答，既能进又能退。进者，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在积极落实领导的指示。退者，如果领导发现有不足之处，也留有余地，因为说的是“基本上”。

妙处之二，可以打马虎眼。当上级检查某项工作时，有的同志心里没数，说不清楚，于是便以“模糊语”搪塞之。比如，有位领导批评下级安全工作抓得不力，这位下级辩解：我们也经常抓啊！什么叫经常？一年抓几次是经常？达到多少次是经常？

妙处之三，可以不得罪人。比如一些同志批评别人好用“有的”二字，这样就避免了得罪人。其他妙处还有，恕不一一列举。

治疗模糊病的良药是讲求精确。记得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一位名叫史密斯的传教士写的。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二十几种特征，除“节俭持家”“勤劳刻苦”等外，还有一种是：漠视精确。这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眼下，让人担忧的是这种漠视精确的模糊病很流行，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

从犹太人看中国人

海龙

都说犹太人与中国人很像：都重教育、善解人意、轻视女性、关心政治……但与之接触久了，会发现中国人跟犹太人很不像。

一个犹太朋友曾告诉我犹太父亲教育儿子的故事：一个慈父把3岁的儿子放在窗户上叫他往下跳，父亲在下面接。孩子玩得忘情而高兴。到了第三次，孩子又欢快地跳下，但父亲并没有去接，可怜的孩子跌在地上哇哇大哭，慈祥的父亲则在一边暗笑。

孩子抱怨父亲为什么不接反而欺骗了他。父亲在儿子惊恐之余，循循善诱地教导儿子：“你为什么以为我接了你前两次，就一定有理由再接你第三次？你为什么以为我是你父亲，就一定会帮你？”

当然，这样的教育孩子一定终生忘不了，但是我想这有点儿太残酷了。为什么要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印上如此阴沉深重的刻痕？为什么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就要让他学会怀疑和仇恨？

犹太朋友的辩驳却令我惊讶。他说：“犹太人为什么不能怀恨？一个被逼得逃离了自己家园数千年，一个被逼得操贱业、受人宰割而只能忍辱偷生以苟延残喘，一个世代浪迹天涯，深味做人不易和世态炎凉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怀恨的最后的权利！”

我被他的逻辑震惊了。

犹太人给人的印象在于他们的抗争、奋发与要强。由于灾难深重，犹太人颇有来由地盼着有一天出人头地。从中世纪开始，就亦步亦趋地理财赚钱，几乎成了整个世界的理财家和商人，到了当代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焉能不红、不发！站在财界顶端的犹太人终于扬眉吐气了，跨进政界、学界及企业界，主持世界事务。由于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的底层，犹太人学会了隐忍。但是犹太人深知，要想翻身，必须注重教育，所以在犹太人心中，教育是宗教，是铁律，诋毁教育或不接受教育都属犯罪。

不管多贫困，男孩子都要受教育。整个世界的犹太人都同属于一个社会，全世界的犹太人帮穷的犹太人读书。犹太人很珍惜金钱，但在这事上义不容辞，他们不忍、不敢吝啬。这类的吝啬者会为犹太民族所不齿。

犹太人守时，因为世代经商，知道时间是金钱的道理。犹太人圆通，商人不敢不圆通。犹太人也执拗，人有了钱，会学会执拗的。

由于有上面的特征，有很多人说犹太人像中国人。西方人说像，犹太人自己承认像，中国人也乐于说像。比起讲科学认死理的西方人来，中国人与犹太人都重教育、守时、圆通、善解人意、乐于应酬、爱言商事、保守、轻视女性、关心政治、实惠、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善于妥协、见风使舵等等，实在不只是像，简直是兄弟。

但是与犹太人接触久了，会发现中国人跟犹太人很不像。在好多事上，犹太人比中国人有眼力、顽强、坚忍，知道团结的道理，事事抱团，还有，犹太人公然教导宣扬怀恨和记仇。

每年春末，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总是有人拿着喇叭没日没夜地念人名，一念就是好多天，校园中间主干道上从东到西都用粉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人名，起初颇不知其所云，后问友人，知是犹太学生在悼念二战中被虐杀的死难同胞的名字。

日日夜夜，每人轮值一小时，厚厚的、无尽的名单，几乎没人听，甚至没人留心，大多数的外人不知他们在干什么，风风雨雨，烈日曝晒，他们全不在乎，只是一心一意地念，被念的死者的名字瞬间随风飘去了，粉笔写在地上的字也保存不了多久。这些东西都很容易抹掉，但这种行为的符号意义却永远抹不掉。

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于小看或忽略这个民族、这种刻骨铭心的恨。可惜中国人太聪明了，不愿干这些明知“无用”的小事。我常想，中国人若能有一丝这样的精神，日本人也不敢在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以后死不认错。

与之相比，德国人已诚恳、胆战心惊地认错了，直到今天还在退赔战争中的一切，犹太人仍不依不饶。顺便说一句，犹太人至今仍抵制德国货。犹太人所购货品中，哪怕有一颗螺丝钉是德国的，他们都坚决不买。

犹太人为人很自私，而且他们并不掩饰这种自私。中国人也自私，但很掩饰，重谦让，容忍，把自私包装起来，较愿意看得远一点，于人于己都有利。笑脸迎人，老道，圆熟，富有难解的人情味，“东方神秘主义”，这是比犹太人“棋高一着”的地方，也是西方人最难理解的地方。

在行商上，犹太人重信用，讲商业道德，货真价实，但生意永远总归是生意，生意做完，翻脸无情。中国人热情缠绵，生意不止是生意，表面上情义兼顾，内里的信誉常悬个问号，轻诺而不重契，先是满面温情而后剑拔弩张，起于哥们儿义气而终于对簿公堂，这倒不如犹太人痛快。

在纽约布碌伦区的正宗犹太人，穿一袭黑衣，大礼帽下扣瓜皮小帽，大胡子垂胸，裤子口袋下满垂缨络。跟这类人做生意你不必担心，

虽然有人说他们做生意狡诈，但他们绝不走邪门歪道，说出去的话一定算话。

可有一件，他们至今异性在公开场合是不能相互握手的，即使是在做生意也是如此。但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竟是女权主义的孳生地和急先锋，大多数的女权主义理论家是犹太女人。犹太人家里当政的也绝对是女人，她们专司家里的一切事务和子女教育，这就是世所周知的“犹太人的妈妈”制度。

犹太文化就是这么一个奇异的充满了矛盾的文化。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傅斯年

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准确、形容极妙的话，说“南方之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之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到了现在，已经二百多年了，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

我也从《论语》上找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细考究起来，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利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聪明，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照最粗浅的道理说，聪明是一种能力，用来做深邃的、精密的、正确的判断，而又含有一种能力，使这判断“见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饰，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

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一般的人，只讲究外表的涂饰，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论到做事，最关切的是应酬，论到求学，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没道理的议论，油滑的文词。

“圆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词，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时时刻刻想学的。他只会“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来，只管目前，不管永远；只要敷衍，不问正当解决办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实在。到处用偏锋的笔法；到处用浅薄的手段。

本来缺乏做正确判断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专做质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觉得“小慧”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无须真聪明，就成了“小慧主义”了。世上所谓聪明人，一百个中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似聪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

何以中国人这样“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气薄弱的现象，一群人好行小慧，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中国人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这“好行小慧”，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哪一件不是一日千里！哪一件不用真聪明！真毅力！哪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人总要有主义的，没主义，便东风来了西倒，西风来了东倒，南风来了北倒，北风来了南倒。没主义的不是人，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只有石头，土块，草，木，禽兽，半兽的野蛮人，是没灵性的，因而没主

义。

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桩事，总要定个目的，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没主义的人，已是随风倒，任水飘，如何定这目的？如何找这路径？既没有独立的身格，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

没主义的人，不配发议论，议论是非，判断取舍，总要照个标准，主义就是他的标准，去掉主义，什么做他的标准？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

- (1) 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
- (2) 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
- (3) 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
- (4) 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
- (5) 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

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差不多先生传

胡适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可谓无人不知，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也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上，因为他是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得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得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却买了白糖回来，妈妈骂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个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说：“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结果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在两分钟前开走了。

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也太认真了，8点30分开同8点32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大夫。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

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吧。”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

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这句格言，方才绝气。

他死后，大家都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圆通大师。

后来，他的声名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张藏藏

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在北京某高校任教。这位朋友最大的也最持久的乐趣便是与来到北京的各类外国人打交道，他总有机会也总有能耐跟老外们混得倍儿熟。然后，再找机会把各个国家的以及他那些外国朋友的各种奇闻轶事叙述给我们听。

他有一位英国朋友叫马克，据说他跟马克的交情已有多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他这样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夜里3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

诸如此类的消息特别多：“马克在日本跟一个尼姑好上了。”“瞧见我身上这件T恤了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

不是说他吹牛，我知道那个马克。有次正好我去王先生家找一本书时，马克来电话了。王先生拿起话筒后一下子激动非凡，满脸的青春痘都熠熠发光，他一迭声高叫：“哦马克，哦马克……”

然后用一种显然装饰过的（装饰得更有牛津味）英语热烈交谈起来——为了避免他接完电话后再宣布消息，我悄悄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的这些同胞怎么啦？

1995年在北京惠侨饭店，我认识了一位其貌不扬但据说诗歌写得极先锋的女诗人。她旁若无人地说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5月份我从加拿大回来，先去的美国，待了3个月，过边境去加拿大，啊，我从没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还有那种气候，从来没有过，好像上帝过于偏爱他们……”

写起来像一个杜撰的讽刺小品，但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女诗人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再去描绘她说话时那种痴迷的表情，笔力不逮，反正她眯着眼睛，似乎竭力要让自己的感受能与那里的天空气候再契合一次。

后来我发现不对：电视里不是经常报道美国什么地方暴风雪肆虐、冻死了多少流浪汉吗？要开奥运会的亚特兰大据说夏天的气温也会达到四十多摄氏度吗？也许那位女诗人去美洲时正赶上了好季节。但是，中国显然也有这样的時候啊？她就那样轻易地下结论：上帝偏爱美国人。

不能否认，在中国人中间，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恨不得能换掉自己的血，恨不得从来就不懂汉语，他们也是种族主义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歧视的正是自己。

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病症。这是另一类的中国人，这种病有两大症状：一、在洋人面前，他们表现得唯唯诺诺，极想变成奴隶，并且如果变成之后还欣喜若狂。二、成了洋人，汉语变得不流利了，有些关键的词必须要借助其他语种的词汇才能使整个句子连贯起来。

1996年3月7日，我去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与X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商谈一笔广告业务。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国雇员，这位看上去不足30岁的小伙子在我落座以后居然用英语和我交谈，这使我大为惊讶，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他能否使用汉语，这样我们可以谈得更到位一些。

他说：“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很宽容，同意用母语与我谈判。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地插入英语词汇。比如他转身吩咐一位下属（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主管）：“请递给我一张Paper（纸）。”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一快要失去它原来的名称了。

我们的报纸上有不少文章都提及法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的，而且，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都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如果在法国你向一位老人打听道路，最好不要用英语，那样的话他有可能瞪你一眼然后拂袖而去。

在法国请使用法语，这似乎成了法国人的一个信条。不错，文明不应该相互拒斥，但是，当某种文明开始对其他文明进行倾覆和鄙夷时，我就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这样的权利：捍卫自己的文明！

目前，很多国内的宾馆都让自己的同胞寒心。你打一个电话去宾馆时，接线生总是向你咕噜一句英语，有的还好一些，后面接着来一句汉语：“你好，饭店”。有的干脆就百分之百地涉外了。你在台前订房时告诉你的是美元/天，房间里的订餐单上的目录总是先英语然后在括号里再写上汉语菜目，走过宾馆你整个一个在国外的感觉。

我有疑问，如果这样理解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含义是否太狭隘了一些？处处想到外国人方便，又处处给自己的同胞设置路障，这就叫走向世界？我看还不如说走向丢人、走向失格更贴切。

对自身的血统不予认同，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危机蔓延的可怕后果。

还是我开篇谈到的那位王先生，他有一次醉后大哭：“呜呜——呜，中国真他妈俗气，真他妈单调！这个土地上只有繁殖就是不可能有爱情，人家马克的那种爱情在中国找不到的呜……”王先生几次恋爱受挫，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心情化成愤恨一下子投向他生于斯长于

斯的国度，那就只能从更深的方面去找原因了。

王先生有几次谈到马克在泰国的艳遇，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英国无业游民马克先生（据说其父是著名核物理学家）到泰国旅游，觉得泰国真是男人（特别是有钱的男人）的天堂，他尽情狎乐，但几天之后也有些倦厌（体力不支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于是买了机票准备回国。

在即将离开曼谷的前一天晚上，马克百无聊赖，于是信步走到一家临河的小咖啡屋。当一位少女给他端上咖啡时，他仿佛一下子受到了电击，目光也呆直了，他从没见过这般清纯脱俗的女孩，而且整个晚上他都没能想出一句话来跟那位姑娘说。

在临离开之前，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一张纸上匆忙写下这样几句话：“我叫马克，我马上要回英国，但我一定要回来把你娶回去。”他把纸条连同小费塞在那姑娘手里，然后便魂不守舍地逃也似的走了。

一年以后，马克果然又去了泰国。当他来到那家咖啡屋所在的街道时，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咖啡屋不见了，那个位置上新盖了一家饭店，这番景象使马克头脑一阵阵发晕，几欲跌倒，他不加选择地走进了某家酒吧，一杯一杯地给自己灌酒，这当儿，一双手从后面蒙住他的眼睛，一个轻柔的、天使般的声音低声唤道：“马克……”

结局是美好的：马克蓦然回首，然后便激动得大吼大叫，然后他们紧紧相拥去了宾馆，然后……马克完成了爱情，一个人来了中国。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专门在第三世界的街头、校园、饭店等场所转悠，遇到稍有姿色的女孩便上前搭讪问路。据说他每次出国旅游时，包里总要带十打保险套……

他的爱情可以像唾液那样，随时随地分泌。

当他在蹂躏我们的姐妹时，我们还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她们得到了“人家马克的爱情”。

我快窒息了。

为那种中国人！为那种洋奴！为那种洋奴嘴脸和行径！

我唾弃——啊呸！

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龙应台

中国人的病

沈从文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

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做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

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

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做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点。再不然，他就是“市儈”了。

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

后又老老实实同做新朝的顺民。

历史上做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做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

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

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做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接近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

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

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没有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

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主，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

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绝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

的年轻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做糊涂事，所做之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

（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的。）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

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诩，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处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房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店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几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开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开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

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

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从德国人看中国人

沙叶新

虽然我去德国之前对德国知之甚少，可有两则关于德国人的笑话我却记忆甚深。

一则是说，若是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英国人决不惊慌，至多耸耸肩就依然很绅士地往前走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美国人则很可能唤来警察，报案之后留下电话，然后嚼着口香糖扬长而去；日本人一定很痛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回到家中反复检讨，决不让自己遗失第二次。惟独德国人与众不同，会立即在遗失地点的100平方米之内，画上坐标和方格，一格一格地用放大镜去寻找。

还有一则笑话是说，如果啤酒里有一个苍蝇，美国人会马上找律师，法国人会拒不付钱，英国人会幽默几句，而德国人则会用镊子夹出苍蝇，并郑重其事地化验啤酒里是否已经有了细菌。

我本以为在这两则笑话中德国人的严谨认真态度和科学求实精神被大大地漫画化了，可我到了德国以后，以我的所见所闻相印证，才觉得这两则笑话对德国人的性格刻画虽然有所夸张，但也并不太失真，而且还很传神。

我这次是作为剧作者随《东京的月亮》剧组到德国去参加演出的。演出的地点是汉堡的塔丽雅剧院，这是汉堡的三大剧院之一。

装台期间，我们的灯光设计和德国技师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国际冲突”。我们的灯光设计在爬吊杆装吊灯时，用的是从国内带去的人字梯，可德国技师认为不安全，坚持要用德国的有调节平衡装置的人字梯。

他们架好了“德国制造”的人字梯后，精细地调节四只梯脚，使之不差分毫地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以保证梯子的绝对垂直和平稳。调试过后，德国技师还不放心，又用手反复摇试，使之无一点晃动。经过这样严格的检验、确信百分之百的平稳后，才允许我们的灯光设计爬上去。

其实我们带去的梯子，也十分坚固，使用十多年，爬上爬下数千次，也从未出过问题，而且人字梯并不高，即使有些晃动也不会有危险。可德国技师硬是要用他们的梯子，似乎过于叫真，过于刻板，其实细思之，这其中体现出日尔曼民族的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

首先是对劳动者极大的尊重和保护。德国不但有条目繁多、内容广泛的《劳动安全法》，而且还有非常细致和独特的《工作场所法》。

比如该法规定工作场所的室内高度不得低于2.75米，室内必须有窗可以看见室外（严禁在封闭的工作场所劳作），必须提供每个工作岗位的足够空间（不得在拥挤的环境中工作）等，最令人感动的是它甚至还规定工作场所必须有新鲜清洁的空气，必须有与工作人员的健康相适应的正常温度，否则便是违法，工作人员可以控告业主。连对工作场所中的空气和温度都有严格规定，更何况是梯子呢？

有法就必须严格遵守，这又体现了德国民族的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中国驻汉堡的副总领事曾对我讲过他刚来汉堡时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在限速的公路上超速了几秒钟，为的是越过前面德国人开的一辆车去转弯。转弯后，他发现被越过的这辆德国人开的车在他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总领事馆下车后，他问这个德国人为何一直跟着他。这个德国人说，我追了你一个半小时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超速？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德国人就是如此认真。一个认真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今年是东西德统一5周年，在这短短的5年里，这两个政治实体并没有因为原有的血型不同而产生“异体排斥”，发生社会动乱。相反原东西德地区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原东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已达到9%，居整个欧洲之冠，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这次我去柏林旅游时，花了7马克买了一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为纪念。带回上海后，我拿给朋友们观看。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问过一个问题：这花了近40块人民币从德国买来的水泥块，真的是柏林墙上的一块吗？会不会是假的？

我感到悲哀。悲哀的是只有我的同胞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被自己席卷全国、无孔不入的造假吓坏了。在德国什么东西都可能买到，可要想买假的东西却很难、很难！

假如是一个中国人，他在本文开头讲的两则笑话中会是什么态度呢？其实在原笑话中是有我们中国人的角色的。但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故意隐去了。可是将真事隐去也是一种假，为了打假，我……我就说出来吧！

在第一则笑话中，是这么挖苦有些中国人的：说咱中国人在大街上遗失一元钱，不会像英国人那样若无其事，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唤来警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自我反省，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认真寻找，而是狠狠地在地上吐口唾沫，然后大骂一句：“哼，谁拾到谁就去买药吃！”于是心理上就平衡了。这种阿Q精神曾被鲁迅先生深刻地批判过，我们周围就有这样的人，不算丑化。

在第二则笑话中，对啤酒里出现苍蝇一事，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

样去找律师，不会像法国人那样拒不付钱，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幽默几句，也不会像德国人那样进行化验，而是.....而是.....而是个别人会将苍蝇从啤酒里捞起，喝它一半，要求赔偿，并且再到第二家啤酒酒店，将苍蝇偷偷放在啤酒里，继续要求赔偿。

这.....这.....这不是太损我们中国人了吗？可遗憾的是我在前年访问日本时确实听说有的中国就读生将蟑螂故意放在面条里要求日本老板赔偿的事。虽然我也知道这是个别的。

中国国民之品格

梁启超

品格者人之所以为人，借以自立于一群之内者也。人必保持其高尚之品格，以受他人之尊敬，然后足以自存。否则人格不具，将为世所不齿。个人之人格然，国家之人格亦何莫不然？

国有三等，一曰受人尊敬之国。其教化政治卓然冠绝于环球，其声名文物，灿然震眩于耳目，一切举动，悉循公理，不必夸耀威力，而邻国莫不爱之重之。

次曰受人畏慑之国。教化政治非必其卓绝也，声名文物非必其震眩也，然挟莫强之兵力，虽行以无道，犹足以鞭笞群雄，而横绝地球，若是者邻国虽疾视不平，亦且侧目重足，动色而群相震慑。

至其下者，则东然不足以自立，坐听他人之蹴踏操纵，有他动而无自动，其在世界，若存若亡矣。若是者曰受人轻侮之国。

第一种国，以文明表著如美者也。第二种国，以武力雄视如俄者也。第三种国，文明武力皆无足道，如埃及印度越南朝鲜者也。国于天地者殆以百数，然第其国势，不出三者。我中国固国于大地之一国也，三者其何以自处？

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也，其开化远在希腊罗马之先。二千年来，制度文物，灿然照耀于大地。微特东洋诸国之浴我文化而已，欧洲近世物质进化，所谓罗盘针火药印刷之三大发明，亦莫非传自支那，盖东来之余沥。中国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认矣。

至于武功之震铄，则隋唐之征高丽，元之伐日本，明之讨越南，兵力皆远伸于国外，甚者二千年前，汉武帝凿通西域，略新疆青海诸地，绝大漠，逾天山，越帕米尔高原，度小亚细亚，而威力直达于地中海之东岸。读支那人种之侵略史，东西人所不能不色然以惊者也。

数百年来，文明日见退化，五口通商而后，武力且不足以攘外。老大帝国之丑声，嚣然不绝于吾耳。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诋为野蛮半化矣。昔之慑我强盛者，今乃诋为东方病夫矣。乃者翦藩属，副要港，议瓜分，夺主权。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实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

彼白人之视我，曾埃及印度诸国之不若。祖国昔日之名誉光荣一旦扫地以尽，遂自第一第二之位置，颓然坠落于三等。谁实为之，而至于此？

且夫四百余州之地，未尝狭于曩时也。人口之蕃殖，其数几倍于百年以前。然东西诸国，乃以三等之国遇我者何也？曰：人之见礼于人也，不视其人之衣服文采，而视其人之品格。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

我国民之品格，一埃及印度人之品格也，其缺点多矣，不敢枚举，举其大者。

一爱国心之薄弱。支那人无爱国心，此东西人诋我之恒言也。吾闻而愤之耻之，然反观自省，诚不能不谓然也。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

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无智愚贤不肖，皆皇然为一家一身之计。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势必如犹太人之流离琐尾，不能一日立于天壤之间。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樨，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

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直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人而禽兽不若，尚何品格之足言耶？

一独立性之柔脆。独立有二义，一曰有自力而不倚赖他力，一曰有主权而不服从他权。然倚赖为因，服从为果。孩稚仰保姆之哺抱，故受其指挥，奴隶待主人之豢养，故服其命令。孩稚奴隶，二者皆未具人格者也。

若夫完具人格之人，则不倚赖他人而可以自立，自不肯服从他人而可以自由。苟或侵夺其主权，则必奋起抗争，虽至糜首粉身，必不肯损辱丝毫之权利，以屈服于他人主权之下。此人道之所以尊贵，而国权之所由张盛也。

荷兰蕞尔之国耳，见围于路易十四，窘蹙无以自存，其国民强立不挠，乃尽撤堤防，决北海之洪流以淹没其国，宁举全国之土地财产家室坟墓，尽掷之巨浸之中，宁漂流无归，保独立于舰队之上，必不肯屈志辱身，隶人藩属，受他族之辖治，以玷污人民之名誉，损辱国家之主权。

呜呼？读荷法之战史，其国民雄伟之品格，犹令人肃然起敬，悚然动容。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扼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憚为之奴。

昨日抗为仇敌，而今日君父矣，今日鄙为夷狄，而明日神圣矣。读二十四朝易姓之史，睹庚子以来京津之事，不自知其赧愧汗下也，品格

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

一公共心之缺乏。人者，动物之能群者也。置身物竞之场，独力必不足以自立，则必互相提携，互相防卫，互相救恤，互相联合，分劳协力，联为团体以保治安。然团体之公益，与个人之私利，时相桡凿而不可得兼也，则不可不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

然无法律以制裁之，无刑罚以驱迫之，惟恃此公德之心以维此群治，故公德盛者其群必盛，公德衰者其群必衰。公德者诚人类生存之基本哉。

我国人同此人类，非能逃于群外也，然素缺于公德之教育，风俗日习于浇漓，故上者守一自了主义，断断然束身寡过，任众事之废堕芜秽，群治之弛纵败坏，惟是塞耳瞑目，不与闻公事以为高。下者则标为我为宗旨，先私利而后公益，嗜利无耻，乘便营私。又其甚者，妨公益以谋私利，倾轧同类，独谋垄断，乃至假外人之威力以唆剥同胞，为他族之伥鬼以搏噬同种，谋丝毫之小利，图一日之功名，不惜殄其群以为之殉。

呜呼！道德之颓荡至此，是亦不仁之甚，可谓为人道之蝨贼者矣。

一自治力之欠缺。英人恒自夸于世日，五洲之内，无论何地，苟有一二英人之足迹，则其地即形成第二之英国。斯固非夸诞之大言也。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最富于自治之力，故其移殖他地，即布其自治之制度，而规律井然，虽寥落数人，其势已隐若敌国。是以英国殖民之地，遍于日所出入之区。

中国人之出洋者亦众矣，然毫无自治之能力，漫然绝无纪律，故虽有数百万人，但供他人之牛马，备他人之奴隶，甚者以赌博械斗吸食鸦片污秽不洁为他人所唾骂不齿，藉口而肆言驱逐。

且非独在外而已，在内亦莫不然。故中国者上凌乱无法之国也，中人者一放荡无纪之国民也。夫合人人以成群，即有以善此群者之团治，以一群之人，分治此一群之事，而复有法律以划其度量分界，故事易举而人不相侵。

中国人缺于自治之力，事事待治于人。治之者而善也，则大纲粗举，终不能百废俱兴也。治之者而不善，则任其弛堕毁败，束手而无可如何。然中国治人者能力之程度，去待治者不能以寸也，故一群之内，错乱而绝无规则，凡桥梁河道墟市道路以至一切群内之事，皆极其纷杂芜乱，如散沙，如乱丝，如失律败军，如泥中斗兽，从无人奋起而整理之。一府如是，一县如是，一乡一族亦罔不如是。

至于私人一身，则最近而至易为力者矣，然纷杂芜乱亦复如是。其器物不置定位，其作事不勒定课，其约束不循定期，其起居饮食不立定时，故其精神则桎梏束缚，曾无活泼之生气，独其行为举动，则荡然一

任自由。呜呼！文明野蛮之程度，视其有法律无法律以为差耳。不能自事其事，而徒纵其无法律之自由，彼其去生番野蛮也曾几何矣！

此数者，皆人道必不可缺之德，国家之元气，而国民品格之所以成具者也。四者不备，时曰非人。国而无人，时曰非国。非人非国，外人之轻侮又毋足怪也？然我中国人种，为世界最膨胀有为之人种也。

英法诸人，非惊为不能压抑之民族，即诧为驰突世界之人种，甚者且谓他日东力西渐，侵略欧洲，俄不能拒，法不能守，惟联合盎格鲁撒克逊同盟庶可抵其雄力。

迺来黄祸之声，不绝于白人之口。故使我为红番黑人，斯亦已耳，我而为膨胀人种，不蓄扩其势力，发挥其精神，养成一伟大国民，出与列强相角逐，顾乃萎靡腐败，自污自点，以受他人之辱侮宰割，无亦我国民之不知自重也。

伽特曰：人各立于己所欲立之地。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国民者个人之集合体也。人人有高尚之德操，合之即国民完粹之品格。有四万万之伟大民族，又乌见今日之轻侮我者，不反而尊敬我畏懼我耶？

西哲有言，外侮之时，最易陶成健强之品格。我国民倘亦利用此外侮，以不负其玉成耶。不然，读罗马末路之史，念其衰亡之原因，不能不为我国民栗然惧也。

谈谈民族的面子

李平心

暴发户爱对人摆阔，破落户爱夸耀过去，这可以说是两种怪可怜的心理。

美国的绅士阔佬们欢喜铺张斗奇，事事爱出风头，他们最感觉兴趣的，是耸入云霄的摩天楼，是好莱坞的电影皇后选举，是汽车飞机竞赛的锦标，是各色各样莫名其妙的新纪录。而中国的许多新旧“高等华人”却欢喜追忆古昔的强盛与文明，他们引为夸口的，是战胜蚩尤的黄帝，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是古圣先贤的道德文章，是忠臣烈士的奇勋伟业。

如果说前面的死出风头是典型的暴发户的狂态，后面的死要穷脸就只好算是典型的破落户的酸相吧。

在我们这个多难的国度里，自夸自解的破落户精神是跟着民族艰困的继续加深而一天一天在膨胀着。那些哼着“今夫天下”而不知天下多么大的大人先生们，一开口就是“五千年的文明”，把自己称做“黄帝子孙”，把祖国称做“神州”“禹域”——至于黄帝大禹这样的人究竟有没有是可以不管的——仿佛有了古代的光荣，就可以涂抹现代的耻辱！

有些有“历史癖”的学者名流还会从历史上引证许多史实证明汉族同化异族的能力是如何之强，因此“五胡乱华”不打紧，蒙古满族统治中原也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们到头是给汉族“同化”了。照这个满不在乎的逻辑推论下去，中国即使亡了自然也不用愁，我们能够在精神上同化胡人，难道不能在精神上征服统治我们的东西洋人？

这样的“达观”精神自然是那些有涵养工夫的“高等华人”所必须具备的，但这还不能概括破落户式的心理的全貌。在另一方面，我们更看到许多可怜虫爱受别人的惋惜，爱听别人的慰辞。

好像正为要投合这种心理，外国的老滑头——碰着他们所看不起的“柴纳门”（Chinaman，外国死硬派对中国人的讥称），如果不称道中国人酷爱和平，便盛赞中国精神文明的伟大。

罗素到中国讲了一回学，把中国的“东方文明”夸了一顿；室伏高信游了一趟中国，把支那御用的“爱和平”的学者又捧了一阵；甚至法国的礼拜六派小说家德古勃拉到中国玩了一回，也要对中国的女人赞美一番。

受捧当然是“写意”的，不过那些当面捧捧中国的人，背过脸去也许

可以宣传中国的辫子与小脚（罗素这一类的学者还算是有点良心的）。有的呢，在中国人面前盛赞中国的文化是如何伟大，国民性是如何和平，而在他们本国人面前，却盛赞中国的土地是如何肥沃，矿产是如何丰富，为着什么？自然是要激起他们的“同胞”“研究”开发中国的兴趣。

好像在日本一个什么“支那通”的学者（这个人大约是长野朗）的大著里，曾说中国是爱占小便宜的民族，我们不承认这种狗屁不通的中国民族观，但是中国确有少数莫名其妙的人是想贪点意外的小便宜，一丝一毫地在那里计较一点小面子，称洋人做“夷狄”的笑话虽然渐渐少起来，但是希望从洋大人得到一些不相干的好评，正是许多高等华人的共通心理。

聪明的洋绅士看透了这些高等柴纳门的脾气，于是常常拿一些不痛不痒的甜言蜜语往这些人的耳朵里塞：“你们中国的精神文明是多么可贵，为什么要学我们西洋人的物质文明？你们有孔子、老子、孟子，为什么要崇拜我们的牛顿、法拉第、达尔文？”

听了这番话，许多人就真的“觉悟”过来了：“是呀！放着我们自己固有的精神文明不去发掘，偏要去模仿人家的物质文明，那是多么傻呀！”于是在论坛上在学苑中变的东方文明的戏法就越来越多了。

但是事实指给我们看：英国的绅士们在印度人面前也盛赞印度的“文明”，在埃及人面前也盛赞埃及的“文明”，在盛赞后面隐藏着一大包蒙汗药！难道我们一点儿看不清么？你想想看，假如中国人个个是尊孔读经，安分守己，不懂得利用新的科学与技术，不知道世界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洋大人在中国的统治不就保了险吗？

在愁云惨雾笼罩整个中国的今天，我们的艺术展览会又在伦敦开过了。据说这一次可算是“盛况空前”，英国的工程大臣戈尔甚至说“由这个展览会可以更加知道中国的灵魂”！这一个怪响亮的喝彩会把许多绅士先生们引得笑咪咪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只要大家多加一番思索，要从这个喝彩的里面找到另外一点什么，大约也是不难的吧。

有人说，爱面子是人类的天性，个人的面子尚且要紧，何况民族的面子？现在有了许多民族古董，陈列给欧洲人看，不是可以在国际间带回不少文化上的面子吗？

然而一说起面子，在这个不尴不尬的世界里，像我们这样的弱小民族就只是吃亏上当的时候多。我们的“面子主义”者说过一些什么呢？有的说东邻友邦替我们黄种人争了不少面子，我们到底是同文同种，何妨携手“奠定东亚和平”？有的说我们宁愿亡于英美，不愿亡于东邻，所以我们有联合英美的必要。

依据这类的妙论，在外交上就出现了所谓“东京路线”、“伦敦路线”、“华盛顿路线”等等。不过这类的“面子”论一碰着帝国主义的“大面

子”，就只有粉碎。

“一·二八”战争的时候，所谓“某国人”曾宣称“讨伐”中国是为了争“皇军”的面子。当时上海有一个洋绅士办的西文报就发出了这样的论调：“某国人所要争回的是一点帝国的面子，只要中国人让点步，战争不就老早结束了吗？”（大意如此）

正是因为要顾到某国人的面子，所以当时租界就成了某国人屠杀中国兵民的根据地，这跟目前英法为了要顾到墨索里尼的面子，正在商量肢解阿国，以免“狗急跳墙”，正是差不多的道理。不消说，英法绅士们更怕白种“文明人”在黑种“野蛮人”面前丢面子，也就是丢了自己的面子，以致引起不堪设想的殖民地叛乱。

所以归根结底说，要是不粉碎洋大人的大面子，我们斤斤计较不值半个铜板的小面子有什么用？中国未来的民族光荣决不是照耀在高等华人所看重的虚伪的面子上，而将闪现在斩断了枷锁的自由的身子上。

镜子

连晨

有两件事，我认为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镜子，其中一件是老外干的，另一件也是老外干的。我把它们分述如下。

第一件事：

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建于1917年的6层楼房，该楼的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20世纪末，也即那座叫做“景明大楼”的楼宇在漫漫岁月中度过了80个春秋后的某一天，它的设计者远隔万里，给这一大楼的业主寄来一份函件。

函件告知：景明大楼为本事务所在1917年所设计，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敬请业主注意。

真是闻所未闻！80年前盖的楼房，不要说设计者，连当年施工的人，也不会有一个在世了吧？然而，至今竟然还有人为它的安危操心！操这份心的，竟然是它最初的设计者，一个异国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是怎样的一种因素（体制？岗位责任制？金钱的诱惑？铁的纪律？敬业精神？个人品德？还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日常的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使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在时空中更新换代了数茬人的机构，虽经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仍然守着一份责任、一个承诺？面对咱自己的豆腐渣工程，我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第二件事：

在东北地区滨州铁路穿越小兴安岭那条最长的隧道的山顶，有一座方方的石碑，那里长眠着一位异国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曾负责这条隧道的设计。当工程进度由于意外没有按照预定时间打通时，这位工程师开枪自杀了！她以自杀来抵补自己的失职和耻辱。

这种自责方式对我们来说也许太陌生了。我们太习惯于在失败面前寻找“客观原因”了，我们也太习惯于在失误面前为自己开脱了。一个肩上负有责任的人，出了天大的责任事故，别说引咎自杀，辞职谢罪的也少有。一位异国女工程师喷洒着鲜血的自责行为，让我异常分明地看到了我们灵魂中的暗点。

以上两个故事，将是我后半生永不丢弃的镜子，既照我的言行，也照我的内心，我愿意把这两面镜子送给所有有自省精神的人。

难以合作的中国人

黎鸣

“一盘散沙”言犹未尽，对于中国人的难以合作实在还应做更微观的思考。

中国人好讲面子，什么事情总是好话、漂亮话说在前头，等到利益切于肌肤之时，什么好听的话早忘得精光，面子话既不是诺言，违背起来如水之就下，所以背信弃义在中国人简直是家常便饭，好心不得好报、甚至恩将仇报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俗话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在不假。

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西方人不讲面子而讲契约，好话千遍不如契约一张，按约办事，如同遵循圣经中的“旧约”或“新约”，圣经是人与上帝的契约。不论后来的利弊如何变化，届时利多利少，痛痛快快，二话不说，所以说，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到头来大家还是君子，还可以合作。

有些中国人却是先君子（实为假君子，伪君子）后小人，到头来不仅合作不成，反结下深仇，全都是小人。原因何在？即在有些中国人说假话已成习惯，到时候却又不承认。所以在中国，一般朋友之间的合作远不如亲族兄弟之间的合作。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甚至更有“打虎须是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的世故之谈。不通中国世故，难以成中国人，既是中国人，就须知为什么中国人合作难。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里的“和尚”其实就是典型的中国人自己。中国人没有基督教“约”的传统，也没有古希腊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彻底求知的传统，但中国人却有孔孟儒家假仁假义的传统。

真按照孔孟的教训求善的人，势必最终使自己落得任人宰割的悲惨下场。孔子遗训2000多年，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真正以克己、礼让、孝悌、忠恕为善的人呢？

孔子有一句名言，对中国人的影响实在太太。这句话就叫做“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人得自孔子的教益，恐怕以这一句影响最普遍、最长久，也最为一切人所接受。只要是中国人，不是平均主义者的极少。

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便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齐是修的果，平是治的实，平天下，均贫富，到头来不只是圣王贤相的理想口号，更是一切百姓的梦想和希望。

这齐字、平字、均字，几千年来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血液，它流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里、思想里、意识里和潜意识中，说得绝对一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平均主义的化身。

然而儒家的“平均”与西方近代所兴起的“平等”却不是一回事。中国圣人的平均是“治国”的大人先生们给天下小民的恩惠、施舍、给予的平均，就好像养鸡场的饲养员给场中每一只鸡喂食平均，牧场主人给牛、羊、马的饲料平均，绝没有饲养员、牧场主与鸡、牛、羊、马等家禽、家畜，也即大人先生与平民身份、“人格”上平等的意思。

西方近代的平等恰恰是后一层意思：一切人，不论皇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人人在人格上，在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上，在一切争取个人幸福的机遇上平等。

中国人有平均的意识，但绝没有平等的意识。一个和尚可以跟另一个和尚闹平均，但一个和尚绝不敢跟一个当住持的大和尚也闹平均。怪不得两个和尚就只好抬水吃，三个和尚就该没水吃了。

比较之下，家族内，兄弟间，孔老夫子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还是具有正面作用的，加之从小培养的情谊，对于克服完全平均的障碍情结还是有可能的。但即令如此，父子失和、兄弟阋墙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

不能忘记，这里仍旧有一个传统权威的问题，与其说是情谊，不如说更是家族内的传统权威在起作用。

中国人一方面是个绝对的平均主义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个绝对的权威主义者。中国人的权威主义是中国5000年官场化社会的必然产物，没有权威主义的中国人反倒是个罕见的怪物。

中国人的合作基本上只能有一种形式。这就是官与民，或者另一种说法：主人与仆人的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往往可以相当稳定地延续很多年，甚至几代人。一个朝代，只要帝王家里自己不折腾，不要父子相斫，兄弟相残，稳定地维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都是可能的。

历史上的汉、唐、宋、明、清，不都是维持了200年以上的统治吗？这说明，当小民的中国人，或者说当仆人的中国人，除非连基本的生存都维持不下去，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起来反对皇帝和主人的。

就连《水浒传》这么一部描述农民造反的书，基本上宣扬的也都是“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造反者替天行的什么道呢？不过劫富济贫、均贫富而已。宋公明骨子里还是个皇帝的良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去与他“平等”。

中国人的不能合作简直是传统病，前一篇谈到了中国是“一盘散

沙”，实际上这正是这种传统病的必然产物。这种传统病已不知让中国人当过多少回亡国奴了，中国人自己竟然毫无知觉。

想当初战国末年，苏秦的合纵为什么会败在张仪连横的计谋之下？还不是“远交近攻”的传统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作用？

“远交近攻”也是“平均”意识的产物。近则有比，比则欲平，不平则恶，恶即在嫉妒，有了嫉妒的情绪障眼，便很难有成交的愿望，于是宁可舍近求远，便有了“远交近攻”的“理由”。

实际上这“远交近攻”不仅害中国古人当了不知多少回亡国奴，20世纪30-40年代，面对日本人的侵略何曾不同样是如此。我甚至怀疑，如果不碰上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合作，日本人不蠢到与德国结盟和与美国公然为敌，中国人是否真能避免得了又一次当亡国奴的命运，也还是一个问题。

且不说中国大地上中国人充当的伪军还多于日军的丑事。君不见蒋介石也早就已经公开倡言“攘外必先安内”吗？这显明豺狼已经入室，那里兄弟之间还在没完没了地磨擦，甚至不惜与豺狼暗相勾结，必欲置对方于死地，难道这仅仅是蒋介石个人的品质问题吗？我毫不怀疑，换上另一个张介石、王介石，也相差不到哪里去。

中国人的除恶务尽，绝对只看到自己身边，为此竟可以有“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任性，并更进一步发展到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慈禧语）的疯狂的叛逆心态。历史上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大概都是这种心理。

可怕的不是那一两个恶贼，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都与人难以合作的民族的劣根性。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不重视挖掘这种劣根性，中国人还谈什么希望21世纪呢？

要面子不要脸

杜重远

要面子不要脸这六个字，包括尽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腐败、假冒伪劣的层出不穷……

仿佛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说的话：“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这句话是万分真确的。

原来面子和脸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中国旧戏里有一套脸谱，这花花绿绿的脸谱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脸却反不能辨认清楚了。做戏子的只要上台的时候，脸谱弹得像个样子，至于真正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

其实中国人一切都如此：只要保全面子，丢脸却全不在乎。阿Q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挨人打不要紧，但在背后却要说一句“儿子打老子”，这样虽丢了脸，面子却是有了，所以要面子不要脸是中国人一般的人生哲学。

就整个中国社会来看，亦无不如此。在大城市里，工商业不景气，破产倒闭的事，层见迭出，但是酒馆舞场还是一样地热闹；在乡村里，贫穷到不堪，肚子发生了问题，但婚丧的仪式，迷信的陋习，依然大事铺张，为的是不肯丢掉面子；学生们念书，只求得到一张文凭，却不想求一些实学；教师们习染官僚的恶习，只求以做大学教授为荣，而贻误子弟却可以不问。

这都是中了要面子不要脸的毒。

说工商界罢。年来国货两字是最时髦没有了。但是着实有许多不要脸的商人们，将大批仇货，印上国货商标，到处兜销。财是发了，面子是有了。但是做了卖国的奸商，却满不在乎！

军人总算是中国的天之骄子了。大将军出门，八面威风，黄呢服，黑马靴，白缨帽，金丝眼镜，高车骏马，前呼后应，场面可谓十足矣。然而四省沦陷的时候，从未闻有半个将军阵亡或负伤，死掉的只不过是一群小百姓。

谈到政治，更足痛心。从前历史上所描写的政治不良，不过是如何夤缘，如何奔走而已。今则花样百出，中西兼用。记者在东北时曾见一批政客，来自南方，携名花，扶艳女，或称为妻，或称为妹，或称为亲爱的女儿，专为结识权贵，献媚当局。昼则高尔夫，夜则狐步舞，乌烟瘴气，黑漆一团，待其鬼计既售，官运亨通，简任到手，局长实现，于

是一掷千金，挥霍无度，面子大则大矣，脸不知其何有？

还有洋场十里的高等华人们，拍惯了洋大人的马屁，把帝国主义者当作自己祖宗。说中国不亡无天理。这些人在租界里住洋房，坐汽车，“高等”则“高等”矣，但是说到脸，他们实在要向着没有面子的人力车夫们说一声惭愧。

不必再多说了。总之，要面子不要脸这六字，包括尽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产，东北的失陷，边境的沦亡，都是由于要面子不要脸这一种人生哲学的缘故，所以要救中国必先革除这种亡国的人生哲学。

斗来斗去的中国人

鲁迅

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就是不敢跟外来侵略者斗争。

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古时候有斗鱼，现在变把戏的会使跳蚤打架。看今年的《东方杂志》，才知道金华又有斗牛，不过和西班牙却两样的，西班牙是人和牛斗，我们是使牛和牛斗。

任他们斗争着，自己不与斗，只是看。

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

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兵士们相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究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

然而人民一任他们玩把戏，只是看。

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还是留着国产的兵士和现买的军火，自己斗争下去罢，中国的人口多得很，暂时总有一些子遗在看着的，但自然，倘要这样，则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

有红绿灯为啥还要交警



* 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

——与魔鬼同行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

鲁迅

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窝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比对我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账！”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来人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

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势力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

“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们再谈谈……”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卑 怯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抵，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治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怒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什么呢？

骄和谄相纠结的，且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特色。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容易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利用阴谋和手段。

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见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中国人的脸

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

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顎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

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自 欺

旧国骂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糊涂，误认他为肥胖。

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

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难改变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

凡是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了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自利·揩油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

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

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

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也。

偏 执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是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

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叫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

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

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成把握的。

圆 滑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台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大家合力的一顿痛打。

“说要死的是必然的，说富贵的许是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 he! he he he he he!’”

逆来顺受

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

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

中国人的四大毛病

（波兰）露存

中国人有四大毛病：虚伪、淡漠、诽谤、隔膜。请允许我详细说明。

虚 伪

虚伪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

人和人相处，首先要相互认识和理解，而后才能够在一起相处。中国有句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说人们只是相互认识而并不相互理解，这样就会产生虚伪。

西方有句话说：“团体成权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相互之间却四分五裂，形同散沙，散沙不能成石，散乱的人又怎么能成为国家呢？

今天治理近代中国的权柄，掌握在政客和军阀手中。有人说这些人只图利己，不知利人，又说国家的运势所以逐渐下降到卑下、毁灭的绝境，罪责也在这些人身上。

我说未必，中国人度量极大，也颇有爱国心，当初这些政客、军阀也没有作恶之心，也有报国的热情，尽管他们接受外国的津贴或借用外国势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因为各有各的想法。各派首领，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

我把近代中国比做一个奄奄欲毙的病夫，而各派的首领就是想要救治他的医生。医生们相互间从不商量，只各下各的药。他们都具有救治中国的热心，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只会断送病人的性命。

假如医生们不固执己见，能够和衷共济地商量一个对症的良方，共同制定一个治疗的方案，然后尽力承担各自的职责，那么这个垂危的病人，一定可以起死回生。

中国人很难做到彼此相识相知。假仁假义、假殷勤、假附和、假同道、假同志，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欺骗。这个人欺骗那个人，那个人又欺骗另外一个人，欺骗来欺骗去，最终的结果是欺骗自己。

任何军阀，任何政客，当他声势不大的时候，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博取大家的附和，以欺骗别人的方法爬到很高的职位，然而很快他就身败名裂了，原来当他欺骗别人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别人的欺骗。

一个人想成大事，创大业，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成功的。平时交际，如果靠虚伪来拉拢关系，那么这些号称同心同德的人，最后都不会成功。因为他们认为善良的人不善良，他们相信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十逾八九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一心为公的人十无一二，这样怎么能够成就大事，怎么能够创立大业呢？

虚伪的危害很大，因此如果不改掉虚伪的恶习，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互相理解的时候。而社会也不会有安宁的日子。

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互相理解呢？我说只要说话真诚、正直就行

了。酒局饭桌之上，会有真诚、正直的话吗？嫖赌游戏的地方，会有真诚、正直的话吗？不会有的，只会以虚伪的话互相欺骗而已。

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互相熟悉呢？其一，应当经常相叙；其二，应当经常谈谈。相叙不能徒具形式，相谈不能只装门面。孔子对众弟子说：“为什么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呢？”就是这个意思。

淡 漠

淡漠就是漠不关心的意思。

这也是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古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足以代表人们的淡漠。而诸如此类的训戒之词，在今天的社会上，将不再适用。

古人不明白微生物的利害，不知道微生物致病后会传染。甲家的疫病会传入乙家，甲屋里的疹子也会传入乙的屋里来。用空气作为媒介，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人不能不呼吸空气，而空气又不能被隔断，因此人想自我保护，首先要保护别人。换句话说，我们共同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得不有共同的行动。

社会中有朋友也有仇人。与其有淡漠的朋友，不如明有明耻交战的仇人。仇人犹如毒药，我还能防着他避开他，淡漠的朋友则如同含有砒霜的糖，无形之中就可以误我害我。你说你不相信，请让我举例来说明。

现在有甲、乙、丙三个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天，甲被怀疑为杀人犯，受到法庭的审判，他不能说话，没有自由。乙知道甲是无罪的，丙知道乙是知道甲的真实情况的。

审判时，乙因为事不关己，不愿到法庭上旁听和做证，丙虽然坐在旁听席上，却一言不发。审判完毕，甲被判有罪，试问使甲陷于有罪的境地的，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乙和丙的淡漠。

其实他们并不想让甲被判有罪，但他们的淡漠却使甲被判有罪，这难道不是和“我虽不想杀伯仁，然伯仁却因我而死”是一样的道理吗？

太过分了。淡漠两个字实在害人。正因为如此，我敬告我的同胞：你们不要急于杀害仇人，你们应当先杀掉你们的淡漠；你们不要问什么事危害国家，你们天性淡漠，这就是危害国家的病菌；你们不要空言救国，你们想救国，应该先化掉淡漠的恶习。

如何化掉它？在交际中化掉它，在团体中化掉它，如此而已。意见不怕不同，议论不怕不同，把事情重视起来，不再淡然处之，不再敷衍了事。化解淡漠的方法，没有其他奇巧之处，如此而已。

诽 谤

诽谤也是中国人的一大通病。

喜欢议论别人的短处，这就是诽谤。它是与奖赏、称誉相反的概念。中国贤人君子，受到诽谤的十有八九，受到赞誉的十无一二，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更是厉害。

在欧洲各国，这种薄德只屈于妇人。中国的堂堂男子，也多半具备这种伎俩。以我的阅历，世界上的长舌男人，中国最多。问这类长舌男人，诽谤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谋取私利，还是为了谋害他人？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然而社会上的贤人君子，被这“诽谤”二字残害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算做善事而因诽谤心灰气馁放弃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公元1910年，我寓居巴黎时，航空家布莱里奥飞渡英法海面，这虽然属于空前之事，但终究不是绝后之举。后来进行长途飞行的人，更是不可胜数。然而当时法国政府和人民，悬旗结彩以示庆贺，几乎遍及全国。

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呢？是为了奖励他能成为海面飞行的先导。奖励前人，就是奖励后人。欧洲奖励的举动，不一而足，或奖励美术，或奖励科学，凡是有益于社会的成就，政府和人民没有不给予奖励的。中国相反，随时随地，只听到诽谤的闲谈，如果以“诽谤”两字为标题来评定等级，那么中国当列第一。

北京的公园，以中央公园为开端。前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功劳，实在不小。朱先生规划布置，每天清晨六七点钟就在亲自指挥，到晚上六七点钟还孜孜不倦。有一两年之久，他都这样做，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惜我无能为力，如果有的话，我必定为他设立一尊雕像来纪念他的功绩，并以此来激励后人。

我说要这样来奖励他，听者未必入耳，然而平心静气地想想，这个公园对于社会的好处，真是不可胜计。如果做出详细的统计，那么来这个公园健身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靠这个公园而避免沉溺于恶浊地方的消遣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靠这个公园减少了麻将生涯的人，更不知道有多少。既然这样，那么朱先生的功劳难道是可以随随便便说的吗？

隔膜

隔膜就是说不通人情世故。

我所说的隔膜，是专门就女子来谈的。家庭累积而成社会，不知道社会的情况就不能尽家庭的责任，也不能培养出优良的国民。所以女子对于社会问题，比男子对于政治问题更重要。

任何国家，其文明程度越高，女子在社会上所要担当的义务就越多。女子既然明白社会上的情况，那么帮助其丈夫，教育其子女，自然就会有正当的见解。

世俗的妇女，不但不明白社会的情况，就是丈夫的处境，也茫然无知。我曾认识一位妇女，她丈夫的收入越丰厚，她的浪费也越多。

她对人说：“我丈夫四处兼差，每月能得到两千块薪金。世界上的男人，聪明才干没有胜过我丈夫的。将来总统也非我丈夫莫属，并且可以到十多个地方兼差。终身吃穿不尽，子孙富贵无忧。”我听到这些话，与其说她是愚蠢，不如说她是无知。

乐于听阿谀奉承的话，是男人的一贯作风。做妻子的用奉承话来劝动她丈夫，很少有不成功的。一天，她对丈夫说：“你的聪明才干举世无双，功名富贵如囊中之物，区区一辆汽车，为什么舍不得花钱购买呢？”

没过20天，丈夫居然就把汽车买来了。有了汽车，当然要有车夫，要有车房，车夫更要有住的地方，车房还要有电灯以及其他种种设备。赶上他们赴宴时，主人对车夫向来只要破费20个铜板的，现在铜板已经拿不出手了，必须改给银元，一二角的银元也看不上眼，必须加倍给四角、六角、八角不等，甚至要给一元、二元。这样主人邀请一位客人，实际上必须花掉两位客人的费用。

男人都不愿把自己所受到的烦恼对他的妻子说。妻子既不明白她丈夫的处境，也不知道谋生的艰难。即使在男人失去工作的时候，也仍然不能理解衣食的来之不易。

中国过去以坐享其成作为鼓励子女的方法。当小孩受教育时，母亲常对他说：“等到有一天你考中做官，别人都带着金银财宝来献给你，你只要衣锦还乡，坐享其成就可以了。”这种教育在今天极为危险。而要改变教育方针，必须先使子女洞明社会的真相。

西方国家教育子女的方法与这不同。我以前在欧洲住在某人家里，那家母子的一番谈话足可为我国妇女所效法。我不嫌烦琐，把它的大意照录如下。

母亲对她儿子说：“儿子啊，世界很大，宇宙无穷，得失全看你的

能力。你能努力争取吗？”

儿子说：“那么我应当怎样做呢？”

母亲说：“你应当有立身的正道，进身的专门技艺，学习别人的长处，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时乎时乎不再来，你不能苟且偷生，虚度每一天。你的大脑就是你的宝库，所以你要多动脑筋，你的臂膀就是你的兵器，所以你要多动手。多用心多劳作，即使碰到饥荒的年景，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可以安身立命的，不用担心会没有东西吃。

帝国也好，民国也好，过激政府也好，都必须立志做事，有进无退，不要依赖别人，不要拖延时日，处世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成败荣辱，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要别人强加给你的，你也不要强加于人，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你也应当给予别人。

成就别人也就是在成就自己，而严格要求自己就可以不求别人。侮辱人的人永远侮辱他，尊敬人的人永远尊敬他。人必定是自侮然后才受到别人的侮辱，人必定是自敬然后别人才敬重他。

而且，你属于社会，而不是社会专门属于你。社会还有一样东西，这件东西不能让人人满意，而人终究不能违背它，它就是法律，法律不是天然生成的，但你实在不能脱离法律而独自存在。”

儿子说：“母亲说得是。但法律不对也应当遵守吗？”

母亲说：“当然。法律不对，你也应当遵守它。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人心不齐，所以要有法律为准绳，法律不能用来取悦每一个人，法律不是一个人制定的，也不是为你一个人而设立的，你看到法律不对，你就要争取改造它，但是你要改造法律，必须先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先博得社会上多数人的谅解，你自当奋发努力。改造法律是可以的，毁坏法律则不行，要改造法律仍然必然先遵守法律，说是改造法律而自己先违犯法律，这实在是社会的罪人。”

西方国家的优秀母亲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这与其说是聪明，不如说是明智。聪明、愚蠢的不同是这样，明白、糊涂的不同也是这样。我要斗胆大声疾呼：社会的善恶，一半在于男人，一半在于女人，而女人对社会真相如果隔膜了，那么社会就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

有红绿灯为啥还要交警

茅于軾

最近我第八次访问美国，和过去的访问一样，每次都有新感受。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有看不完的东西。人们去美国由于各人兴趣的不同，进入脑子留下印象的事物也是不同的。我是从经济学的兴趣出发，特别注意美国这个社会是如何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

美国和别的国家一样，每年汽车要交一次牌照税。收据是一张半寸见方的小纸片，贴在车牌的旁边。收据上除了年份还有月份。这引起了我的兴趣，难道车牌每月都要交一次税吗？

我问当地人才知道，收据上的月份是车主的出生月份，原来为了避免到年初、年末大家都去交税而引起的拥挤，当局规定交车牌税必须在车主的出生月份去办理。这样就把交税的工作均匀地分摊在全年12个月。政府可以减少雇员，车主可以减少排队拥挤，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了。

提起政府从汽车上收的各种费用，我想起新加坡对在马路上停车收费的新奇方法。在马路边停车要收费，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做法，北京也开始在实施。别的国家的做法是在路边设一收费柱。车主将硬币投入受币口，就可以转动一个指针。等指引指针由一个时钟驱动恢复到零位，此时说明停车时间已经用完。

如果车主不把车开走或不再投入硬币，被警察发现汽车停在指针于零位的收费柱旁，车主将被罚款。这一方法推广的困难是路旁要设收费柱，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新加坡构思巧妙的方法避免了这笔投资。他们的办法是由政府出售停车收费凭证，每张凭证可以停车15分钟或30分钟等，此凭证上有年、月、日、时、分的格子。车主停车时，将凭证上当时刻的年、月、日、时、分格子抠掉一个小孔，并将凭证置于车窗内。当巡警发现过了停车时刻仍未将车开走，车主将被罚款。这个方法可以在我国许多大城市中推广。

美国将人力的节约推行到了极点，所以才有极高的工资收入。我每到一个国家，从机场工作人员的配置就可以估计这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富国的机场没有闲置等待人员，穷国则有许多看上去无所事事的人逛来逛去。他们并不是不需要的人，只是因为组织得不好，工作配合失当，互相等待。机场只是一个国家首先被人看到的地方，它显示出这个国家

的效率观念和组织能力。

再举美国的彩卷扩印业为例。顾客从超市货架上取一张免费供应的有号码的单子，填上洗印的各项要求，将胶卷连同单子装入一个信封口袋，扔进一个大筒里，自己保留单子的号码。24小时之后就可以到另一个货架上从按号排列的加工完了的扩印照片上找到自己的照片和胶片将它取回。整个过程用不着和人接触。这样做不但节约了人力，还节约了营业面积。

美国的警察不少，在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警车，车上配有无线通讯和计算机。所以出事接到报告后的三五分钟内就可以有警察赶到。但美国的红绿灯下却从来没有警察。我经常在想，为什么北京许多道口不但有红绿灯，还要有警察。有些繁忙道口要有四五个警察维护秩序。看来不设警察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百姓适应于人治（警察），不适应于法治（红绿灯），要有人管才能遵守秩序。

德国柏林的地铁，只有上车购票这一道手续，而没有查票、检票。不购票照样可以畅通无阻地上地铁车厢，但却没有人这样做。这种制度节约了大量查票的人力和检票的设备，使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上升。

这些提高社会效率的办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我表示很大的怀疑。如果没有人看管，顾客会不会拿错甚至故意破坏别人的扩印胶卷；红绿灯前不设交警会不会增加堵车的可能；地铁无人验票的话会有多少人诚实、自动地购票。

我们说现代化，常指工农业、国防科技等的装备现代化。二十多年的改革使我们明白了制度的重要性。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计划经济轨道转向市场经济轨道。但我们更需要明白，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参与和执行的。

一个制度的成败取决于人们和政府（说到底政府也是穿了制服的人民）的素质。我国经济想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努力提高人的素质。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艰苦努力、扎实细致工作的过程。认识不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热衷于搞表面文章，最终是成功不了的。

上面的几个例子值得我们好好再想一想。

中国狗与中国人

傅斯年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便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事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

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

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战争证明。

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地见。

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如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

我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责任心，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权威的言论机关。一时

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

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

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地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忍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更朝更是朝气幢幢。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的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我们应常常自省，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若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没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

如果我们没有袁子才的那种不成才的魄力，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颀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吗？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 (完整版)

与魔鬼同行

我在一个生物技术企业工作了四年，之前是做市场的，最近一年被老板调到了人力资源部当经理。一年的人事工作经历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中国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坏毛病有颇多感慨和无奈。

之所以放大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因为我相信我下面说的很多特性在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发生的几率要高于那些比我们好的国家。我是一个中国人，并不想贬低自己的民族，但我认为我们民族经过这一百年来的动荡，特别是十年“文革”，教育的确是被歪曲和延误了，国民整体素质下降。

我在下面所发表的言论，既是在揭中国人的伤疤，也是在揭自己的伤疤，但我相信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才有改进和强大的机会。

一、人人相轻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硕士轻视本科，本科轻视大专，大专轻视中专，名校轻视非名校，干部轻视职员，职员轻视工人。更搞笑的是学理科的轻视学文科的，学文科的轻视学理科的，市场部的轻视技术部的，技术部的轻视市场部的。

这不是随口乱掰，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是一个公司的，别人不行要伸手帮忙，站在那里说风凉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说句老实话，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比谁高多少呢？何况大家捧着的是一个饭碗。一个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绝对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每次看见那些吃饱了腆着肚子趾高气昂地骂服务生的人，以及我们公司那些拿着几千块RMB（折合几百美金）的伪白领，以为自己忽然中产了，整个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样儿，就觉得这个国家没什么希望。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我最近在公司推行绩效考核，有些部门经理不爽了，因为他们一算，自己的奖金要变少，还要被公司考核，于是背后说坏话的也有，开会大吵大闹的也有，不闻不问的也有，种种姿态，不一而足。

有同事问我：“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搞绩效考核吗？一个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复杂，但是损害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于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些经理不会说自己的奖金变少了，而会说本部门的奖金变少了，本部门的风险变大了，或者挑起部门员工对制度的敌意，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在一个企业，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起的，公司好了大家都好，公司垮了个人也拿不了几个月薪水。老外很崇尚个人价值，但在企业和组织里面非常遵循个体服从整体的准则，这就是对企业的正确理解。

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他们物流部”、“他们财务部”，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公司的，像有仇。

我记得有次一个经理为他部门员工薪酬的事情问我“你们公司.....”我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是谁？公司是谁？”他一下子愣住了。

美国人在自家小孩读幼儿园的第一天，回来问的是“你今天为别的小朋友做了什么？”、“你为老师做了什么？”.....这就是从小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我估计中国的父母可能问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没有？”（担心自家小孩没喝到），“你今天在幼儿园乖吗？”（担心不乖被人打）.....

所以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的是强调利己，而不是强调合作。NBA那个嘉得乐饮料的广告语“我有，我可以”被国内企业大肆抄袭，于是“我选择，我喜欢”、“我运动，我快乐”之类的东西到处泛滥，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很突出“自我”的思想。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矫枉过正的事情，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号人就像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老爱自己内部起哄，私心太重，就不会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就学不会妥协，不会妥协，就天天吵架，你争我斗，企业就在这样的内耗中完蛋了。

三、疑心大，不诚信

做人事经理免不了经常和人沟通，我就发现我们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这个事情我不好说，不想惹麻烦……”，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给我买辆自行车结果没买，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

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我刚做人事经理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人事经理就是老板的传声筒，做这个职位只有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做啊！

我做了一年，发现其实老板没什么大问题，而是他们天生的爱猜疑老板，又不当着老板的面说实话。所以自己营造一个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业里面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

无论在一个社会或是企业里面，诚信度越低，运行成本越高。中国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很难相信别人，其实是我们社会不够文明的一个表现。

四、蔑视制度

当人事经理的第一天，老板就跟我说：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化。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老板的苦心，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

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后订了一个考勤制度，规定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积三次计旷工一天（因为公司的迟到现象很严重）。结果制度出来后，我一看有的员工迟到三次了，想着旷工罚款太重，心一软，就对员工说：“到了第三次迟到就补请一个事假吧，事假总比旷工好，下次不要迟到了（这是我率先违反制度）”。

结果有的员工下个月仍然迟到三次，刚开始迟到请事假，后来请病假（因为病假扣的钱更少），后来每次迟到都请病假，到后来连请假条也没有了，打个电话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滥的起因是自己放闸，下了一个通知：“以后迟到一律不准事后补假。”不准事后请假，迟到的员工就把请假条的时间提前一天，反正经理们不管。

我那时想到了《鹿鼎记》里面康熙对韦小宝说的一句话：“鳌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啊！”最后实在没辙，宣布“迟到一律不准请假”。

实施的当月有个女职员迟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记旷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来：“我从小就没有旷过课，现在居然被记旷工，你可以问经理我那天迟到是因为……”最后一句是“公司讲不讲人性化管理？！”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他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窦娥还冤。

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

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

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妈包庇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们非常敏感。

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

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我才不会求你！”

我就是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绪，是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像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

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儿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儿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回百转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这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说穿了，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哪有那么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

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政治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政治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像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用“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我在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中规定，每个部门每年必须有5%的员工被评为不合格，实际上我最初定的是10%，但后来所有的经理都反对，只好降低标准。即使是5%，经理们也不愿执行，他们对我说：“如果我的部门员工都合格，你一定要弄出个5%，怎么办？我只好安排员工轮流坐庄了。”他们说有理直气壮，因为觉得自己是君子，对得起身边的兄弟们。

我的回答是：“GE公司的淘汰率是20%，你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比GE的员工优秀？”

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它是一条明确的线，你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线下。所以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老外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因为他们的员工主动性和自律性比咱们强，“领老板的薪水对老板负责”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像在国外有的街道，红绿灯由司机自己按，因为遵守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脉中；要是在国内企业搞弹性工作时间，我相信90%的企业会死得很惨。中国的司机连红灯都敢闯，你叫他自己按红绿灯，他会一直按绿灯到自己不开车的那一天。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

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这些经理不会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员工多，权力比员工大，那么问题就应该到他为止，不然老板要你做经理干什么？可是他们总是把权力与责任分开，权力就是拿的钱多，管的人多，没想过其实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你有多少权力，就要负起多少责任。

在我们公司，人事和财务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两个部门代表公司行使职权，最容易被经理们“转手”责任。

当你正常过问他们事务的时候，经理们会很反感，认为你触犯了他的一亩三分地，挑战了他的权力；可是一碰到员工要加薪、预算被削减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这个钱我是同意的，可是财务部不同意！”其实决定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下的，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与员工沟通，把责任和矛盾推卸到我们头上。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说得真好。

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做了人事经理后，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在公司创立初期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公司也一直努力想培养他。但他的心眼特别小，私心特别重，毫无包容精神，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他几乎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任何事情。

比如，他认定他的上级（总监）不如他，但年终奖比他高，令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经常跑到老板那去说上级的坏话。我跟他说，别人能做你的上级，肯定有他的长处，即使别人有问题，你也应该与他达成谅解和共识，原因很简单：你们是为一个目标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级。

可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固执地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他的上级。组织行为学里面有句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就是本位主义，他的大脑就完全被他的屁股（个人立场）控制了。

我曾经跟老板开玩笑，评价他为“武功尽失，经脉全废”，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义，无可救药。无论他的工作热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甚至断定他在生活中也不会取得成功，至少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他33岁了，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像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

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女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内的跨国公司工作，有一个到海外出任分公司CEO的机会，结果公司把机会给了一个他认为专业技能、学历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

他去问老板，老板说：因为公司觉得那个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养和更开放的心态，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他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糅合在一起，去实现公司的目标，这远比技能重要。

这个案例给了我深深的启示。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

也许中国人穷怕了，好不容易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功利得有点儿过了头。我周围的很多职业经理人用各种证书、MBA学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恨不得一个个都变成经济动物，谈起工作都是专家，就是不会与人相处。前几天我跟一个公司的同事聊天，他说大学毕业后6年时间里，他没有读过一本小说。

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弘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

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化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国内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

跟中国的员工谈文化素养，谈人性关爱，他们多半以为你有病。他们会说，公司的氛围不好，沟通不通畅，执行力不强，但不会去想这是文化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一有钱就忘本，就嚣张，要写书，要设论坛，要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骂警察，就是没想过回馈社会，也是缺乏文化性。

学历和技能是衡量一个人的硬件标准，但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软件，是一种性格和态度，是文化。所以老外招聘员工的时候，强

调“沟通能力”、“团队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更注重一个人内在的素质，这才是决定个人价值的关键。

结束语：本人今年28岁，自己还把自己归于愤青行列，所以行文有偏颇之处，亦可见谅。文章既来自生活，又超越生活，大家不必以此文来质疑我作为一名人事经理的心态。大家各取所需，不必望文生义。说到对本文所列问题的解决方案，我想，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许答案就隐藏在问题之中。

最后，我以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结尾，与大家共勉：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中国人与麻将

胡适

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洲与美洲的社会里，有许多人学打麻将，后来日本也传染到了。有一个时期，麻将竟成了西洋社会里最时髦的一种游戏：俱乐部里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将，书店里出了许多种研究麻将的小册子，中国留学生没有钱的可以靠教麻将吃饭挣钱。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

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这回我从西伯利亚到欧洲，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日本，十个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个俱乐部里看见有人打麻将牌。在欧美简直看不见麻将了。我曾问过欧洲和美国的朋友，他们说，“妇女俱乐部里，偶然还可以看见一桌两桌打麻将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

我在美国人家里，也曾看见麻将牌盒子雕刻装璜很精致地陈列在室内，有时一家竟有两三副。但从不见主人主妇谈起麻将，他们从不向我这位麻将国的代表请教此中的玄妙！麻将在这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将的狂热已退凉了。

我问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麻将的狂热过去的这样快！他说：“太太们喜欢麻将，男子们却很反对，终于是男子们战胜了。”

这是我们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劳奋斗的民族绝不会做麻将的信徒，绝不会被麻将所征服。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

当明朝晚年，民间顿行一种纸牌，名为“马吊”。马吊只有四十张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万至九万等，等于麻将牌的筒子、索子、万子。还有一张“零”，即是“白板”的祖宗。还有一张“千万”，即是徽州纸牌的“千万”。

马吊牌上每张上画有《水浒传》的人物。徽州纸牌上的“王英”即是矮脚虎王英的遗迹。乾隆嘉庆间人汪师韩的全集里收有几种明人的马吊牌（在《丛睦汪氏丛书》内）。

马吊在当日风行一时，士大夫整日整夜地打马吊，把正事都荒废了。所以明亡之后，吴梅村作《绥寇纪略》说，明之亡是亡于马吊。

三百年来，四十张的马吊逐渐演变，变成每样五张的纸牌，近七八十年中又变为每样四张的麻将牌。（马吊三人对一人，故名“马吊脚”，

省称“马吊”；“麻将”为“麻雀”的音变，“麻雀”为“马脚”的音变。）

越变越繁复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国中的男男女女，无论富贵贫贱，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阴葬送在这一百三十六张牌上。

英国的“国戏”是Cric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从前的革新家说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鸦片虽然没禁绝，总算是犯法的了。虽然还有做“洋人股”与更时髦的“党八股”的，但八股的四书文是过去的了。小脚也差不多没有了。

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新近麻将先生居然大摇大摆地跑到西洋去招摇一次，几乎做了鸦片与杨梅疮的还敬礼物。但如今它仍旧缩回来了，仍旧回来做东方精神文明的国家的国粹国戏！

中国人，日本人

陈香梅

有一个笑话，说是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肯定能赢；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日本人，打个平手；三个中国人对三个日本人，中国人一定失败。就是说日本人团结，中国人不团结，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文化有传统的问题，比如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告诉你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中国地方很大，看起来像一个欧洲，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以前语言不统一的时候，大家连言语都搞不清楚。你是山东人，我是北京人，他是广州人，地方观念很强。

一直到今天，包括进入政治圈子里的人在内，还是有点不团结。比方说我介绍一个人给“总统”办公用，别的人又吃醋了，唉呀，怎么不介绍我？

现在，韩国人、日本人已经进入政治圈子了，民主党里面有许多日本人了，韩国人现在慢慢比中国人还团结，中国人整天要拿个什么名啊利啊的，争来斗去。现在很多华侨回来，名堂一大堆，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们中国害得好惨。日本这个民族很有自己的特点，它内部不管怎么争斗，对外却是一致的。日本人接受能力很强，很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补养。日本以前也是模仿人家、学习人家，现在它的经济腾飞了，要改写历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日本人卖点东西给你或者是贷款给你，可是他技术不转移，他不是么东西都给你，总是有所保留。

美国人个性比较开朗，他说这个东西转移就转移，不转移就不转移，讲得比较清楚。美国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也有他好的地方。今天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到美国去，是因为在美国你只要有能力，肯吃苦，你就不会饿死。

我到以色列去，发现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实在了不起。犹太人到底有办法，也真能干，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使一个四面被包围着的国家，由沙漠变成了绿洲。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使你不能不佩服他。

无国民资格之国人

陶行知

无国民

有人说：“吾国无国民”，这话未免太过。但细想，实际上有国民的资格的确是不多，所以教育在中华民国里更加严重。

唯人主义

中国人办公，素为唯人主义。机关所用之人，彼此各有关系，常因一人之迁更，而影响其他各人者。故推荐者与被推者，同其去就，而所推荐者，又皆因人之关系，胜任与否，所不计也。

看重读书

中国人几千年历史传下来的观念，都是看重读书，看重读书人，但还未以不读书，不读书的人为耻。古人说：“人不学，不如物！”又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这可见中国素来看重教育的意思。

精神不团结

欲国家之强大，必全国国民能同心努力方有济。今百人中不识字者约七八十人，是何言精神之团结？我们中国四万万人，就有四万万个心。好好的一个国家，弄得一点生气也没有。我们要想中国一天好过一天，就要四万万人只有一个心。

被动的民意

民意有被动主动的区别，被动的民意是对政府已经做的事体加以批评，加以反对，因为人民只是等候政府来动他们，所以叫被动的民意。我们中国的民意大都是被动的。

缺少度量

做人中人的道理很多，最要紧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他摇不动的基础。

近今国人气节，消磨殆尽，最堪痛心。倘不赶早在本身、后辈身上培植一种不可屈挠的精神，将何以为国呢？至于今日，少数具有刚性的领袖，又因缺乏度量，自取失败，并以此丧失国家的元气，甚为可惜。

公私混杂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资格，一是私人，二是公共团体的一分子。我们应当把这两种资格所包含的任务分得清清楚楚。我国人应当痛改的一个习惯就是公私混杂。政界中人，有的连家里的煤炭、妇女们用的首饰也要在公家开账。

听天由命

中国人是听天由命的，算命先生是整个中华民国之军师，蝗虫飞来，都说是神虫，捕灭的人要受天罚。大水来到，都说是天公发洪收人，不想法子治河。因此，大难临头，都没有自信心与它抵抗，连抵抗的念头都不敢起。普及教育必须攻破天命。

不能协作

依我看来，西洋文化能补充东方文化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运用科学改造天然环境，二是运用社会组织以谋充分之协作。中国的通病就是没有组织力，人数越多，越散漫。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描写这种不能协作之景况。

多生主义

我个人以为除了帝国主义之外，认为国内还有一大妖精被适之忽略。这个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多生主义。

不知民权

如何可以从农民的荷包里掏出一元钱来做股东，以及如何可以使农民执有民权？这两件事须靠我们从事乡村教育诸同志的努力。

农民对这种大规模举动的不明了，与不知民权为何物，固然要靠舆论来鼓吹和启迪，但最要紧的还着重在培植小农民的乡村教师。封建制度之下农民生活是最不进步的，他们一天一天地过去，好像毫无问题。

迷 信

总而言之，旧中国的军师是“迷信老爷”，在20世纪之科学世界中奉“迷信老师”做军师之民族必遭天然淘汰。

但是中国的大众受了小众的压迫剥削，从来没有时间、金钱、机会去把自己和民族的问题彻底地想通。加上了几千年的麻醉作用，他们遇到灾难，会武断地说是命该如此。

无学识

欲求事物之改良，则非经验之外别具生利之学识而可。无学识以为经验之指导，则势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吾国农业，数千年来所以少改良者，亦以徒有经验而无学识以操纵之耳。

无政府脾气

我们民族最大的病根，是数千年传下来的无政府脾气。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民，连团体里都充满这种脾气。要想铲除这种病根，非有严明的纪律，否则一盘散沙之民族难幸存。

读书人不生利

中国的读书人不去生利，是一个极不好的现象。现在的教育者要把他们的头脑灌输成科学化，使他们为自己创造，为社会创造，为国家创造，为民族创造。

愚

中国人愚，大概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因为士大夫的新代表胡适之已经把这个“愚”字列为五鬼之一，那大概是没有人反对了。可是我要向大家建议，愚人便是守知奴一手造成的。

人和鸟兽的最大分别，就是人会想，鸟兽不会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好国民与愚民的大区别，也就是国民会替国家想，愚民不会替国家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国民，第一就要有国家的思想。

衰老

有人说，中华民族现在是衰老了，我推究其原因虽多，但有一个原因，便是被人敬老了。六岁小孩子，大人就教他要少年老成，而这小孩子也就无形中涂上两个八字须，做个小老头子了。

我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到一个好中学去当教员，可是年纪太轻，很不为人敬重。后来教员不当，找了一件别的事做，便养起一嘴的须来……因此很受人敬重而做了许多年的事。所以中华民族衰老，便是教人变老，教小孩子做小老翁。

“中国人老了！”这是我们时常听见的批评。不错，有两种重大原因使中国人易衰老，其中的一种便是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教人学老。六岁的小孩子跟着老头子学老规矩，就好像长了两撇胡子，变成一个小老翁。

自私自利

说到孔子的故乡，再看孔子的祖圉，多数人的文化是一样的落后，一样的偏枯，一样的短命。一谈到太阳，有些人就想叫太阳光照到自己的头上；一谈到雨点，有些人就想叫雨点先落在自己的园里；一谈到教育，有些人就想叫教育先藏在自己的小孩的脑袋中。这种自私自利的打算是枉费心机！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个奇怪的矛盾。

民为邦本

古人说：“民为邦本”。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的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如果国民全未受过教育，空空挂了一块民国的招牌，是不中用的。

守知奴和守财奴

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脑里装，学问一装，头脑就大。越装越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脑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

以静为本位的中国人

李大钊

以静为本位

东方人之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方人之日常生活，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试观东方人西方人同时在驿候车，东方人必觅座静息，西方人必来往梭行。此又起居见其之不同也。

更以观于思想：东方人持厌世主义，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方人持乐天主主义，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唯前进奋斗为首务。

东方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西方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东方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方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

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诫众生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龕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出活泼的生命，自立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现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

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方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方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务，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

更以观于政治：东方向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

东方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方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

不思进取

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力量作怪，就是惰性。它的力量，实在比进步的力量大得多。有了进步的举动，人就说是过激，因为他是在惰性空气包围的中间。其实世间只有过惰，哪有过激！不说是自己过惰，却说人家过激，这是人类的劣根性。

死气沉沉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新的旧的，都是死气沉沉。偶有一二稍稍激昂的议论、稍稍新颖的道理，因为没有旗鼓相当的对立，也是单调没有精彩，比人家那如火如荼的新潮、那风起潮涌的新人运动，尚不知相差几千万里。那些旧人见了，尚且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

他们总不会堂皇正大地立在道理上来和新的对抗。在政治上相见，就想引政治以外的势力；在学术上相遇，就想引学术以外的势力。我尝追究这个原因，知道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总想用个巧法，走个捷径，靠他人的势力，摧除对立的存立，这种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真正可耻！真正可羞！

遗传性

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际生活都不生关系。是什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

农业本位

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

前者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

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

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

在古代原人社会，经济上男女分业互助的要求，恐怕比性欲要求强些，所以家族团体所含经济的结合之性质，恐怕比血统的结合之性质多些。

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做他的表层构造。

看那两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

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

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

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资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

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两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它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它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它的基础。

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不少影响。

缺乏科学精神

（美）古德诺

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这一弱点导致了他们对数学的漠不关心，或许是由于对文学才能的过分强调，或许是因为用汉语的数字来进行数学运算很不方便，总之，用中国传统教育方式训练出来的学者解决不了最简单的数学问题，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耳熟能详的三大定理，直到不久之前对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个秘密。

中国人一直以善于经商著称，在商业贸易中必然需要应用到相当多的数学知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没有应用数学知识的能力，他们如何做生意？回答是他们的数学知识是实用的、具体的，而非理论的、抽象的。

他们用算盘计算，他们对它使用得十分熟练，可以迅速、精确地解决商业中诸如换算之类的普通问题，他们甚至在进行最简单的加法运算时也要使用算盘，好像离开了算盘的帮助他们就不愿意或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其他方面，中国唯一有学问的人还只是那些精于语言和文学的文人，入朝为官时他们控制着国家政治的发展，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塑造着国民的精神，除了我们称之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和纯文学，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从事别的研究。文人们不屑于研究的自然现象只好留给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人。

然而，这些目不识丁的人们却沿着这条道路做出了显著的成就，但由于缺乏基本的训练，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科学真理的一点点微弱的亮光，他们有着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天才的发明，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大意义。

他们发明了指南针，但他们把它用于制作风水罗盘，以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作墓穴，或者用它在了无人迹的平原上寻找道路，虽然他们是伟大的航海家，但他们却没有想到指南针也能用于航海。中国人还发明了火药，也发现了火药的爆炸力，但却没有把它用于发射炮弹、爆破阻塞河道的礁石或用于开矿，只把它用来制造烟花爆竹。

换句话说，中国人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没有被很好地归纳总结。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它并不企图用普遍的科学法则去征服自然，把握未来，而是沉醉于对辉煌的过去的向往，根据古代圣哲

们的训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版权声明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部分篇目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为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 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室
邮编：100191
电话：86（10）82357056/57/58-230/229
传真：86（10）82357055

索引

1. 杜赫德《我所知道的中国人》

本文选译自法国神父杜赫德（生活于19世纪，具体年份不详）编撰的《中华帝国通史》（1735）第二卷，标题系引者所加。

2. 威廉·亨特《旧中国杂记》、《番鬼来中国》

《旧中国杂记》选译自英国威廉·亨特（生活于19世纪，具体年份不详）的《旧中国逸事》，《番鬼来中国》选译自威廉·亨特《番鬼在广东》，标题系引者所加。

3. 罗斯《中国人的体格》

本文选译自美国罗斯（生活于19世纪，具体年份不详）的《变化中的中国人》前三章，该书出版于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

4. 麦高温《一个尚未解开的迷》、《面子第一》

《一个尚未解开的迷》、《面子第一》均选译自英国传教士麦高温（?-1922）《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标题系引者所加。

5. 林语堂《中国人德行》

本文选自林语堂先生所著的《吾国与吾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6. 陈子展《说忍》、梁启超《中国国民之品格》

两文均选自何宗思编著的《中国人格病态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7. 鲁迅《斗来斗去的中国人》

本文选自鲁迅所著的《伪自由书》（青光书局，1933年10月出版）

8. 张藏藏《我唾弃那种中国人》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第10期

9. 海龙《从犹太人看中国人》

原载《海外文摘》，2000年第3期

10. 黎鸣《难以合作的中国人》

选自《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华龄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11. 陶东风《权谋文化与复杂的中国人》

选自《东方人性格地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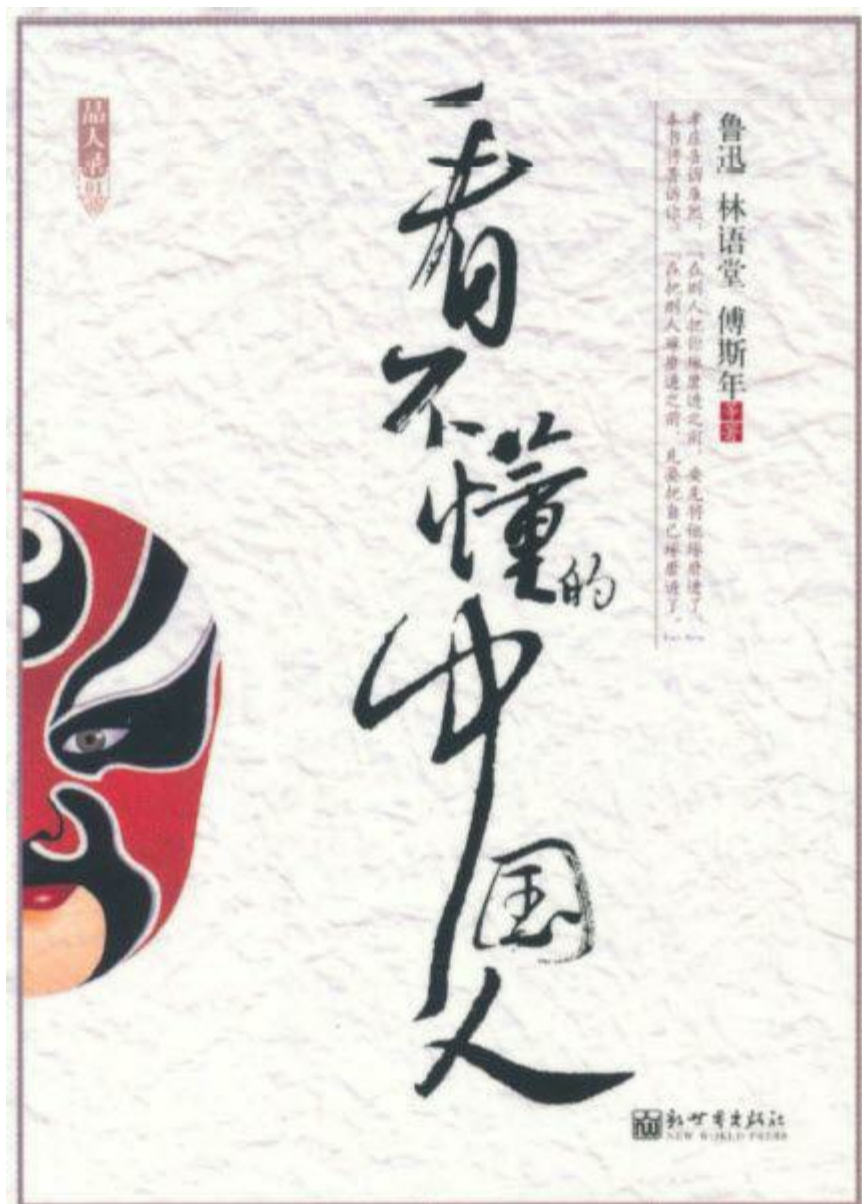
12. 赵志伟《中国式的幽默》

选自《幽默的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 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14. 杜树人《“模糊语”不模糊》
原载《解放军报》，2002年4月18日第7版
15. 与魔鬼同行《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中国人劣根性（完整版）》
选自《东方人性格地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16. 沙叶新《从德国人看中国人》
原载《文汇报》，1995年12月26日



在中国，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

——陶东风

责任编辑：余守斌 邓东文

封面设计：